

47254/0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25
辑

湖南文史 资料

周谷城题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

第 25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丁 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6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

198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0千字 印张7.3

印数 1—5,000 定价: 1.50元

编辑说明

一、湖南各民主党派的地下斗争和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各地的地方武装斗争，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这方面的史料我们没有集中介绍过，因此编辑一本民主党派斗争和地方武装斗争史料的专辑是很有必要的。

二、本辑选用了18篇史料。有关民主党派斗争的4篇，反映地方武装斗争的12篇，其他2篇。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不可能将所有这方面史料都选入，所选入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篇目。

三、本辑在选编过程中，有关领导和人士在组稿、核实史料等方面给予了积极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四、本辑内容难免还存在一些差错，希望读者予以补充订正。

湖南文史资料

第25辑

目 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前在湖南的活动

.....钱去非 龚业隆 周荣光(1)

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

.....民盟湖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21)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

.....钱去非 唐耀晖(39)

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各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民建湖南省委会
湖南省工商联文史办公室(54)

解放湘南.....刘亚球(62)

从抗日到解放战争的湘南游击斗争略忆.....刘国安(70)

湘中总队五支队一团队二三事.....衡山县政协(91)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的

建立与斗争.....谷子元 何大群(95)

建立湘南游击司令部直属六中队(建新部队).....蔡新民(124)

湘南人民行动支队始末记.....罗立德(136)

湘中一支队第一大队的建立.....毛际寿(148)

湘中地下武装斗争的一个侧面	张生力 (151)
回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	谌鸿章 (182)
湘东纵队回忆	邹继衍 谭源育 (189)
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的始末	胡耀福 陈新明 (203)
记江南地下军第四军第十师和师长焦达悌	刘逸秋 (218)

补充·订正·质疑

对屈子健的《湖南优级师范概述》的订正	彭肇藩 (229)
对《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一文的一点补充 订正	刘文炳 (23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建国前在湖南的活动

钱去非 桑业隆 周荣光*

一、民革创建前后的历史背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1948年1月1日成立的。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众叛亲离，民怨沸腾。在军事上，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山东的军队受到了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这时白崇禧盘踞华中地区，蒋介石利用程潜与桂系的宿嫌，派程潜回湘主政，藉以钳制白崇禧，妄想保住西南，负隅顽抗。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湖南，已百业凋零、民穷财尽。“金元券”、“银元券”相继成为废纸，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希望休养生息之心，无时或已。程潜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于1948年7月回湘主政的。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湘军总司令，兼任过省长，竞选过副总统，同蒋介石、桂系都有矛盾，在湖南省影响大、威望高，湖南不少人把他誉为“家长”。因此，他回湘主政受到各界的欢迎，希望他能消除战祸，争取和平的到来。跟程潜回湘的有：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等一批湘籍黄埔军校学生，均被蒋介石视为亲信，这是蒋介石为监视程潜面在人事安排上采取的措施。

*钱去非建国前系湖南民革组成部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建人。桑业隆、周荣光建国前系湖南民革成员。

白崇禧对程潜回湘主政很不放心，他在武汉主持“华中长官公署”，不时对程潜施加压力，可谓“虎视眈眈，其欲逐逐”。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明令取消湖南和平促进会，不准喊和平，也不准喊自救，直到威逼程潜交出政权，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程潜当时既要应付蒋的亲信，又要防范白崇禧，处境十分复杂和艰难。

湖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时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要和平的斗争风起云涌。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相继成立了地下工委，开展了斗争，掀起了和平、民主、自救的运动。这个运动尽管遭到了桂系势力的镇压，但和平自救的声势，如同波浪一样，一圈一圈地展开、扩大，终于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向旧政权冲击。

二、民革地下革命工作的开展

1948年在湖南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民主派有“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两个组织。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民革、民联与民促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湖南民革、民联的地下革命活动开始于1948年春，由于斗争环境复杂艰险，彼此一般没有横的联系，初期也无统一组织。当时可分为三条战线，但不管哪条战线都是来自民革、民联中央的直接指示，分别与中共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党组织挂上了钩，所以开展的各项地下革命工作，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三条线为：

（一）以方鼎英为首的一条战线。方曾任黄埔军校教育

长，与民革主席李济深交往颇深。在南京政府担任要职的人不少是方的朋友、旧属或学生，因此在策反方面，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方鼎英派梁觉去港与李济深联系，李要方在湖南就近开展民革地下工作，重点摆在策反上。这年夏天，方的亲戚中共党员吴成芳专程由沪来长沙看望他，方把李济深对他的指示告诉了吴。吴表示支持，并说：“首先要团结唐生智，推动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以迎接解放。”方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经吴成芳介绍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组织接上了头。当时参加这条战线工作的有：原《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宋希濂的胞弟宋仁楚、原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原省参议员陈云章（陈未加入民革）、原财政部湖南区货物税局督导段荫南、主任秘书钟山以及马子谷、伍光宗、王果元、邹务山、方发祥等人。

（二）以程一中、戴朝震、唐伯球、凌兆尧、许松圃、周翊襄、黄栋、宋英仲为主的一条线。

1948年春，程一中（民联中央组织部长）的女婿、民联成员、中共地下党员黄栋，奉上海中共党组织和民联中央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之命来湖南开展工作。根据中共党组织意见，出任即将就职的“湘粤赣剿共司令部”副司令宋英仲的秘书，以便开展军事策反。后因宋英仲与司令叶肇有宿嫌未就职，黄栋乃在郴县南江中学以教书为掩护来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底接到中共湖南省工委调令来长沙，那时方鼎英在新化，黄栋受中共省工委之命去沪将程一中邀回长沙，于是民革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于1949年3月在长沙秘密成立，由程一中、许松圃等人为主，黄栋负责日常工作。

（三）以邓飞黄、杨世骧、钱去非、唐耀晖为主，奉民联中央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之命于1948年冬在长沙组建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湖南地下组织。民联的革命活动，

另有钱去非、唐耀晖二人的专题叙述，这里就从略了。

三、敦促程潜起义

解放战争迅猛地发展。早在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看望程潜的一席谈话，以及程潜的一生经历，对程潜的率部起义具有决定性影响。此时白崇禧掌管华中军政大权，不时对程潜施加压力，直至当面要程交出军政大权；蒋介石对程潜虽然鞭长莫及，但有他的亲信黄杰等在程潜左右监视他的行动；加上程潜又被中共宣布为战犯，其心中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湖南人民对他的信赖，亲朋故旧对他的劝说，加上各方面对他的影响，成了程潜率部起义的重要因素，而民革、民联地下组织的活动就是这个重要因素中的一部分。

1948年8月，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周礼委托余志宏通过何之光把程星龄从台湾请回长沙，开始做程潜的工作。程星龄和程潜是同族兄弟，易于接近。程星龄与余志宏早就相识，私交颇笃。这样程星龄通过余志宏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建立了直接联系。余志宏也由程星龄的安排与程潜见了面，余志宏对程潜阐述了中共政策，消除了程潜对“战犯”一词的顾虑。与此同时，程潜的重要僚属省政府顾问方叔章、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等力劝程潜走和平道路。程潜表示：“关于战和，应以人民之意愿为是。”1949年6月，程星龄受程潜之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送交中共中央，表示决心脱离南京政府，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八条，走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毛泽东主席立即复电表示嘉勉，并说：“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

参加和平起义策反工作的还有刘公武、马子谷、刘岳厚、苏民、苏本诚、苏本善、曹伯闻、唐伯球等人。他们多是程潜

的僚属、同事、学生，能接近程潜，程潜也信任他们。所以他们的工作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影响是比较大的。

四、军事策反 搜集情报

苏民此时是湖南省设计委员会委员，与桂系关系较深，白崇禧要他出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但他看清了形势，决定投奔革命，婉言谢绝了白的任命。他在民革许松圃、戴朝震的授意下，利用和桂系十一兵团司令官张淦的关系，得知白崇禧将来长沙，以岳麓山为制高点，以岳州、衡阳、宝庆为军事要地，决战在黄沙河一带，并得知张淦兵团有20万兵力，随即将此情况面告许松圃，转报中共湖南省工委。

1949年5月，苏民受程潜命去桂林探察桂系动态。苏民到桂林后，拜见了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人，交谈甚久。李宗仁表示，他已向南京政府提出要赋予总统实权，否则出洋不干了，并气愤地说：“我要黄珍吾当南京警察局长都不同意，这成什么代总统？”苏民乘机暗示，程颂公与他们（指蒋介石）也有矛盾，并问李宗仁对湖南的看法。李宗仁说：

“我们对颂公是尊重的，元老嘛，以颂公的意见为意见。”李品仙插话说：“程颂公受左右迷惑，既不征兵，又不征粮，这仗怎么打下去？不明明是迎接共军嘛！”白崇禧接着说：“程颂公到底在湖南怎么搞，我和刘建绪讲要程颂公去广州当考试院长，究竟他怎么搞？”苏民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白崇禧说：“黄杰、刘斐、丘昌渭这些人怎么样？”苏民说：“论他们的资历都可以当省主席，但他们的威望不如颂公，湖南人把颂公当家长看，如果硬要他离开湖南，他的军队怕不会同意。”白崇禧似有责难地说：“吓！你莫专门讲代表的话”。苏民说：“不是讲代表的话，我讲的只是那边的实际情况。”白崇禧说：“那你莫管了，你只委婉向颂公讲我们的意见，要他去

广州，同时，唐孟潇（唐生智）老是在那里不好，也要离开湖南。唐孟潇已有信给李品仙，唐想带兵。我们没有兵给他带，我把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让给他。”

苏民回长沙后，即把上述情况向程潜、唐生智作了汇报。

宋英仲，民革地下成员，当时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为了掩护民革市工委领导人程一中的安全和便于联系工作，邀程一中住在宋家。警备司令部的情报由宋密告程一中转中共地下党余志宏、刘晴波、梁君大、周季平等。时间长了，国民党地方当局似有发觉，宋英仲家（住白沙井）遭到搜查，收音机被破坏，写字台抽屉被翻乱，幸早有防范，未查出破绽。

沈坚，民革地下成员，与白崇禧部驻市郊开福寺军火库的守护连长翁某有私交，利用这一关系策动起义。后翁虽被强令撤退，但行至株洲渌江桥附近终于起义，并保全了存放在开福寺的全部军火，抗拒了白崇禧炸毁军火库的命令，使人民避免了一场灾难，充实了解放军的枪枝弹药。

宋仁楚，民革地下成员，是宋希濂的胞弟。方鼎英利用这一关系和宋商定，约会宋希濂总部常德办事处副主任董仲芭（宋希濂的亲信，黄埔四期学生），恰逢宋希濂父病故辰溪，董去辰溪办理丧事，约谈未能实现。1949年3月，宋仁楚受方鼎英之命去湖北宜昌会晤宋希濂，试探策反起义，宋希濂表示：

“当前正在进行和谈，可以瞧瞧。”后来，据闻宋希濂应蒋介石电召去奉化，联系也就中断。

苏本诚、苏本善是同胞兄弟，民革地下成员。当时苏本诚任华中长官公署陆空联络组中校组长，掌管国民党华中地区空军作战联络事宜。他以这一公开身份，将空中作战情报向事先商定好的中共党员周竹安密告，解放军因而得以防范，在军事上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18日至6月20日，湘赣两省连降暴雨，洪水猛涨。6月27日至7月2日赣江水位距东岸堤坊仅半公尺。这时，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分驻丰城、樟树、永泰、新淦、临川、龙骨渡、崇仁等地，共7个军，人数约30万。上述地段居民约200万人。白崇禧企图趁水涨炸堤，用水淹的办法消灭解放军。白便约见苏本诚，令他与衡阳一个姓罗的司令绝对秘密地联系，执行命令炸堤，并指定轰炸目标为泉港街之樟树西北55公里处、阳树之永泰西北5公里处、石口之新淦西北5公里处。苏本诚接受命令后即把这一重大情况送中共党员周竹安，并与其胞兄商定，用拖延时间的办法，阻挠炸堤命令之执行。如事发兄弟二人牺牲无疑，嘱先将家属作善后安排，并告知中共方面给予照顾。另一方面与衡阳联络，佯称此一任务必须调用三架B—25蚊式飞机，否则不起作用，请罗面陈白长官向空军总部调机。7月3日，B—25蚊式飞机调抵衡阳，白崇禧电令苏本诚飞衡，并于7月4日上午派专机来长接苏本诚去衡阳。苏本诚婉言向罗司令说：“炸堤对共军死亡性不大，而数百万老百姓则惨矣！”罗为之震动，沉默未语。次晨派飞机侦察炸堤目标，得悉赣江水位回退，乃转报白崇禧谓水位已退，执行这一轰炸任务已失去作用。西之这一狠毒罪恶计划未能实现。

五、邀请唐生智“出山”

唐生智是湖南军政界的耆宿，他的旧部遍及全国，湖南尤多，是左右湖南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他此时失意隐居故乡东安。1949年初，民革地下工作人员策动省参议会发动了反“三征”运动，反映强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促使了湖南要求和平的空气高涨。但黄杰、刘嘉树等人极为不满，依仗白崇禧的势力，威逼程潜表态不同意反“三征”行动。程潜大有孤军作

战、处境艰难之苦。为了争取和稳定程潜，民革地下工委派许松圃、唐伯球等人去东安，邀请唐生智来长沙。在此之前，黄栋受中共上海地下党和民联中央之命由上海回湖南工作，曾携郭春涛、程一中亲笔信去东安见过唐生智。后来周翊襄、陈云章、席楚霖等也曾去东安邀请唐生智来长沙。周翊襄曾任唐生智的秘书，关系更深，他先后三次去东安，唐表示：程潜无实力，他本人光杆一个，到长沙作用不大。最后经商讨，提议由唐的旧部刘兴担任衡阳警备司令，收编一些部队，目的在于自卫和截住白崇禧的后路，唐表示可行。并说：如颂公同意，他愿到长沙，但定要说明，他本人无此要求，而是唐伯球的意见。程潜接受了这一意见，即电邀唐生智、刘兴来长沙，共商国事，随即发表了刘兴任衡阳警备司令。但蒋伏生（原衡阳警备司令）抗命不从，又改刘兴为永宝警备司令。1949年4月，唐生智在周翊襄、陈云章的迎接下到长沙，受到了程潜和省城人民的欢迎。唐生智发表了讲话，呼吁湖南人民团结自救、争取和平，因而大大推进了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为程潜撑了腰壮了胆，给了黄杰、刘嘉树等反和平势力以打击。

唐生智到长沙后，即组“湖南和平促进会”。唐生智任主任委员，仇鳌、陈渠珍副之，刘公武任总干事，这样就团结了湖南中上层民主进步人士，大大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斗志，把和平自救运动推进了一步。

六、湖南省参议会

湖南省参议会议员，不少是国民党中上层的失意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其中有倾向革命的，也有顽固反共的。参议员的名额向例以全省中、南、西三路进行分配，因之影响力遍及全省。1948年12月，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与程潜政见不合，辞职去上海。赵是顽固派，他的去职削弱了顽固势力。这时唐伯

球、席楚霖得程潜的支持，当选为正、副议长，杨任严由席楚霖推荐任命为秘书长，凌兆尧被选为参议员，大大增加了进步力量。

从湖南酝酿和平运动开始，唐伯球即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刘润世、刘禄铨等取得联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议长地位团结参议会的进步力量，与程潜密切配合，对湖南和平解放有一定贡献。

1949年元旦，湖南省参议会通电呼吁和平，提出取消“动员戡乱”一切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接受中共和平条件等主张；同时推动成立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大团结”、“实行自卫自保”等口号，欢迎唐生智晋省与程潜合作，共策和运大计。从此，凡属有关和运的部署及措施，不便由省政府公开出面的，由唐伯球、席楚霖通过省参议会作出决议，建议省政府执行，或发出强烈呼吁与反动政府对抗，如停止征兵征粮，反对以田赋抵借券搜刮人民粮食，以金元券收购人民金银；查封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不准动用转移，通过省银行发行辅币券，自铸银元，以抵制金元券在湘省流通。唐生智来长沙后，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改组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公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省参议会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大造和平自救声势。周迦襄在欢迎会上大声疾呼：“湖南是湖南人民的湖南，孟公（即唐生智）讲的多么亲切感人。湖南人民决心和平自救，全力以赴，坚决反对战祸的摧残。为了和平，头可断、血可流，和平自救不可丢。我们要冷静头脑，认清大局，明辨是非，主持正义，奋勇向前，湖南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镇压和平自救运动，解散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威胁程潜，下令禁止一切和运活动，一时杀气腾腾，长沙城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少工作由公开转入地

下，但和平自救的声势有增无已。为了安定人心，继续战斗，省参议会邀集省市各团体举行座谈会，敦请陈明仁将军讲话。陈明仁在会上说：“长沙各界父老可以放心，保证长沙城听不到枪声。”寥寥放语，人心得以稍安，和平自救的信心更趋坚定。

在省自放会被迫解放表面上停止活动后，代之而起的是湖南救灾委员会，呼吁为滨湖大水灾筹款，提出不能再供应驻军口粮，要求客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借以反对白崇禧的战争叫嚣。此时白又施出调虎离山计，以李宗仁名义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省参议会领导群众团体分电李宗仁挽留，李被迫收回成命，白计未成，视唐伯球为眼中钉，曾率武装至校场坪唐家，迫令唐即日随程潜离长去邵，之后，白在衡阳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遗憾的是没有把唐伯球这帮政治掮客杀掉，程潜受了他们的蒙蔽。”

在和运活动期间，唐伯球与程潜过从甚密，经常深夜去省政府与程星龄、唐星、邓介松、邓飞黄、刘公武等密商，唐生智在省时也无日不有联系，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共商对策，在当时特务严密监视的恶劣环境中，风险是很大的。

七、消弭内部歧见

事情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民革湖南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度发生过分歧意见。其一是，许松圃提出吸收当时省政唐秘书长杨绩荪、民政厅长田良骥两人加入民革，并参加工委领导班子。程一中、黄栋不同意，认为杨、田二人系桂系人物，必须慎重，作为联络对象是可以的。许松圃则认为杨、田思想倾向进步，坚持己见，以致程一中和许松圃发生矛盾。程打算另组“民革南下工作委员会”相对峙。后经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派员调解，黄栋也从中斡旋，始告平息。

其二是，周建襄主编的《舆论导报》两次被省政府秘书长

杨绩荪强令停刊，周弼襄因此迁怒程潜。在复刊后，两次在《舆论导报》上发表文章强烈抨击程潜，力主唐生智主持湘政。这对当时程、唐合作共同走向和平是极为不利的。经黄栋向周弼襄做工作，才解决了这一问题。黄栋后来被任命《舆论导报》编委，加强了《舆论导报》的力量。

其三是，唐莽（桂良）与程潜的宿嫌已久，程潜在1948年回到湖南后，省会各界于7月24日为程潜举行了欢迎大会。程在欢迎会上曾说：“我今年六十有九，但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拚命，纵然到一百岁，我也有勇气与‘共匪’拚命……。”唐不理解程潜的非由衷之言，因而不满，打算以民革名义组织湘西一部分武装力量来改变湖南局势，并联络了当时湖南大学教授孙伟东与之合作，许以省建设厅厅长职务。消息传出后，黄栋向中共地下党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此举不利湖南人民团结自救，必须设法劝解，经唐伯球、曹伯闻等做工作，得以消弭。

实际上，程潜在1948年7月24日省会各界欢迎大会上的发言，是故作警人之辞的，连省保安司令肖作霖也不知内情，大为恼火，曾在会后向程潜说：“颂公今天的讲话影响很不好。”程回答说：“你要知道，南京也在听我讲话。”这就说明是故作姿态，意在蒙蔽国民党当局。

黄栋曾为此事去“湖大”，利用私人关系，在湖大组织了一些教授成立读书会，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指出湖南的出路，并到唐莽家交谈，分析形势，认为湖南的出路只有团结御侮，舍此无他，唐莽同意了黄栋的看法。一杨内部纠纷，在共产党人的调解、引导和帮助下，及时地得以圆满解决，并把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八、掩护周礼同志

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后，书记周礼先住在韶山一个乡村小

学，由这个学校的教师——他的战友和伴侣常杏云掩护。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省工委的指挥中心转入长沙市。这样，革命的据点和周礼的住所就在民革地下成员社会名流曹伯闻的掩护下，设在湖南省孤儿院（曹伯闻兼任院长）。周礼在这里开展了地下革命工作。孤儿院成为湖南人民和平解放事业的指挥基地。

曹伯闻早在1932年就曾资助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现象》、《新地》等刊物，营救过共产党人，掩护过革命的同志，资助中共党员从事革命活动。曹伯闻1971年12月13日逝世后，不少党和政府领导人深表哀悼。周礼来长沙后，先由曹伯闻掩护，后因曹伯闻受地方恶势力柳森严等人的排挤，辞掉了孤儿院院长职务，因而周礼转到龙伯坚处。

1949年5月，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派组训专员陈瑞衡，大队附马干臣到“湖南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简称“交联”），找民革地下成员交联首席代表周荣光，想从周的口中刺探中共长沙市工委交通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他们问周荣光是否认识傅作宾，并查询交联人员的情况。周荣光回答说：“我是交联的总负责人，交联的成立和它所进行的工作都是经过省社会处批准的，情况省社会处十分清楚。我就住在这里，随时都‘欢迎’来找我。傅作宾仅仅是认识而已。”因为时近中午，他们在临走时约周荣光第二天去伯陵路（现蔡锷路）中国农民银行二楼谈话。周荣光即将这一情况向傅作宾和周翊襄作了汇报。傅作宾是中共地下党员，交联的总支书记，又是交联的秘书长。交联是中共交通党总支组建的。通过民革组织及其成员活动，掩护了中共党组织和中共党员。

九、发动群众 争和平 反迫害

民革地下工委为了使其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人士易于

接受真理，认清形势，辨明是非，印发了民革中央颁布的《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国民党员书》等重要文件，同时，由黄栋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取来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它的实际内容是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城市工作政策》等文件，组织民革地下成员和一部分有联系的社会人士学习讨论，收到了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的显著效果。

在对外宣传发动上，当时民革掌握的有《舆论导报》（周翊襄、黄栋主办）、《双周评论》（李茂秋主办）、《长江日报》（廖文岛、钱去非主办）。另外，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和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国民日报》，都有民革的地下成员。如《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国民日报》总编辑梁士洁等，他们都能抓住机会，见隙就补，含蓄地报道新华社的一些消息，大胆地报道湖南和平自救运动，发表评论、通讯，大造和平声势。1949年6月，在和平自救的影响下，成立了“长沙市新闻界自救委员会”，由梁士洁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对和平自救的宣传，逐步有了比较统一的步调。

白崇禧为了对抗和平自救运动，成立了一个所谓“湖南省戡乱建国委员会”，以“聘请”形式硬性指定一些社会名流为“委员”，以华中“剿总”新闻处的名义，强迫长沙各报发表“委员”名单，行招摇撞骗之术。周南女中校长周昭怡被指定为“委员”后，极为愤恼，抵制吗？慑于白的权势，不能公开反对，乃求商于梁士洁。梁出点子，以“校务繁重，无暇兼顾”为由，不能担任“戡乱”委员，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周昭怡启事，这则启事一见报不少人纷纷仿效，几家大报都登满了这样的启事，白崇禧也无可奈何。

1949年5月左右，白崇禧无故逮捕了段梦晖，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各民主党派地下组织召开了声援大会，决定全

市报刊停刊一天，以示抗议，并出特刊向全市人民说明停刊的原因，呼吁省市各界声援，促使当局早日释放段梦晖。大会推梁士洁主编特刊，详尽报导段梦晖被捕原委，揭露当局迫害人民罪行。一时轰动全省，波及国内外。据悉当时香港报纸都以大号标题报道了这件事。解放后，中央有关单位将这份‘特刊’作为蒋管区进步新闻工作者对敌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文件而被保存起来。

《舆论导报》创刊于1948年元月，社长兼总编辑是民革长沙工委领导成员周翊襄，具有双重党籍的民革成员、中共党员黄栋也是《舆论导报》编委之一，梁士洁是这个刊物的重要撰稿人，中共地下党员黄维新（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公路工会常务理事）用黄特夫的笔名写了“全省工人团结起来，积极投入湖南和平解放运动”的文章，在该刊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工人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该刊立论激烈尖锐，在刊物封面上明白标明：“为建设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当时省政府新闻处长刘琼把这个刊物视为眼中钉，认为周翊襄是共产党，刊物是共产党办的，拟下令停刊，后通过梁士杰与刘琼的私人关系，从中掩护说合才幸免。但在1949年春夏，桂系杨绩荪任秘书长时，仍受到多方警告，有过两次勒令停刊的事情。

《双周评论》系民革地下成员李茂秋主办，这个刊物的重点是阐扬革命的三民主义，强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此启发掌管军政权力的国民党人认清形势，遵循总理遗训转到革命方而来。

该刊共出7期，先后遭受白崇禧两次警告，后以经营十分困难停刊。

1948年10月，周翊襄发展了当时刚当选为湖南省公路工会理事长的周荣光加入民革，在省公路系统中开展了工运工作。

其时，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得湖南经济衰败、百业凋零、物价暴涨，有如断线的风筝。“金元券”、“银元券”成了废纸，工人生活无着。周荣光以工会名义，备文报请湖南省公路局，要求工人工资改发银元，遭到拒绝，乃于1949年2月4日发动了全省公路工人大罢工，一时全省公路客运、货运陷于停顿。这次罢工斗争，持续了5天，工人受到了锻炼，对开展工人运动和后来开展的保产护厂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挥戈南下。5月间，白崇禧率部败退湖南，下令“空室清野”，一时乌云满天，白色恐怖笼罩长沙。针对这种复杂紧张的情况，中共长沙市工委成立了交通总支，并建立了“湖南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交联”）以领导省市交通事业、企业的保产护厂斗争。周荣光由中共长沙市交通总支的推荐担任了交联的首席代表，积极领导这一工作。交联成立后，中共地下党通过交联先后发动了全市性拒用“金元券”改用银元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和平以及反破坏、反迁移的保产护厂斗争，并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人士配合中共地下党员打入交联所领导的会员工会的“应变委员会”，控制了各“应变委员会”的领导权，从而有力保护了市电信局、省邮政局、省公路局、第二运输处、航运系统、铁路、电厂、交通部直辖长沙修车厂等单位的器材、设备和交通工具，仅第二运输处就保全了客、货车辆180多辆，汽油900桶，机油172桶，银元3,000多块。

交联在保护财物和促进科技人员走向人民行列做了不少的工作，是立下功劳的。

民革在新闻界、教育界、转业军官、小学教师等社会团体中也积极开展活动。如湖大土木系教授孙伟来、财政部湖南区贷贷税局主任秘书钟山、省农会周乃古、省杂志界联谊会周翊襄、长沙新闻界从业人员互助会常务理事梁士洁、长沙市小学

教师互助会常务理事叶介胃、长沙市省级员工联谊会常务理事傅猷、湖南各路军官联合通讯处的郭芳梧、田云路、何成吉、徐则林、曾昆生、秦景园、湖南警察协会彭萼等人，在反迫害、反三征、反迁移、反破坏、策反、争取新闻自由、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安全，保存财物、档案，策动军警人员起义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十、和平签名运动

早在1949年1月4日就由湖南省市51个公法团体联合组织的“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就开始发动了和平签名运动。

2月，和平自救浪潮有所高涨，人民通过省参议会，在唐伯球、席楚霖的支持下，发起了反“三征”运动，得到了全省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平自救的种子，通过反“三征”的灌溉，开始破土而出。

3月，天空开始出现乌云，黄杰、刘嘉树等对反“三征”运动很不满意，威迫程潜表态。针对这个形势，民革派许松圃、唐伯球前往东安，邀请唐生智来长沙，并联络仇鳌通过省参议会共同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大造和平声势，打击顽固派，支持程潜。4月的长沙和平自救达到了高潮。

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对和平民主自救运动进行镇压。周天贤、鲁蕩平、王况裴等发起倒程阴谋，白崇禧当而威逼程潜交出政权去广州当考试院长。这时和平签名运动，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由民革地下组织和社会名流出面进行了秘密活动，起草了《长沙各界为拥护当局主张避免战祸呼吁和平宣言书》文稿，并秘密油印数百份，串联各界知名人士签名，汇总在适当时机送交报界发表。《宣言》是7月24日见报的，实际签名运动在6月就已经开始了，宣言是一个历史文献。

十一、湘潭等地的斗争风云

民革湖南省工委成立后，在给民革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谈到：“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于长沙以外的地方，也密切注意，如湘乡、湘潭、衡阳、浏阳、平江、醴陵、郴县、宜章、资兴等县市都派出了同志分赴各地活动，建立了临时小组，开展了工作，策动起义……。”湖南各县市的工作就是在这一决定下进行的，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杂和人事社会关系条件，不少县市是通过湘潭小组联系工作的。

1948年4月，许松圃、程一中、周翊襄、唐生节联函邀请湘潭秦定甫（湘潭县参议员）来长沙，并介绍加入了民革组织。在这以前的一月，湘潭的田翠竹由周翊襄介绍加入民革组织。秦、田两人早就熟悉，民革湘潭小组在他俩的筹建下，吸收了黎泽荃、刘甲华、平泽荫、屈丙生、黄佩元、赵桂馥等17人正式组成。其中屈丙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初期并不明白他这一政治身份，他是以民革地下成员参加小组活动的。

湘潭解放前夕，先后共吸收了50多人加入民革地下组织，其中大多数为湘潭的中上层人士，包括军、政、警各界和事业、企业、新闻界、人民团体等单位掌有实权思想比较进步的可靠人士。这为以后推动和平自救运动、策动起义、搜集情报、保护人民财产起了配合中共行动的重要作用，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

1948年春，秦定甫以民主人士身份，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掩护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并与民盟地下组织建立了关系。中共党员欧阳永全经常以私人关系参加座谈形势、交换意见会议，实际上奠定了统战基础。秦定甫由长沙回湘潭后，共产党人欧阳永全、张译文对秦定甫加入民革表示赞成和支持，经过会商，决定参加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小组。民革代表为秦定甫、黎泽荃，

民盟代表为唐士义、傅宗奎，自此湘潭的地下革命行动在中共统战小组的领导下，以会议形式商讨布置任务分工合作进行。

组织小组学习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城市工商政策》和民革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根据统战小组决定，以“解放军调查委员会”、“南下工作组”的名义印发了《告民众书》、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告工商界人士、告妇女书，翻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告。通过私人关系散发，夜间在湘潭四城张贴，有的邮寄一些思想顽固或对革命动摇不定的人。民盟地下成员也参与了这一革命行动。这些宣传活动对顽固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人民群众起了稳定、团结、增强斗志的作用，对革命认识模糊、举棋不定的人起了启发觉悟的作用。

统战小组会议决定响应省方号召，推黎泽荃、周若霖、傅家圭以县参议会名义发起组织“湘潭自救委员会”，计划掌握湘潭全县的武装力量，从事自卫迎解工作。虽然委员会后来为白崇禧强力解散，但和平自救的种子已在全县人民心中生下了根。

为了掌握敌人动态，组织决定，龚业光任湘潭县政府主任秘书，该县县长吴声镐是一个顽固派，与龚业光有同学关系。吴曾邀龚共事，龚知吴的底细，不愿就职。后来秦定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说服龚业光担任了这个职务，并要他负责搜集县政府的情报，监视吴声镐的动向，设法保护县政府的全部档案。

龚业光任职后，通过民革组织与县政府政法秘书刘巽安取得了联系，以吴声镐的名义批准释放9名政治犯，阻止吴声镐准备盗卖运走食盐6万担和大批粮食的阴谋。

统战小组会议认为，湖南和平解放已成定局，白崇禧部败退时，必将大举破坏各种建设，劫持人民财产，不法之徒亦将

乘机作乱，为此必须发动群众自卫，控制城乡原有武装力量，保卫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财产。这一任务由秦定甫、黎泽荃为主承担，

当时湘潭、醴陵、攸县、衡山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唐直掌管4县13个乡的武装力量，他与秦定甫、黎泽荃早就相识。中共党员唐士仁、刘智通过民革关系先后和唐直接触做工作，因而控制了这一支武装力量，在保卫地方治安，保全华石煤矿和人民财产起了作用。

醴陵、平江历史地位特殊，前者是许多国民党军、政界知名人物的家乡，后者是革命老根据地。在1949年3月，民革就在两地建立了地下小组，醴陵沈宪章、平江吴樾荪在湘潭小组的指示下，策动了醴陵的刘建文、刘楚雄，平江的武子涛、浏阳的焦达梯等地方武装部队起义，截击了白崇禧败退的部分部队，并用重金雇佣4人保护淅江桥墩，剪断了国民党军队炸毁桥墩的电线，保全了8个桥墩。

民革在衡阳市的地下革命活动，开始是以私人社会关系进行的。其时，蒋伏生任“衡阳警备司令”，是一个反共的顽固派，有“蒋屠夫”之称，但与白崇禧有矛盾。他是湖南和平起义在衡阳的绊脚石。为了清除这个“毒瘤”，程潜接受了唐生智的建议，曾下令调换，但蒋伏生抗命不从，民革湖南省工委程一中、许松圃指示秦定甫去衡阳活动，策动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衡阳解放后加入民革）设法驱赶蒋伏生。

1949年4月秦定甫到衡阳，利用其子秦本杰（民盟地下成员）和在衡阳工作的关系，联络了唐子健（民盟成员）、王之康（后加入民革），吸收了衡阳市教科科长唐举政加入民革，要他协助杨晓麓工作。杨晓麓以市参议会的名义，支持唐生智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4日程潜发表了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后，杨晓麓公开表示支持，白崇禧以响应和平起义“罪名”将杨晓麓

逮捕入狱。随即押解桂林，无法营救，因解放军进攻广西，白崇禧急于逃命，杨晓麓被关押在贵阳牢中，解放后才被释放回衡。

谢晋当时隐居衡阳，在他的社会声望掩护下，吸收了程辅军、刘子直、胡济石等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这时，胡济石受谢晋之命去香港与中共中南地区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回衡阳后即成立了“中南区人民动员委员会”。在这个组织领导下，以胡济石家为据点，与中共湖南省衡阳工委负责人刘国安、卢其超、地下党员黄启成、李榴华以及中共地下武装——衡阳西乡等游击队取得联系，提供情报。

（周荣光 范丁几 整理）

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

民盟湖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湖南民盟地下组织建立的经过

(一) 建盟的尝试。

1946年至1947年这段时间中，民盟总部多次作了在湘建盟的尝试。

早在1946年2月，民盟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肖敏颂曾奉命回湘考察情况，相机发展组织。不久，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建盟没有成功。从这以后，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民盟总部两次迁移，由重庆而南京而香港，盟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越来越困难。在这期间，民盟总部仍先后数次派遣早期入盟的同志回湘开展筹建盟组织的工作。1946年5月民盟总部组织负责人周新民曾嘱托李鳌在回湘后相机开展盟务活动，李因故于次年冬才回湘，旋即被捕入狱，保释出狱后，仍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无法进行活动。1947年2月，叶克强奉周新民指示，持民盟总部给彭一湖的介绍信，从南京回到湖南，与彭取得联系，正准备开展盟的活动，因南京民盟总部被查封，盟的负责人大部迁港而被迫中断了联系，中止了活动。蓝肇祺由张兆麟（刘乐扬）介绍去香港，在香港加入民盟，并奉周新民、李湘符指示返回湖南协助建盟。1947年底，张梓敬在有关同志的支持下去香港，这时正值民盟中央举行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在民盟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谴责和否定了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宣布民盟

*民盟湖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根据部分民盟老同志的回忆整理了此文。

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积极支持“以人民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并以“群众性的革命的组织路线”代替过去的“争取合作公开的组织路线”。三中全会这些重大决定，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张梓敬回湘后，即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肖敏颂、余志宏、傅白芦、孟树德、刘禄铨、唐士义、黄定成、曾楚樵等，着手筹办《新时代》周刊，借以宣传革命形势，广泛联系新闻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张梓敬动员岳母捐出一批银洋作办刊之用。《新时代》于1948年6月创刊，共办了23期。发行量达3000多份，遍及省内外。同年11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种种借口，迫令停刊。《新时代》发行的时间虽然不长，而参与其事的盟员和交叉党员得以借此增强联系，互助互勉，并及时把该刊开展的宣传工作转为组织活动，为湖南盟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盟组织的建立。

1948年12月，肖敏颂、余志宏、刘禄铨、张梓敬等4位在肖家秘密聚会，分析了形势，认为建立湖南民盟地下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推刘禄铨持肖敏颂致总部的信件赴香港。原来，在盟的一届三中全会上，盟总部即已决定在湖南建立省一级的组织，并指派了张兆麟负责筹备，张时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不能亲自返湘，得知在湖南早期入盟的同志只有肖敏颂一人，正考虑与肖建立联系。民盟总部负责人李相符还介绍金河来长协助肖敏颂建立盟的组织。刘禄铨与张兆麟都是地下党员，又是老战友，刘一抵港，就在张的引导下，会见了盟总部李相符、周新民等负责同志，经过研究，决定成立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备委员会，批准了刘禄铨带去的筹委名单，并给湖南筹委取了个代号叫“苏湘民”。刘禄铨回湘后，传达了总部的决定，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便于1949年1月10日正式成立，由肖敏颂任主委，刘禄铨负责秘书工作，余志宏负责宣传

工作，张梓敬负责组织工作。同年2月，杨伯峻（党员）从广州回长，奉命参加民盟的工作，同时李鳌也与筹委取得了联系，应邀参加筹委会。而余志宏、刘禄铨俩同志因党内另有任务，暂时退出民盟。于是筹委会作了部分调整，改由张梓敬负责秘书工作，李鳌负责组织工作，杨伯峻负责宣传工作。2月中旬，筹委会推派张梓敬赴香港盟总部汇报工作，盟总部根据汇报的情况，决定撤销筹委会的名义，改称民盟湖南省支部执行委员会，时间是在2月25日，所有执委会的成员仍由原筹委会成员充任。从2月至7月，因工作需要，执委会逐步扩大，除肖敏颂、杨伯峻、李鳌、张梓敬四同志外，先后有杨荣国、谭丕模、刘禄铨和杜迈之四同志参加。在执委会之下，增设了文教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两个机构。文教委员会由杨荣国、谭丕模、王西彦、朱剑农、王学膺等五同志任委员，杨荣国为主任委员，于6月12日成立，进一步开展了文教界的工作；财务委员会由陶重周、叶克强、蓝肇祺、李亦怀四同志为委员，陶重周为主任委员，于7月3日成立，为湖南民盟的地下斗争及解放初期的组织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

（三）盟组织的发展。

湖南盟组织的发展，是按照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1949年2月1月《对当前发展组织的决议》的规定进行的。这个决议，对发展组织工作作了9条规定，其中关于发展对象规定为：“主要应向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中小公务员，放手地吸收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到组织里来，以扩大本盟的组织基础。”“特别应积极争取进步的坚决的革命知识分子为本盟组织的中心骨干”；对新入盟者，明确规定“应严格考查其过去的历史关系，并严格执行入盟手续”；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中“更应严密的加强组织，绝对避免不必委的横的关系”。此后，民盟湖南省支部也作出了关

于组织工作的决定和发出了《新条件下的组织工作》的文件，对地下斗争条件下的组织工作和入盟手续作了具体的规定。

还在省筹委会建立之前，根据斗争的需要，有的地区已发展了一些盟员，并开始筹建盟的组织。筹委会成立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根据盟中央和省筹委会的决定，盟的组织也相应地获得发展。早在1948年12月，长沙就建立了市分部，曾楚樵、王石波、马午、龚鸿兴、杜迈之、金河、刘文炳先后担任市分部委员。市分部下辖三个区分部，有盟员120多人。湘潭县分部于1949年3月成立，唐士义、秦文熙、秦本立、张禹勤、肖传经等五同志为分部委员。旋即发展文教界进步人士钱南浦、李维章等60多人入盟。省支部还分别派吴文澜、赖文彬、蔡其昌、陈振厚、刘勇等同志去浏阳、醴陵、攸县、宁乡、安仁等地建立民盟分部，发展了一批盟员。至此，湖南共建立了7个盟的市分部。衡阳是湘南重镇和交通枢纽，根据斗争的需要，建立了民盟衡阳直属区分部，先后由张鹤皋、秦本杰、屈子健、粟受祺、蒋介石负责，开展了一些活动。鉴于民国大学的斗争十分剧烈，而师生中盟的基础较好，也建立了直属区分部，由王石波、王学膺、谭立刚、雷久杜、黄伯锦等同志负责。在湖南大学，成立了盟的直属教授小组，联络几十位教授，每周举行一次座谈，宣传革命思想和进步理论。盟省支部还派周孝本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盟员，郑昌壬、蒋静、姚学文、吴天昌等同志，都是在那时入盟的，他们配合地下党做了一些革命工作。盟省支部还派张孝仁去常德、姚人褒去安化、盛义褒去益阳、蒋挚夫去湘南（江华、宁远、道县）、周松茂去常宁开展活动，发展了一些盟员。尹华民也奉上海市支部之命回到我省邵县做盟的工作。这些盟员和盟的组织在盟省支部和有关市县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开展了广泛的对敌斗争，陆续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入盟，其中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

师、新闻记者、公务员、银行职员、大学生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也有少数工商界进步人士参加。在7个多月的时间内，全省盟员总数达到500百多人。当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极端恶劣，盟组织与盟员之间又是采取单线联系，以致有些边远县份实际上很难形成有组织的活动。总的来说，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活动也时起时落，有的甚至中途失去联络。解放以后，根据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工作方针，盟省执委会决定对长沙、衡阳、湘潭、常德等市的盟组织进行整顿，并作适当发展，同时结束了在地下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小县组织，要求保留盟籍的同志，由省支部个别联系。按照盟中央的规定，解放后办理了盟员重新登记，经过审查批准的，才取得盟籍，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因参军参干，没有履行盟员重新登记手续，因而没有取得盟籍。

湖南民盟组织是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建立起来的，不但指导思想明确，而且与地下党的关系密切。它一成立就得到中共地下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而且有一批交叉党员在盟内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如交叉党员余志宏、刘禄铨、杨伯峻等同志都直接参与了盟组织的筹建。湘潭地下党还成立了统战小组，由唐士义代表民盟参加，通过统战小组，领导和部署了湘潭的地下斗争。其他各地也多有交叉党员参加盟的工作，有些没有建立地下党组织的单位，盟员也能主动按照地下党的部署配合进行工作。

在湖南盟的地下斗争中，盟的同志与党的同志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

二、湖南盟的地下斗争

湖南盟组织的建立，正值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共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

召，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时。在这个形势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战略部署，从各条战线上发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打击和孤立敌人，壮大革命力量，迎接解放，成了湖南盟组织的中心任务。

1949年5月24日，民盟湖南省支部向全省各级盟组织发出了《对当前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正确分析了国内和湖南的斗争形势，论证了“湖南人民将于短期内获得解放”，号召全省盟员响应中共湖南领导机关发出的“迎接解放”的战斗号召，对当时盟的工作作出了如下的部署：一、“配合友党开展城市工作”；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和迫使本省统治者实现局部和平”；三、“培养和储备干部”；四、“发展和巩固组织”；五、“加强自我教育”；六、关于武装工作问题，原则上应让中共去做，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策反”和“获得情报”上面。这个指示概括了从民盟湖南省支部执行委员会成立到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情况。在这段时间里，湖南民盟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早在1948年12月刘禄铨由香港面来，从民盟总部领回一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书刊。后来由蓝肇祺、张梓敬又先后从总部带回一批毛主席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其他小册子。杨伯峻、余志宏又陆续从地下党领到一批小册子和其他文件。这些书籍资料一到，即由洪度等同志以“民主书店”为掩护，日夜翻印，迅速送到盟员手里。叶克强还秘密收录新华社消息，油印成传单散发，“七一”前夕发表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播稿，第二天就由他油印发出，群众争相传阅。当时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中形成了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热潮，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

为了把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扩大宣传效果，长沙市的盟员和地下党的同志分别组织了几个半公开的群众性的“学会”和“协会”，如“新民主主义学会”（由杜迈之负责），“新民主主义合作协会”（由龚鸿兴负责）等，吸收要求进步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参加。“新民主主义学会”举行过几次讲座，每次听众达百余人。“新民主主义合作协会”发展会员达40余人，有的被先后吸收入盟，壮大了盟的组织。如程大森、廖益衡、张轶群、陈显尚、邱耀、陈励予、崔详凯等，都是先参加上述组织然后被吸收入盟的。叶克强等还团结了进步青年数十人，组织“民主青年社”和“民主秧歌队”，积极参加迎解工作。各地盟组织都广泛运用读书会、时事报告会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湘潭县分部支持、推动湘潭姜畲地区盟员陈德维、张友麓等筹办了鸭头山暑期民众学校，招收学员150多人，半天劳动半天上课，由学校供给中餐和书籍课本，进行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该校学员在迎解工作中表现很好，受到人民政府接管代表的赞扬。

各地盟组织还配合地下党做了其他一些组织群众的工作，民盟湘潭县分部参加了湘潭县中教联的筹建，唐士义、秦本立等被推为教联理事，负责组织和福利部门的工作。中教联在中学教师中开展活动，策动成立各科教学研究会，倡导拥护和平、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进行斗争。湘潭县分部还在湘潭学生运动的中心湘潭简师的学生中吸收了杨春林、周炳炎等7同志，并配合地下党推动了湘潭县学联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后来由于民盟规定不在中学生中发展盟员，这批学生全部被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湘潭县分部委员秦文熙，配合地下党团组织，排除了旧湘潭妇女会的阻扰，组织了昭潭镇（湘潭城关）民主妇联，由秦文熙、向自治分任正

副主席。民主妇联成立之后，组织了宣传队，慰劳和救护队，在迎解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湘潭县分部还在上层人士中进行了工作，如通过湘潭地下民革组织负责人秦定甫，策动湘潭县参议员黎泽荃等牵头组织自救会，吸收了开明士绅湘潭县副议长傅家圭入盟。民盟醴陵县分部负责人赖文彬利用担任醴陵师范教务主任的职务之便，配合校内的地下党员，组织该校学生参加“反对内战，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示威游行。他还说服醴陵师范校长易竹薰打消顾虑，支持学生运动。在这次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醴陵成立了中教联，赖文彬被推为负责人之一。益阳的盟员以豫章学校为据点，配合地下党，开展迎解活动，解放前夕，出版了《天亮了》刊物。

（二）大力支持、协助办《晚晚报》。

《晚晚报》是长沙市一家有较长历史、在市民中很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创刊于1931年4月1日，盟员蓝肇祺为创办人之一。1935年，该报因揭发湖南省银行大贪污盗窃案，被当时的省主席何健勒令永久停刊。抗战胜利后，经蓝肇祺、康德、戴德嵩等积极努力，克服了重重障碍，使报纸得以在1947年3月复刊。复刊以后，吸收了大批进步报人（包括一些地下党员和盟员），坚持进步方向，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很受群众欢迎。1948年5月，蓝肇祺赴香港时，民盟南方总支部负责人指示，一定要坚持把《晚晚报》办好。蓝回长后，继续团结报社全体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利诱，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极严，规定在报纸付印之前，必须送检大样，遇有被删节的消息，报社就以“开天窗”的办法来对付，聪明的读者一看便知，反而弄得新闻检查机关处境尴尬。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公然将总编戴哲明、总经理戴德嵩拘留审讯，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才不敢对他们下毒手。接着，反动当局又报请内政部实行永久查

封，然后由国民党省党部组织处长杨粹以伪善面孔出面调停，遭到报社同仁的严正拒绝。经过极其复杂的斗争，终于获得启封复刊。从此该报以更坚定的斗志和更新的面貌重新与广大读者见面，迎接长沙的和平解放。

（三）推动学生运动。

民国大学是一所由国民党人鲁荡平长期把持的学校，设在湖南宁乡农村。早在1946全国学生运动高涨之时，民大的学生运动已有了一定的声势，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如谭立刚、黄伯镛等都曾到长沙市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但由于民大没有地下党的组织，运动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而反动党团特务对学校控制甚严，斗争是相当艰苦的。1949年春，王石波受盟省执委会的委托，在民大建盟。王受命后，根据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先后在学生中发展了雷久杜、谭立刚、黄伯镛、莫先瀛、丁皋、梁光日、胡定光、刘鼎初、康中兴、段辉采、曹子标、杨国勋、张祖建、唐荫荪等同志入盟，于3月间建立了民盟民大区分部；由王石波任主委，谭立刚负责学运，雷久杜负责组织，黄伯镛负责总务。当时学生中的社团如鳧山学社、雷雨学社、晨风学社以及经济系、外语系、中文系等系学会，几乎都为盟的同志所掌握。民大区分部成立后，联合各个社团，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举其大者如：一、“倒鲁”运动。首先，盟区分部联合各个社团，促使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揭发学校一系列的问题，然后经过酝酿，成立了“革新委员会”；接着举行了全校性罢课，要求学校当局作出答复。鲁荡平见势不妙，避到长沙，不敢回校，却在暗中遥控指挥那些职业学生进行阻挠破坏，甚至公然鸣枪威胁，这就更加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盟区分部考虑到学校地处农村，缺少有效的外援，而面对的又是拿枪的敌人，这就要求更好地隐蔽自己，争取外援。于是向盟省执委会报告，经省执委会介绍，

派盟员杨戡前往姜亚勋率领的地下武装“湘中游击队”取得联系。姜部同意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盟的同志可向他们活动的地区靠拢。从此，盟区分部与姜部的联系日益频繁。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倒鲁”运动不久便为“护校护产”斗争所代替。“倒鲁”本身未取得直接结果，但是锻炼了盟员，教育了群众。二、“护校护产”斗争。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一举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民大校长鲁荡平心急如焚，打算变卖校产，携款外逃。盟区分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一部分同学，成立“留校同学会”，开展“护校护产”工作；并由胡定光负责，在长沙民大办事处查封校产，清算帐目，使鲁的阴谋未能得逞。同时在长沙由王石波、王学膺、朱剑农等民大教师、教授及留校同学会学生代表，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把学校迁往长沙。当时，学校行政机构已近于瘫痪。为了统一领导，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所有搬迁事宜，由迁校委员会统筹进行。经过与各方面的接洽，选定长沙市韭菜园原圣经学院为临时校址。学校所有设备，包括图书仪器文书档案，均于8月份完整无缺地搬到了长沙。湖南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该校，将它并入湖南大学。

民盟湘潭县分部在地下斗争时期，在地下党领导下，把当时的湘潭简易师范办成了为人们称誉的红色堡垒。该校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苦，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民盟分部负责人秦本立在该校任教导主任，唐士义、秦文熙、张禹勤等也在这个学校任教，学校教师有将近半数是盟员，在校内成立了民盟区分部，由易克俊任区分部主任。民盟同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经常在课堂上宣传革命道理。早在1947年，教导主任秦本立就强调学生自治，反映学生的意见，迫使学校当局辞退了教师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从那以后，地下党策动的学生自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盟组织发动盟员教师，指导学生办起了

大批民主墙报。1949年4月由湘潭简师带头发动了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和“四·一三”惨案的运动。这一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县的学校。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准备对简师进行镇压，扬言要开除一批带头闹事的学生，警察局也派人到学校进行监视，跟踪进步同学，还准备搜查学校。秦本立等和地下党的同志一道据理力争，迫使学校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动员几位县参议员向当局保证，说明学校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只是学生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自发行动。此外，还把从反动当局那里获悉的黑名单及时转告地下党，使地下党同志作好了应变准备。

（四）策反工作。

从民盟的性质、任务来看，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似乎不属于盟的活动的的主要内容。但在人民革命战争节节胜利、湖南面临和平解放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凡是有利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利于促成湖南和平解放的事，盟组织自然应当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尽力而为。加以盟员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进行策反工作也是有条件的。正因为如此，策反工作在湖南盟的地下活动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举其大者有：

（1）策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起义。

1949年3月间，盟员龚鸿兴通过盟员程大森（中央合作金库辅导处副处长，曾留学苏联）的关系，与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陈庚有了接触，又通过陈庚，同湖南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建立了联系。盟省执委会掌握了这个情况后，由杨伯峻布置龚直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将各自能控制的部队，包括驻地、官佐以及他们的思想倾向造具名册交了出来。关于官佐的思想倾向，用符号表示，标“○”者，表示陈、王可以直接指挥；标“？”者，表示不可靠；无标记者属于中间状态。陈庚在交名册时，严肃地对龚说：“龚先生，我和王司令

的两条性命一起交给您了。”龚得到名册后，立即送由杨伯峻转交了地下党组织。后来地下党又派了专人，经龚介绍，继续做他们的工作，陈、王二人终于跟随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和平起义。

此外，盟组织还发动盟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做了不少的转化工作。如姚人褒利用其父亲的关系，多次与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处长陈浴新洽谈；蒋肇夫在江华县奉人民解放军137师之命，赴蓝山策动了国民党军长谢声溢起义；肖如柏利用岳婿关系，做其岳父欧冠的工作；陶重周利用宗族关系，向国民党老军人陶柳以及长沙警备副司令陈申传做宣传教育工作，策动他们参加和平起义；常德市盟员利用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戴修瓚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是儿女亲家的关系，通过戴去做张的工作；对于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及其周围的人，如刘岳厚、姜和瀛等，也运用各种渠道（包括主委肖敏颂本人），同他们保持接触。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对于造成强大的革命攻势，实现和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2）协助地方武装起义。

在人民解放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不少地方武装纷纷要求起义，投靠人民。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地下党。在这种情况下，有几支地方武装，通过各种渠道，与盟组织建立了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安化李致中、李震沛等率领的一个团。盟组织征得地下党的同意，特派邹今铎（化名孟尚友）前往协助工作。随后又派曾楚樵（化名黄蒂根）前去传达有关指示并了解情况。后来，这个团与姜亚勋率领的“湘中游击队”建立了联系。该团活跃在资水流域，和反动的地方武装进行过战斗，为保境安民、堵截蒋白军西逃，支援解放军147师胜利进军，作出了贡献。为了支援姜亚勋的“湘中游击队”，盟省执委会

还经由蓝肇祺、戴德嵩等，筹集银元约500元和一批药品，派刘德涟化装送到姜部；又经龚鸿兴之手，向姜部输送了一部收发报机，由姜部政治部主任梁尚达进城接收。

（五）护厂、护产、反迁移、反破坏的斗争。

湖南临近解放时，蒋白反动派妄图在败退时进行破坏，对所有企事业单位、厂矿的设备和资料，命令能搬迁的搬迁，不能搬迁的就地销毁。湖南盟组织根据地下党的统一部署，布置广大盟员积极投入护厂、护产、反迁移、反破坏的斗争。以长沙市为例，在湖南省公路局及其所属汽车修配厂有一个盟小组，盟员工程师何道藩、肖如柏、邱炜等积极配合地下党开展了护厂、护产斗争，使湖南公路系统未受到破坏，湖南刚一解放，公路就畅通无阻。在湖南省高等法院及其所属第一监狱也有一个盟小组。盟员曾俊修、王华民和王效鹏3同志团结老工人、老技师切切实实做好了护产工作。第一监狱下属有一个印刷厂和一个缝纫厂，还有20多条枪支，为防反动派破坏，他们作了周密的掩护，尤其是那20多条枪支，曾俊修、王华民两同志以看守主任的合法身份，暗地扣藏，拒不调出，到长沙解放，才把全部枪支和其他机器设备完好地点交军管代表接收。当时，接管代表看到在法院和监狱没有地下党的组织，而盟的地下组织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曾倍加赞许。此外，在湖南省银行及其所属印刷厂有陈显尚，在湖南省合作社有廖益衡，在长沙电讯局有龚鸿兴所联系的人，他们都配合地下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护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衡阳，护厂护产斗争也进行得很有成效。例如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立即下令拆迁衡阳市电讯局的电讯设备，电讯局的盟员蒋介石、黄萃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设法拖延、稳藏、抗拒，终于把电讯设备全部保存下来。在白崇禧总部的头目们与在长沙的国民党要员通话通报时，我们的盟员同志经

常能窃听到他们一些通话通报的内容，随时转告地下党，其中有些是极为重要的情报。衡阳解放前夕，白总部准备炸毁衡阳电厂，盟组织配合地下党策动衡阳商会的头面人物黄匡伯（黄当时与盟组织有联系）以商会名义，用钱买通被派来执行炸厂的人员。取出了炸药，使电厂得以保全。衡阳田粮处库中桥办事处是集粮较多的地方。盟组织设法让盟员谢绍安打入该处，担任了办事处主任。他发动群众阻止反动派征粮，顶住种种威胁利诱，坚持达3个月之久，使反动派未能运走一粒粮食。

湘潭县分部在设法拖延抗缴军粮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当时，白崇禧的部队要提取湘潭的田赋谷作军粮，湘潭县政府拟从仙女、黄龙、姜畲、正心四乡调运40多万石，通知下达四乡乡公所，限3日内如数运到县城待命，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湘潭县分部负责人获悉这一消息之后，一方面组织盟员徐正夫、李维章把一消息向四乡公布，造成群众不满，发动群众起来抵制，另一方面邀集县参议秦聪甫等，以群众代表身份到县政府请愿，说明这一带粮食短缺，交通不便，农民群起反对征粮，为免激起民变，建议县政府另寻建径，终于迫使县政府收回成命，等到他们再到其他乡征调军粮时，公文往返，稽延时日，白的部队急于逃跑，结果一粒粮食也未征到。

（六）大搞调查，收集整理国民党军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情况资料以备接管。

盟省执委会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印发了调查提纲，发动盟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泛收集国民党军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料，以便掌握情况，为接管作准备。由于盟员散布在各行各业，对其所在行业和单位的底细，一般都比较熟悉，所以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比较顺利。前面提到的有关策反、护校护产的斗争等，都有书面材料上报，使地下党能够及时掌握情况。至于比较系统的调查报告，单只长沙市盟组织就收集了55份，包

括省会重要的官僚资本企业，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公共事业机关、监狱、仓库、银行、文教团体等各个方面。衡阳市盟组织系统地调查了在衡阳的国民党特务组及其成员的名单。所有这些调查报告，都由盟省执委会及时转交了地下党组织。湘潭、衡阳等市县，也都收集了一批调查材料，由市县盟组织转交给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或人民政府。在盟组织收集的调查材料中，有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湘潭在滴水埠一带有一些盐矿资源，这项重要物资，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湘潭县分部组织盟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有关盐矿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反动派有抢着运走食盐的迹象，这一调查材料送交地下党后，受到了高度重视，地下党立即在各盐矿组织自卫队护盐，防止了食盐外运，并把已运走的80包食盐追了回来。

（七）向蒋白反动派发动政治攻势。

1949年5月，白崇禧的部队从武汉败退到湖南后，给湖南的和平解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按照党的策略，应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以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为此，盟省执委会决定以“反桂系军阀大同盟”的名义，印发一批传单，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把桂系势力赶出湖南。传单是委托一家小报的印刷厂，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印成的，由长沙市盟的各个基层组织负责人秘密分发给全体盟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约定在下午4时至7时在全城散发或张贴。工作按预先计划好的时间和路线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一时大街小巷，传单纷飞，市民争相传阅，暗地叫好。在散发中还出现许多动人的事例，如有的巧妙地投进了白崇禧的总部，有的投邮寄给白崇禧本人，有的乘人不注意，把传单放置在车站候车室的座椅上，有的借购买东西把传单放在商店的柜台上，更多的是邮寄到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商店，散发总散达3000多份。这一行动，尽管有引起散人的警惕和招致打击的危险，在斗争策略上不无缺点，

但更应看到它在震慑敌人的气焰和鼓舞群众的斗志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长沙市的盟组织还分函桂系在湖南的同伙20余人，劝其弃暗投明，以孤立、分化桂系势力。湘潭盟组织协同地下党以“解放军调查组”名义，散发了《告各界士绅书》、《告帮会分子书》、《告军警宪首要分子书》等，向敌人展开了各种政治攻势。

（八）筹办《民主报》。

由于盟员中有不少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或与新闻界有密切的联系，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大家迫切要求创办一个报纸。鉴于民盟总部曾办过《民主报》，就想继承这个传统，也以《民主报》作报名，作为湖南盟的机关报。盟省执委会据此作了决定，指派杨伯峻、杜迈之、蓝肇祺、李幻如等同志负责筹备。在筹备过程中，蓝肇祺提供了他的私寓作编辑部和员工宿舍之用，同时千方百计解决了印刷机器设备等棘手问题。为了筹集经费，省执委会的财务委员会特派蓝肇祺、康德、叶克强三同志赴香港，向在港的湘籍人士募得港币5000多元，全部拨作办报经费。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民主报》终于1949年8月5日，即长沙和平解放之日创刊，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西南地区的和平解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民主报》发行不到一年，终因条件不具备而自动停刊，所有设备器财、图书资料，全部移交人民政府。

回顾湖南民盟的这段历史，虽然为湖南人民所作的贡献微不足道，但一些早期入盟的同志，回忆起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的战斗情景，仍不免豪情满怀，津津乐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盟对于接受中共的领导，与党配合作战，思想上一向是明确的，行动中也是贯彻了的。中共湖南省委在致湖南民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说，民盟与党是“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对民盟作了很高的评价，使全体盟员受到极大的

鼓舞。湖南民盟将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附： 1949年至1952年湖南民盟
组织领导成员名单**

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委员

(1949年1月正式成立筹委)

筹委委员：肖敏颂 李 鳌 杨伯峻 张梓敬
刘禄铨 余志宏
主任委员：肖敏颂

民盟湖南省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9年2月成立执委)

执委委员：肖敏颂 李 鳌 杨伯峻 张梓敬
杨荣国 刘禄铨 谭丕模 杜迈之
主任委员：肖敏颂

民盟湖南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0年5月奉总部命令将执委会改称临时工作委员会)

委 员：肖敏颂 杨荣国 王西彦 王学睿
杜迈之 李 鳌 陶重周 张梓敬
康 德 杨伯峻 蓝肇祺 谭丕模
董每戡 戴德嵩 刘禄铨
主任委员：肖敏颂
副主任委员：杨荣国

民盟湖南省第一届支部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召开省民盟第
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委	员：	肖敏颂	杨荣国	谭丕模	李 鳌
		王学庸	杜迈之	魏猛克	易见龙
		董每戡	刘禄铨	康 德	屈子健
		周世钊	严淑芳	胡笃敬	
候 补 委 员：		刘秉阳	曹赞华	张健甫	肖 艾
		钱南浦	郭崇望		
主 任 委 员：		肖敏颂			
副 主 任 委 员：		杨荣国	谭丕模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在湖南的地下组织

钱去非 唐耀晖*

“民联”湖南地下组织的筹建

“民联”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简称，它是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主党派组织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联作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民联、民促、民革都有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统一成为一个组织，统一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民联湖南地下组织是1948年冬由邓飞黄、杨世骥、钱去非、唐耀晖等4人在长沙筹建的。筹建经过是：1948年春，李家友、杨世骥相约分别由安徽、青岛去南京、上海，会见陈铭枢、郭春涛。当时，陈、郭已在中共华东局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民联地下活动。经研究留李家友在华东工作，杨世骥回湖南筹建民联地下组织。除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外，陈、郭还联名写信介绍杨认识湖南省民政厅长邓飞黄。于是杨即回青岛申请调动工作，很快得到同意，由青岛中央银行文书主任调长沙中央银行襄理。杨到职后，立即与邓飞黄取得联系，同钱去

* 钱去非、唐耀晖系湖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建人。

非、唐耀晖一起着手筹建民联湖南地下组织。由于杨、钱、唐是湖南明德中学先后同学，发展民联组织时，通过这种同学关系相互串联，所以成员中明德中学毕业的占多数。到1949年8月初湖南解放前夕，成员已有21人，其中有些人在30年代中学或大学时期曾积极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经受了爱国运动的实践锻炼。当1948年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时，各人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通过朋友和同学中的共产党党员的启发，阅读了一些地下党员传送的毛泽东著作，又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都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唯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1949年春，民联湖南地下组织为了尽快地争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做好迎解工作，于是决定派钱去非、孙衡阁去上海与民联中央领导人联系。当时钱是湖南省银行稽核课长，借词去上海分行查帐而得离长，孙以大懋银行专员名义同行。民联组织无经费，钱设法筹足旅费后即与孙同乘飞机到达上海，通过外滩中央银行李恩澧约李家友在外滩公园与钱相会，然后由李引至环龙路吴艺甫处见到陈铭枢和郭春涛。钱汇报了湖南的情况，并请示今后如何进行工作。陈、郭指示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后决定。几天后，郭（民联中央组织部长）与中共华东局吴克坚同志取得联系，嘱钱仍乘飞机返长，等候地下党派人联系，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进行活动，并约定钱的代名为“徐飞”和接头暗语，孙则留在上海工作。

钱回长不久，即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通过钱单线联系接受地下党对民联地下组织活动的领导。另一方面，民联地下组织的成员在进行具体工作中，又分别接受地下党对某一项工作或活动的领导，如钱去非在湖南省银行护行保产斗争和在湘潭警察局的策反工作，与中共华中局第7总部王灿然及地下党员刘禄铨、刘润世三同志联系；唐耀晖在参加湖南地下党外围组

织“新青社”进行地下活动中，又受另一单线领导，与地下党员吴振华同志联系。唐耀晖、钱去非获得中央宣传文件时，与地下党员宋绍尧同志有过联系。

民联地下组织所做的几项主要工作

（一）推动程潜早日作出和平起义的决断。

1949年春，钱去非在上海向民联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后，立即启程返长。行前，陈铭枢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晓以大义。劝程潜早日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钱带了此信回长后，向民联组织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由邓飞黄、杨世骥、钱去非3人去省政府见程潜，面交陈铭枢的亲笔信，并转达陈铭枢、郭春涛在上海所谈的一些情况，分析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的消息，劝其早日作出起义的决定。程潜听到这些情况，还有些怀疑地说：“未必有如此之快吧？”最后告别时，程潜表示：“目前处境困难，只能相机行事。”

在这次会见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即当程潜送邓、杨、钱3人至宿舍门口，一群新闻记者都围上来探询究竟。杨、钱都在银行工作，正值广东当局扣运湖南的银元之际，于是随机应付说是银元问题，记者们居然相信不疑。第二天报纸上大登《中央运湘100万银元，传在穗被粤省扣留。省府分电财部粤方查询》的消息。还说：“昨日上午10时，长沙中央银行襄理杨世骥、省行稽核课长钱去非，由民政厅邓飞黄厅长陪同晋谒程潜主席有所商谈。”这项新闻的披露，以致省行有人询问钱怎么又插手银元问题，钱只好笑而不答。

邓飞黄过去支持程潜竞选副总统卖了大力，这次又随程潜回湘任职，是程的亲信。程到任后，常在晚上召集几个随同回湘任职的高级人员会商一切要务，邓也在场，随时可以做一些

劝说工作。杨世骥以后也两次与程潜单独见面谈过起义的问题，加之各方面都有人相机劝说，当时的局面变得很快，最后，程潜决定按照党的指示通电率部起义。曾亲笔写信明确表态回复陈铭枢，信上盖有随身所带的小翡翠私章，此信由民联湖南地下组织转去上海。

在程潜发出起义通电后，邓飞黄和唐生智等 104 人响唐这个和平号召，也通电西南西北呼吁顺天唐人，采取一致行动，完成全国解放事业，当时是起到一定影响的。

（二）掩护党的秘密电台和参加“策反情报小组”的斗争。

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转来关系，地下党组织周竹安同志在 1949 年 4 月按约定暗语在长沙上营盘街“非相园”与化名“徐飞”的钱去非取得联系。周竹安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斗争。当时党中央直接交付给他领导“迎解秘密电台”和“策反情报小组”两项重要任务，这时没有电台，所有成员要临时从各方面调来，有地下党员，有民主党派地下组织成员，要按照约定的暗语地点去接头，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处在放特严重怀疑和监视之下，周竹安同志不便随意行动，幸好他的弟弟民革地下组织成员周茂僧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秘书的合法身份，可以作为联络员在外面奔走联络。

周、钱取得联系后，首先交下的任务是要钱按照指定的地点和暗语，去找打入国民党空军电台担任通讯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梁宜苏同志，因为从汉口五丰面粉厂会计主任地下党员邓晏如同志处领来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由梁保管着。为了湖南和平解放的问题，必须及时向北京党中央请示汇报，所以要尽快地找到梁。钱先后到西长街太平放社和中山西路福裕祥木炭行，经过几番周折才找到梁宜苏同志，其实梁刚从衡阳回长沙，梁见到钱即交给《国民党空军机种型号说明》一本和《国民党陆空联络密码布版信号》一块，由钱通过联络员转交周竹安同

志，随后周茂僧与梁宜苏在钱家会晤，交谈了带来收发报机的情况。

5月初的一天上午，周茂僧偕同一位青年携带一只约一、二尺长的深褐色皮箱来到钱去非家，箱内装的就是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本《孽海花》小说一本，要钱负责掩护安排食宿。此青年对外说是姓李，真实姓名是章扑，又名章纪懋，江浙人，青年团员，是党中央派来搞通讯工作的。钱、章初次见面，认作表兄弟，对家人也是如此交待。钱独家居住，清静宽敞，章扑住楼上，同钱弟弟去泰同房，生活由去泰招扶，两个青年人在一起还谈得来。从这时起，党的秘密电台开始架设。由于当时晚上供电不足，章扑白天整天在室内工作，既是报务员，又是译电员，工作很紧张。周茂僧每天必来钱家联系。大概一星期，因为发生了问题，章扑及电台才转移了。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天，突然有两个陌生人敲门进来，说是要分佃几间房子，钱去泰婉言回绝，两人在堂屋及院内四处看看就走了。又有一天中午，钱去非下班回家吃饭，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车上还有一金属杆，当时以为来了客人，尚未怀疑到国民党当局侦察地下电台这回事，进屋见没有客人，就感到有问题了，再出大门去看，车已开走，发现墙上画有记号，这时正遇周茂僧到来，钱即将情况告知，周末哨声就走了。当天下午，周茂僧再来，将章扑及电台带走。钱上班未回，周关照钱的妻子周静，要钱晚上避开一下，以免麻烦。当晚谈宿同事家未归。果然，晚上有军警在营盘街一带突击检查户口，幸电台转移平安无事，但钱家隔壁捉去两人。第二天，钱去银行上班，总务处长李刚告诉他，当天下午那个姓李的由钱家迁到浏正街李维城行长家，晚上突然有特务检查户口，因无证件要带人，经李行长打电话给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说是刚从上海来的亲戚，未来得及办理户口手续，才算了事。

以后，章扑又转到梁宜苏家住了几天。由于市内随时会碰上敌特的侦察、干扰和破坏，难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将电台迁往霞凝九坛乡。这里是周竹安同志的家乡，人熟地灵，秘密地把电台安置在乡公所内，而且乡长接受和平起义，愿以乡公所的武装来保卫。乡下没有电灯，改用干电池解决了问题，这样党的秘密电台得以顺利进行工作，一直到长沙和平解放。

1949年5月初起，由周竹安同志领导的“策反情报小组”也建立起来，成员有周茂僧、梁宜苏、钱去非、刘晓芬、罗迅青（梁的妻子、地下党员）等5人。小组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收集国民党军政各界的情报，以便采取对策，并争取鼓动在职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准备起义。保护机关单位的一切国家财产和档案文件，免遭破坏和损失。根据各成员的工作性质和社会关系而分工：周茂僧负责与周竹安同志联络，梁宜苏负责空军和新闻界，罗迅青负责小学教育界，钱去非负责银行界和工商界，刘晓芬负责税务和海关方面。在白色恐怖下，碰头约会都必须特别谨慎。在梁、钱、刘家或天心阁茶楼酒馆见面，每次临时约定时间、地点，人员也不一定完全到齐，交换的情报由周茂僧及时向周竹安同志汇报。几个月的活动，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不少，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各方面所联系的人士绝大多数参加了和平起义，并且大都把所在单位的人员和财产保存下来在起义后作了正式移交。如省银行总分支行处及长沙空军站等单位都是如此。

8月4日，湖南宣布和平解放。8月5日，人民解放军入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掩护秘密电台”和“策反情报小组”的工作都胜利地完成了，奉令立即结束。8月6日，周竹安、章扑两同志与大家告别后即去北京。据梁宜苏告诉钱去非说，在工作结束时，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曾来电嘉奖全体工作人员，无线电收发报机已移交给解放军12兵团政治部，工作

人员名单则转去省委统战部。

(三) 通过《长江日报》为湖南和平解放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从1949年4月开始，民联湖南地下组织通过《长江日报》为湖南和平起义，迎接和平解放，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

《长江日报》是在1947年秋由《大晚报》改组更名的。社长廖文岛，衡山人，是原《大晚报》经理。该报是民营报纸，经济来源主要靠报纸发行和广告费收入。因报社业务关系，廖文岛与省银行副行长欧阳扶九及稽核课长钱去非相识，多年来就由欧、钱介绍省银行及所属分支行处为该报长期订户，并预收一年报费，由于《长江日报》的经济来源有赖于欧、钱的协助，平日彼此也就交往频繁。

《长江日报》自成立以来，先后有中共地下党员周艾从、傅白芦、罗厚仁、李冬阳、李峰等同志以总编辑、主笔、记者的名义主持内部工作，对当时的一些人和事敢于大胆直言，如对李宗仁的陈词滥调《和平经》，就愤然发表《评李代总统之言》予以抨击；对解放区的重要文告也敢于公布，如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战斗檄文，即以号外标题张贴在外，还及时登载由采访主任陈燕平负责抄收解放区新华社广播的新闻消息，因此该报扩大篇幅后，面目为之一新，人民群众都喜欢阅读。

民联湖南地下组织成立后，钱去非向杨世骥和邓飞黄介绍了《长江日报》的情况，建议通过该报为湖南和平解放事业开展工作。当钱去非到上海向民联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时，也提到《长江日报》的问题。钱回长沙后，即介绍廖文岛参加民联，与杨世骥、唐耀晖、邓飞黄等见面并在府后街邓飞黄家参加了一些会议和活动。随后邓飞黄、杨世骥与欧阳扶九、曹国枢、

唐耀章等 5 人出任《长江日报》董事，民联指派唐耀晖负责宣传工作，该报通过董事会及社务会议又聘钱去非为副社长，由此唐、钱两人经常去报社，加强了联系，更有利于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节节胜利的消息，经《长江日报》抄收后，都源源登载在第一版，称呼上一直只称“共军”，以不屈服更改，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加上按语和短评。至于其他报纸普遍登载的文章，该报拒不刊登。如那篇恶毒攻击造谣诬蔑共产党的长篇转载《武汉归来记》，就坚决不予登载。唐耀晖、钱去非从地下党员宋绍尧处获得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两本书，交廖文岛、刘晓芳等分途宣传，使党的政策进一步深入人民群众，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时全省人民渴望和平，期望早日获得和平解放，从《长江日报》得到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无不喜形于色。但国民党当局则深怕在战场上遭到惨败消息泄露，控制封锁新闻甚严，对《长江日报》检查不遗余力，借故刁难，往往排好版的新闻报导被强行抽删，致使该报大开天窗，继之给以警告，或判令停刊几天。只要能复刊，仍然不改宗旨，照常报导解放军进军的消息，由此更触怒了国民党当局，最后下了毒手，捉拿报人，查封报社。6 月间的一天深夜，长沙警备司令部派武装去报社捉拿廖文岛，幸廖文岛住报社对门“警世堂”宿舍，闻声越墙脱险，躲在湖南公医院（今市一医院）住院部内科病室，但副总编辑童文宥、采访主任陈燕平、经理贺奇、会计刘梦虎等 4 人被捕。随即总统府及华中长官公署下令通缉廖文岛，廖不能再露面，至于被关押的 4 人经唐耀晖、钱去非四出奔走，我在警备司令部任职的明德同学陈臧仲设法营救，陈保证无生命危险，在临近解放时，才被开释，获得自由。

在报社查封期间，开支无着，经济很困难。杨世骥、钱

去非、刘晓芳、黄子华等拿出私人的金戒指3只，银元200百元，大米15担接济，解决了一些问题。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江日报》也随之启封。通知廖文岛从湘潭赶回长沙，与唐耀晖、钱去非及与民联有联系的报社同仁陈燕平、贺奇、王瑞琪、廖干等立即投入紧张的复刊工作。8月5日，该报在长沙市“迎解联”的统一布置下，积极开展活动，写标语，搞宣传，迎接亲人解放军进城，并与新华社随军记者刘大为同志举行联欢。8月6日，该报以整版篇幅、特大字号标题，首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支前文告》，使党的政策尽快地与广大市民见面，起到安民告示的积极作用，更促进支前工作的开展。人民群众争相购阅，以致当天报纸增印六次，尚难满足市民的需要。

不久，民联湖南地下组织奉民联中央指示，停止一切活动。《长江日报》也遵照军管会的停刊决定，立即办理结束事宜，将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并送呈有关部门参考审查，一份由廖文岛送交军管会文化部苏辛涛同志，一份由王瑞琪送交明德中学（三中）杜行素老师（地下党员）转中共中原局组织部政工科。至此，《长江日报》完成了历史任务。

（四）参加“反破坏”、“反迁移”进行护厂保产的斗争。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节节胜利，武汉告紧，白崇禧率部退入湖南，企图负隅顽抗，叫嚣要“空室清野”，威逼程潜离开长沙，勒令省会各机关迁住邵阳、湘西等地，同时还指使特务搞黑名单，对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湖南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破坏”、“反迁移”护厂护校保产的斗争。

民联湖南地下组织积极配合行动，各个成员在其所在单位进行了“反破坏”、“反迁移”护厂保产的斗争。如钱去非、

陈纪、张友尚在省银行总行分别主管稽核会计营业三课业务。在4月间即与地下党周竹安同志取得联系，周是省银行副行长金贡安的女婿，到过省银行，并会见了欧阳扶九副行长。同时，人事课长章劲柏又与中共华中局第7总部（简称3130）王灿然同志接上了头，并介绍与钱去非见面。周、王分别在省银行行长室及钱去非家秘密约会，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对“反破坏”、“反迁移”护行保产迎接解放军作了重要指示。在这种局势下，省行全体职员及时发起组织“员工互助会”，推选钱去非为总干事，章劲柏为副总干事，并将组织章程分别报送总行及董监会备案。《长江日报》在第二天就登载了这个消息，借此作为掩护，名义上是搞员工互助，同心协力来“应变”，实际上是防止破坏反对迁移的群众组织。暗中互相串联发展力量做好护行保产工作，并利用总行自有电台，以密码电令各地行处，务必坚守岗位，将所有库存现金、帐表档案、枪枝弹药妥善保管待命，不得擅自移动和丢失。

当时，长沙银行界在邮政储金汇业局楼上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准备商讨护行保产的问题，钱去非参加了，因为，发觉有特务混入会场，致会未开成。

湖南省银行是全省的金融主脑，自不能随便迁移破坏，但在白崇禧的淫威下，也有人主张照令行事，要把一部份文书档案装箱待运。省行监察人还在董监联席会议上提出立即做好迁移准备的意见，省行当局在1949年5月7日及7月23日也两次拟定迁移处置办法上报，总的一条是迁移与否，遵照省政府命令行事。为此，钱、章两人及时与地下党联系，接受党的指示，为了应付局面，会计、稽核、营业、人事各课也都装腔作势，把空桶木箱堆集在办公室外走廊上，似乎也要装箱了。实际暗地里将主管的现金帐表、人事档案、枪枝弹药逐一进行清点，造册汇总，准备迎解移交。此时也有人感到无所适从，相互探

听消息，只问“怎么办？”“走不走？”走吧，抗战时期的苦难记忆犹新，一家老小拖娘带崽走不动；不走吧，反动派的压力大，加之谣言四起，惶惶不安。员工互助会设法分别进行劝说和解释，恰好这时行内发现毛泽东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小册子，给大家指出了明确方向。有了好的群众基础，就易于掌握主动权，终于使护行保产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得以胜利完成。最后将总行财物完整无漏地造具清册送交地下党组织作为解放后接收的依据。所属分支行处遵照总行密电指示，也大都保管完整，就地移交解放军。

长沙和平解放，迎接亲人解放军入城后，钱去非由地下党员湖大同学刘禄铨陪同去军管会金融处。请求有关省银行交接事宜，金融处领导章伯森、赵元彩两同志亲自到行视察，并派殷川、艾新两同志为军代表，负责办理接管事宜，钱去非、章劲柏、陈纪、张友尚，彭先河等都是交接小组成员，按照所造具的汇总清册点收无讹。至此，湖南省银行全部财产如数归还给人民。

省银行接收完毕，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学习，主持学习的是副行长廖生东同志，学习期满，发给证明书，并重新量才分配工作，从此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开始真正为人民服务了。

杨世骥、陈忠范在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也参加了护行保产工作。解放时，该行全部财产造册移交，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杨、陈两人同样参加人民银行省分行干部训练班学习，以后分配了新的工作。

（五）参加湖南和平促进会活动及和平签名运动。

1949年1月，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推仇鳌为主任委员。从此，湖南省的和平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民联湖南地下组织为了配合和促进和平运动的开展，也曾

搞过一些活动。具体来说，如6月份在钱去非家宴请仇鳌、李维成等，就湖南和平运动的开展交换了一些意见，并进行了商谈，以促进和平运动的开展，这次邓飞黄、杨世骥、钱去非、唐耀晖均在座。

7月中旬，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湖南各界人士发起了一次呼吁和平签名运动。民联地下组织积极响应，并投入了这次呼吁和平签名运动。各成员持签名单分途串联，与各界知名人士联系，大家都积极响应立即签名。

同年8月1日，《中央日报》公开登载《长沙各界拥护当局主张，避免战祸，呼吁和平宣言》，并公开了第一批签名的260余人名单，其中有民联成员肖训、刘晓芳、邓飞黄、钱去非、杨葆询、杨世骥、陈纪、唐耀晖等人。

（六）策动湘潭警察局武装起义。

湘潭解放时，警察局1,000多人枪全部保存由解放军接收。该局督察员刘友斌参与了这次策反工作。刘友斌与廖文岛是衡山同乡，又担任《长江日报》湘潭办事处主任，负责在湘潭推销报纸。根据刘的反映，湘潭县警察局长温国纯是军统特务，掌握全县及各乡队武装千多人枪。解放军渡江后，局势日趋紧张，温曾窜往山区察看地形，并扣留云湖矿场汽车两部，企图推枪上山负隅顽抗。当时，钱去非为策反湘潭警察局武装起义与地下党员刘润世同志取得联系，通过廖文岛由《长江日报》特约通讯员罗铁珊送去刘润世对进行策反工作的指示，刘友斌遵照指示找机会向温国纯讲明党的政策，劝说温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随后又陪同温到长沙与廖文岛晤谈。温回湘潭后，曾下令将各乡队武装编为两个警察大队，调集城郊待命。

1949年6月下旬，国民党部队逼近湘潭县城，因此压力很大，谣言纷起，形势日益动荡。此时廖文岛因报社查封，本人

又被通缉，在长沙不能露面，于是去湘潭参加策反工作，按照刘润世同志指示的暗语与湘潭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再与衡山白果小同乡黄子华会晤。黄是国民党85军23师师长，于1948年12月投城（解放后任湘潭市政协委员），过去和刘友斌到长沙与廖见过面，他们根据刘友斌汇报的情况，及时进行研究，在座的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李振明、陈南村、张曦等人。由于刘友斌是湘潭警察局督察员，易于接近温国纯，又与各基层有联系，可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劝说工作，能及时摸清情况与黄、廖共同商讨对策。当时黄子华还给刘友斌一支加拿大手枪，作为自卫及保护有关人员之用。形势日益紧张，温国纯由于对党的政策怀疑恐惧，最后只身潜逃。湘潭警察局长职务由督察长王旭辉代理。刘友斌抓紧时机与王保持联系，设法稳定人心，一直到湘潭解放，终于维持了治安，保护了档案，枪支武器未散失。

湘潭解放前夕，刘友斌参加了湘潭中学校长地下党员符石安同志（解放后任湘潭市教育局局长）负责主持的迎解工作，将在化民中学及金庭会馆召开秘密会议的精神，也及时转告王旭辉共同贯彻执行。湘潭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县城，刘友斌会同王旭辉将全县武器造册交点，及黄子华给的加拿大手枪一枝，都一起送市公安局石俊丰副局长收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湘潭县警察局的策反工作胜利完成。

（七）参加各民主党派地下组织联席会议，商讨迎接解放有关事宜。

1949年7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进驻平江一线后，4野12兵团湖南和谈代表金明同志等一行，也随军抵达平江，当时程星龄奉程潜、陈明仁的指示前去平江接头，湖南和平解放已成定局，曾经由唐耀晖与各民主党派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联系，约集在南门外天心阁西大门对面的一家私人诊所楼上开了一次秘密

联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民盟肖敏颂、杨柏俊，李鳌、民革唐桂良、周翊襄、唐升节、民联杨世骧、钱去非、唐耀晖。在会上，大家首先就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及湖南即将和平解放的消息交换了一些情况和意见，其次商谈了有关促使和平起义扩大社会影响，以及迎接和平解放等问题，最后约定民盟李鳌、民革唐升节、民联钱去非3人经常在湖南省银行内碰头联系，交换情况和意见，以便配合一致行动。

（八）参加“迎解联”工作，迎接解放大军进城。

8月3日，长沙各界人士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正式组织成立“长沙各界迎解放联合筹备会”。第一次筹备会是在三公祠湖南公医院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湖大等24所学校，工会、农会等53个单位和民主党派地下组织的代表，民联唐耀晖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公开宣布了长沙即将和平解放的消息，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章程，商定了如何筹备迎接解放等问题。

接着“迎解联”又成立了“迎解顾问团”，民联唐耀晖被聘为顾问，参加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等活动。8月5日傍晚，“迎解顾问团”乘车去东渡迎接解放军首批代表入城。当解放军首批代表到达东屯渡与迎接队伍会见时，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敲锣打鼓，高歌欢呼，献旗献花迎接亲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一个极为热烈、极为动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当晚10时许，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长沙市民夹道欢迎的锣鼓爆竹欢呼声中，以雄壮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从小吴门进入城内。当晚，整个长沙城彻夜沉浸在万众欢腾之中。杨世骧、陈忠范、钱去非、陈纪、张友尚、廖文岛等都分别参加了中央银行、湖南省银行、长江日报的欢迎行列。

8月上旬，“迎解联”还组织“顾问团”去解放军驻地和陈明仁起义部队进行慰问并献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获得和平解放，民联湖南地下组织的工作也就胜利结束。

1949年10月，杨世骥和钱去非派去北京向民联中央汇报工作，往返费用仍需各自筹付，因交通未恢复，途行十日始到达。在北京会见了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王昆仑等领导同志，随即又参加了11月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全国第二次代表会议，并见到民革湖南地下组织的黄栋、许松圃、戴朝震等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民联、民促、民革统一成为一个组织，统一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民革中央领导机构。

解放了，地下斗争时期的工作已经终止，中央指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原民联湖南地下组织的成员，已参加新的工作的在单位学习，尚未分配工作集中在左局街民革成员许松圃家学习。

1950年10月，民革湖南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杨世骥是筹委会学习委员会委员，不久改为驻会委员。钱去非、唐耀晖是筹委会审查委员会委员。邓飞黄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附注〕 邓飞黄于解放初期在武汉病逝，杨世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80年9月平反昭雪。他们二人在地下斗争时期的一些具体工作情况，现在无法了解。特此说明。

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各级组织 的建立与发展

民建委湖南省文史办公室*
湖南省工商联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由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组织发起，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的。成立会上选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等37人为理事，阎宝航、冷谦、彭一湖等19人为监事。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阐述了对建国的理想和途径，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主张。政纲说，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治、民有、民享，只有政治民主，才能贯彻民有、实现民享，所以民有、民治、民享应以民治为中心。认为建国之途径就是“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中的“重要进步部分”，并主张以此订入宪法。

1946年4月，民建总会由重庆迁上海。1947年5月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49年9月民建总会由上海迁北平（北京）。

民建湖南各级组织的组建

建国后，民建总会成立了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指派委员分赴各省市推进会务，发展组织。1949年冬，民建总会指派会务推进委员彭一湖等来长沙，根据民建“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干，包括公营企业者”的方针，在长沙市工商界人士中，宣传民建的性质、任务，发展会员，开始着手筹备民建长沙市分会，指定向

* 民建湖南省委、湖南省工商联文史办公室根据两会部分老同志的日记整理了此文。

德、彭一湖为民建长沙市分会筹备员。

1950年10月，长沙市已发展会员33人。在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的关怀和领导下，成立了民建长沙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兼负责联系、指导，推动附近城市民建的筹建工作。随后在衡阳发展会员，并开始进行民建衡阳市支会的筹建工作。1953年春，长沙市民建会员逐步增加到239人，分13个小组。4月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民建长沙市分会委员会，并相继成立了民建衡阳市支会委员会，湘潭、常德两市也发展了一些会员，分别建立了直属小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全省民建会员增至700人，其中工商业者506人，占会员总数的72%，在此基础上，长沙、衡阳、湘潭等市先后成立了民建市委员会，常德市成立了民建市级筹备机构。为适应会务发展的需要，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经民建中央批准，于1958年6月成立了民建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它既是民建中央的派出机构，又具有省一级组织相应的职能。

“文革”中，民建湖南各级组织，和全国各地一样，被迫停止了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统一战线得以恢复并进一步扩大，我省各级民建组织也于1978年开始恢复，并逐步展开活动。在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80年2月，召开了民建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民建湖南省委员会。相继恢复了长沙、衡阳、湘潭市委员会，建立了常德市委员会，还建立了民建邵阳市筹备委员会和株洲、益阳、津市等城市支部。1984年元月，召开了民建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第二属省委员会。目前，长沙、衡阳、湘潭、常德、邵阳、株洲六市有市委员会，益阳、津市两市有城市支部。

基于新时期民建的性质、任务和情况的变化，它的发展对象也相应有所变化。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民建发展会

员，以原工商界人士为主要对象，根据民建《章程》的规定，现在主要是在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工程师和财经界人士，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教学工作人士以及在工商企业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或社会联系较广泛的经营管理[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中发展。7年来，我省发展新会员874人，到1987年3月底止，共有会员1254人，其中讲师、工程师、会计师、统计师以上的高中级知识分子394人，占会员总数的31.92%，担任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290人，占会员总数的23.13%。大多数在职的会员是工作中的业务骨干，多数退休会员都有长期从事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和生产技术专长。

民建湖南组织的重要政治活动

建国后，民建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建在推动成员恢复市场经济秩序，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参加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特别是投入“三反”“五反”运动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理论，开展爱国守法教育和自我改造教育。所有这些活动，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3年，我国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0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民建发扬本会的特点和优势，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民建总会为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于1955年4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民建湖南省组织推选代表王世传、王志强、姜运开、凌霞新、张监之、陈芝田、王恢端、秦载宽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在学习总路线的基础上，明确民建的中心任务是：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培养和提高工商业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以带动、帮助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并把这两个方面密切结合起来。会后，民建长沙市委及各市民建组织传达贯彻了大会精神，使民建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界群众逐步提高对总路线的认识，澄清了各种模糊思想和解除了一些疑虑，工商业会员积极发挥骨干作用，引导和带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的顺利实现，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1956年继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出现了高潮。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胜利完成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在我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和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1957年，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本会”部份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会员的政治积极性，影响了工作的进展。

1957年以后，民建湖南省工委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界群众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民建中央采取“神仙会”方法举行了两个多月的预备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民建湖南省工委开了36天“神仙会”，会上遵循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精神，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和风细雨地做思想工作，解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对建

国十年来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而光辉的历程，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明确了民建的中心任务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简称听、跟、走）培养和提高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带动工商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和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神仙会”增进了会员之间的团结，提高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多年来，民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帮助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界群众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对党的信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绝大多数人能够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党一起克服困难，在以后的“十年内乱”的冲击中，对党的信心不动摇，而且只要有条件，有可能，仍然坚守岗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没有辜负党多年的教育，与党共患难，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得到了党中央给予的“难能可贵”的高度赞扬。

恢复活动 再谱新篇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以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拓了一个以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总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民建中央于1977年12月开始恢复活动，民建湖南省各级组织亦于1978年开始恢复并逐步展开活动。

由于国内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民建已经成为一部份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政治联盟，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民建中央于1979年10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民建湖南组织推选了凌霞新、向德、曾诚意、阳忠恕、彭绪坤、曾绍参、卢廷芳等十一人为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总

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在对民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表达了民建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

民建湖南省各级组织在这个纲领的鼓舞和推动下，积极组织 and 推动会员做好本岗位工作，调动会员和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以经营管理经验生产技术专长和从事经济工作的知识才能，以及在国内外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来为四化建设服务。在实践中开创了新的路子，取得了新的成绩。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不但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两个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而且在开展经济咨询和专业培训等活动中和省工商联密切配合，把经济咨询培训延伸到流通领域，依靠成员和工商界人士，办起了各类经济实体98个，为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发挥了疏通渠道的作用，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产、供、销和市场信息的成套咨询；在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方面，先后组织50名成员和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分赴江华、吉首、花垣、通道、永顺等6个边远市县，向10个企业提供了11个项目的咨询，解决了33个技术难题，对经营管理提出了31项合理化建议，使这些企业克服了困难，得到了发展，并为这些企业培训了各类专业人员140人。此外，以我省茶叶为重点，从产、购、销管理体制价格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较有价值的报告，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民建省、市各级组织自1980年下半年以来，采取“扬长避短，拾遗补缺，稳步前进，讲求实鼓”的培训方针，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专业的专业培训，共办了10所业余学校，1

所职业中专，总计213个班，培训学员近20,000人，还举办了短训班121个，培训6,387人，举办专题报告和讲座310次，听讲的达50,000多人次。此外，推动会员从事著述，编写技术、业务资料和文史资料等。这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活动和所取得的成绩，受到社会的欢迎和赞扬。

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民建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作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民建湖南各级组织决心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和鼓舞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团结一致，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不懈的努力。

**附：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委员会历届委员会
主要负责人名单：**

**民建长沙市会筹备委员会
(1950—1953)**

主任委员	向 德
副主任委员	章伯森
秘书长	凌霞新

**民建长沙市分会第一届委员会
(1953—1956)**

主任委员	向 德
副主任委员	王志强 陈芸田
秘书长	凌霞新

**民建长沙市分会第二届委员会
(1956—1958)**

主任委员	向 德
------	-----

副主任委员 王志强 陈芸田

秘书长 凌霞新

民建湖南省工作委员会

(1958至“文革”)

主任委员 凌霞新

副主任委员 王希明 陈芸田

杨子霖 曾诚意

民建湖南省第一届委员会

(1980—1984)

主任委员 凌霞新

副主任委员 向德 陈芸田

杨子霖 曾诚意

李瑾力 阳忠恕

秘书长 李瑾力(兼)

(注：1980年7月凌霞新逝世后由向德代主任委员)

民建湖南省第二届委员会

(1984—)

主任委员 向德

副主任委员 陈芸田 曾诚意

阳忠恕 彭六安

魏永辉 彭绪坤

秘书长 徐春炳

解 放 湘 南

刘亚球*

1948年10月，我经九龙、广洲、英德、韶关、一路羊肠小道，抵达坚持五岭斗争的老红军部队粤北支队，受到了五岭地委书记张华和李金、叶昌等同志的欢迎。

我传达了中共中共香港分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对我们行动的指示。分局指示粤北支队向湘南方向发展，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华南。经地委研究，粤北支队抽出部分人枪，组成一支游击队向湘南发展。原在汝城、宜章等地参加粤北支队战士全部调出来，组成游击队，原桂东游击队回桂东，具体布置由我和李林同志商定。我们在五岭地委领导下，根据当时情况，首先集中力量整顿好部队。第1队编成两个班，队长李林、副队长耿俊孟，参加工作的同志编成4个组：汝城组朱汉樵、郴县组马丹、宜章组朱大红、桂东组原工委书记唐瑞。参加工作组的成员有地下党员和中山大学的部分学生。

桂东游击队是1947年冬暴动后组织起来的，并接受了党的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郭垂炎、郭名善同志领导的这支游击队，在桂东有群众基础。该队经短期训练，1949年11月由大夷出发到桂东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这时国民党主力已北调，湘南有国民党“剿匪”司令欧冠和副司令胡凤璋的队伍以及县、乡自卫大队等武装，势力颇大，反共气焰嚣张。但湘南人民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曾蓬勃兴起，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朱老总在湘南人民中影响非常大，红军长征经过桂东、汝城、宜

*刘亚球当时系湘南支队司令员。

章等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都是我们胜利进军的条件。我们到达桂东、汝城后，立即深入群众，摸清敌情，找出敌人的活动规律，通过一系列工作，站稳了脚根，同志们对于胜利更有把握。郭垂炎同志率领桂东游击队，首先进驻桂东东边山，后经沙田圩到了西边山，驻在桂东的四都，靠近了资兴，一次，郭垂炎同志侦察回来说：“资兴敌军尚未发现我们，显得平静。资兴附近的青瑶圩有一个乡公所 30 余人枪。”我问：“那里的地形怎样？”郭答：“那里是山区，地处八面山西边，我们从四都翻过山就是资兴，从这里到那里的乡公所有 50 华里。”我问：“那个公乡所与资兴其他乡公所有多远？”郭说：“五、六十里远。”我问：“周围有什么障碍吗？”郭说：“没有障碍物，只有一个碉堡，乡警住在碉堡里。”我问：“乡警是那里人？”郭说：“本地人，没有打过仗的。”我问：“你们把这个乡公所的枪缴下来行不行？”郭说：“行！”我问：“你们准备怎样缴呢？”郭答：“试试吧！”我严肃地说：“不是试试吧！而是一打就要歼灭，不要用打草惊蛇的战术，蛇跑了得不偿失，不如不打，因为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对开展工作不利。”经过大家想办法，一致认为：要打就要缴敌人的枪，打掉敌人的威风。统一了思想，下决心打。1949 年春节夜晚，开始了攻坚战，郭垂炎率部由桂东四都出发，一鼓作气翻过八面山，凌晨 3 点到达资兴附近，在青瑶圩围困了乡公所。郭垂炎下令开始进攻，以猛烈的火力压倒敌人，使碉堡的敌人不敢抬头，战士们高呼：“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保护你们生命安全！”“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快缴枪。不缴枪我们就在碉堡下埋地雷了！”怕死的敌人连忙喊叫：“我们缴枪，只要留下我们活命。”郭队长立即命令敌人放下武器，离开碉堡 15 步。我们胜利了！缴获敌人枪支 40 余条；手榴弹百余个，子弹千余发、军衣军帽 40 套、粮食 5 担、肥猪 2 头及其

它日用品。这个胜利鼓舞了队员的斗志，增添了勇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这次战斗虽只打了一个乡公所，却震动了资兴、桂东、郴县、宜章、汝城等地，人们奔走相告，说资兴、桂东来了好多红军，为我们大造了声势。

我们和李林同志会合了。他提议，乘胜打郴县的光华乡公所。因为光华乡位于郴县、宜章、汝城3县的交界，打下它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们和郭垂炎商量，郭很赞同这个意见。李林同志曾率领游击队在郴、资边境活动了一个时候，并在资兴争取了一个保长，他动员了百余群众配合来打光华乡公所。我们集合军队300余人，黄昏开始行军，通晚未休息，早晨7点左右进入作战地段，郭队停下来。李林率部早已到了。通过进一步侦察地形，感到对我很不利，容易暴露目标。敌人在山头设有哨卡，进行了火力封锁，强攻必然会有较大伤亡。研究进攻部署时，李林主张猛攻，郭垂炎认为猛攻伤亡代价太大，两人各执己见，通过进一步讨论研究，统一了意见，决定智取。我们利用在青瑶圩缴获敌人的军装，化装混了进去，迅速抓获了乡长。我向他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你不要害怕，你可以立功赎罪，将你们乡公所的枪枝、弹药全部交出来。于是他听从了，共交枪200多支，弹药好几箱，其它军用品也不少。这个乡长立了功，我们便在光华乡成立了工作组，接管了乡公所的工作，乡公所人员全部留用，顺利地建立了这块根据地。

廖康同志在宜章赤石搞秘密工作，组织了暴动，解放了赤石乡。这次缴的枪支不多，乡长逃跑了。

朱汉樵同志在汝城文庙乡组织暴动，缴了敌人2条枪，乡警全部逃跑了。宜章赤石、汝城文庙都已解放，建立了工作组，接管了这两处乡公所，成立了游击队。赤石游击队谭立谷为队长，廖康为工作组长。汝城、宜章、郴县一部分地区解放后，

我们召开了会议，决定将队伍整编。以桂东游击队、李林游击队、王迪进游击队为主力，决定发展1500来人枪，成立3个大队，发动贫苦农民和失学知识青年参军，将参军知识青年编成学习大队，让他们体验生活，后分配做战地宣传工作，还将一部分分到农村去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会、收缴敌人枪支，没收国民党政府的粮库，解决军队吃饭问题；向地主筹集资金，解决军队给养问题。那时部队每天每人三钱盐、五钱油、一斤半米，实行供给制。3个大队的游击队边训练、边打仗、边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为了配合解放大军行动，随后我们袭击了粤汉路的交通警察。同时，袭击了郴县良田村，缴获敌人枪支10余条。又缴获两湾洞段家地主枪支30条、轻机枪2挺、子弹1000余发，并筹款1000元。随即解放了瑶岗仙矿。瑶岗仙矿是官僚资本家办的钨砂矿，他们把矿砂大量外运，我们决定不准外运。为了保护瑶岗仙矿工们的生产安全，派了工作组去该矿工作。

不久，桂、汝、宜、资、临决定成立工委，具体负责人：桂东县唐瑞、郭名善，汝城县李同文、朱汉樵，宜章县陈克，资兴县孙毅，临武县袁里凡、熊子烈、范卓。各县成立游击大队，在工委领导下收缴乡保地主武装，夺取枪支，维持地方治安，消灭土匪。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对贫苦农民进行形势教育。3月中旬，分局决定成立中共湘南地委会，五岭地委书记张华亲自送来中共香港分局电报，电文是：

“成立湘南地委会，委员为刘亚球、李林、李同文、唐麟、谷子元。由刘亚球任书记，并成立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刘亚球任政委兼司令员，李林为副司令员，李同文为地委会组织部长，唐麟为支队政治部主任。”我们根据分局指示和任命，提议耿俊孟兼支队参谋长，李顺成为副参谋长，参谋焦雪林、供给科长朱忠国、秘书漆天红。下设3个大队：第1大队长耿俊

孟，大队下分若干中队；第2大队长郭垂炎，王迪进为副大队长，从此湘南党、政、军机构健全了。我们开了警师会，大会宣告：配合全国解放大军消灭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政权；消灭地主武装，建立人民武装（县区游击队）。大会闭幕后，全体指战员摩拳擦掌、信心百倍。当时桂东、汝城、宜章的国民党县长惊恐万状，相继逃跑。桂、汝、宜工委进城办公，建立了工作委员会。此时，湖南保安旅李可才一个团、白崇禧部两个团，由郴县进驻汝城九峰，薛岳又装备了胡风璋的队伍。欧冠的“湘南剿匪司令部”驻嘉禾、蓝山县。他们企图保住湘南地区。1949年5月粤北支队深入汝城文庙，湘南支队配合粤北支队击溃了白崇禧部廖某和欧某两个团。此时胡风璋部配合李可才团驻汝城的下湾、古上寨。我湘南党、政、军动员全部力量，发出活捉胡风璋，消灭李可才的号召，同时获悉江西吉安我南下大军陈赓部队已进占吉安，湘南支队派李林副司令率领部份武装去吉安迎接陈赓南下大军，陈赓同志见了李林同志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游击队？”李说：“我们是湘南游击队，司令是刘亚球。”陈赓同志高兴地说：“我们渡江以来还没有见过游击队呢，今天可见到了你们游击队啦！”李林同志把两广发展的情况一一向陈赓同志作了汇报，并协助陈赓同志打通与两广的关系，沿途派游击队接头。陈赓同志给了湘南支队4挺机关枪、4座子弹筒小炮和一些弹药，这对我们鼓舞很大。

攻打汝城，活捉胡风璋，消灭李可才的战斗准备早就开始了，汝城周围的群众也发动起来，汝城县长自知300多条枪的警察和自卫队不是我们的对手，已闻风逃跑，朱亚雄带着县警一中队也逃跑了，李可才部被我们围困得水泻不通，他们如果继续顽抗就会被困死饿死，于是在一天早上进行突围。我已估计敌人将在东门突围，便留下一个缺口让其逃出。我们利用汝

城土桥有利地形歼灭一部敌军，其余敌人逃向胡凤璋驻地下湾和古上寨。我湘南支队立即围困了下湾和古上寨，并在李可才部向下湾、古上寨逃窜途中将其击溃。胡凤璋则死守古上寨。古上寨是一个孤立的小山，寨上的一座庙被胡凤璋抢占为公寓，其西南非常陡险，只有鸟飞得过，其东面修筑一条很陡的石头梯子路，寨脚有城墙，很坚固，石门上有放哨岗楼，寨上修筑坚固的碉堡，有兵营宿舍、防空洞、地下仓库，储备大量粮食、物资、布匹、枪支弹药。他全家住在寨上，妄图长期死守顽抗。我军曾多次围攻，胡部死守不放，企图等待国民党军队援救。我军紧紧围住上古寨，昼夜攻击，炮火连天，使敌人伤亡很大，但还不能彻底解决战斗，强攻的消耗战对我们不利，因此决定里应外合、全歼敌军。里应是让敌人内部起变化，争取胡的部下反戈。我政治部派工作组调查胡部官兵家属，动员其家属帮助我们做瓦解工作。根据小组汇报，有一位家属接受了任务，她有办法见到她的丈夫。我们与这位家属见了面，经过谈话和宣传党的政策后，她说：“我一定办得到，他会到台门楼放哨。”等了一天，这位家属说：“那就是我丈夫。”由两位侦察员陪着这位家属到了台门楼前，喊她丈夫开门，说家里有急事。台门开了，两位侦察员同时进了台门。这时我1大队长耿俊孟趁机指挥队伍猛攻，进占了古上寨台门楼哨所，立即向兵营推进。耿大队长高呼：“你们不要怕，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个个缴了枪，攻进胡凤璋住舍，胡和大小老婆睡在床上被活捉了，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胡凤璋由我警卫大队王迪进押送汝城县工作委员会，俘虏由政治部处理，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由供给科统管，归公处理，私人一律不准动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攻克古上寨，活捉胡凤璋，战果辉煌，震动了湘南，除掉了湘南人民的大祸根，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巩固了汝城、桂东、资兴、宜章地区

的根据地。人民坚决要求枪决胡风璋，我们将胡风璋押送汝城、桂东边界沙田圩判处死刑。群众高兴地说：“消灭了胡匪，我们扬眉吐气。如果不消灭胡匪，我们永世不能翻身。”

后获悉白崇禧部到郴州，湘南地委决定湘南支队开往郴县、临武之间铁路两边，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迎击白崇禧部队，阻其侵犯广东。

1949年9月1日下午4时，在桂阳清和圩我军与国民党独立旅遭遇。我军地形处于优势，士气很高，第1大队耿俊孟率领一个中队侧击敌人成功，2大队和警卫大队在前面正面发扬火力，猛冲猛打，敌人伤亡很大。这次战斗缴获重机枪4挺、步枪300余条、俘敌300余人。该旅溃退，我军追至桂阳城脚，白崇禧退却部队后尾部两个团埋伏在桂阳城。由于我军对敌情不明，敌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军反击，我军主动撤退，转而攻打郴县，将敌人击垮，缴获火车头32辆，解放了郴县。湘南“剿匪”司令欧冠派人与我军联系，请求起义，经湘南支队司令部报请湖南军区批准该部起义，由我支队改编。白崇禧10万军队溃退广西，湘南地区大局已定，嘉禾、蓝山县全部解放。

湘南党、政、军决定发动群众消灭残兵散匪，巩固地方人民政权，扫清征粮工作的障碍，维持交通秩序，抢修铁路，恢复交通。郴县耒阳段桥梁枕木曾被白崇禧部队全部破坏，我配合铁路局动员群众捐献桥梁枕木。廖康同动员廖志家将一片祖山的松树全部献出，用于修建铁路桥梁，两个多月铁路就修通了。

我军在湘南共建立桂、汝、资、宜、临、桂（阳）、郴、嘉、蓝、永10个县工委会，县级代办机构、办事处等。收缴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的枪支3,700余条，子弹及军用品甚多。我湘南支队包括各县大队在内，此时已入枪3,500余。

1949年12月中旬，湖南省委派高文华同志向湘南地委传达指示：湘南支队与南下部队合编，成立湖南郴州军分区、郴州地委会、郴州专员公署等机关，我们一致拥护。当时湘南支队与南下部队开了一个联欢大会，又是一个合编大会。军分区司令员为刘子杰，副司令员李林、政治部主任刘文珍。我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成立了郴州地委会，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地委委员有刘亚球、刘子杰、周志余、唐麟、李同文、李林、刘耀夫。周志余为地委副书记，李同文为组织部长，唐麟为宣传部长，何大群为秘书长，刘耀夫为专员，刘汉才为副专员，地委日常工作由周志余主持。

我在1950年2月奉省委调令，离开了郴州地委会。

从抗日到解放战争的湘南游击斗争略忆

刘国安*

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由党组织派遣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1期学习，毕业后直到1949年湖南解放的10年间，在湖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先是从事抗日游击战争和城市秘密工作，在解放战争后期，担任中共两衡（衡山、衡阳）工委书记期间，在湘南组建游击武装、打击敌人，迎接解放。

事情过去30多年了，一些曾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希望我讲一讲当年湘南地区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和我个人的感受。作为一个老游击队员来说，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不过，敬请谅解的是：

（1）我打游击的时间虽然不短，但接触面不广，局限性很大。本文主要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许多当年战友寄送来的回忆文字——如果没有这些文字，我的回忆是写不出来的。

（2）时间久远，资料不全，挂一漏万之处甚多，当年和我一道参加游击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志，即使有些人后来遭到过不公平的待遇，本文也不可能遍述。

（3）看法上的不全面，记忆上的差错，可能不少，欢迎读者，尤其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共同奋斗过的同志指正。

*刘国安建国前系中共两衡（衡阳、衡山）工委书记。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

党派我去学习

1921年2月,我出生在衡山(今衡东)县大桥湾的贫农家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祖父和父母都参加了农民协会。父亲刘祯祥是1926年入党的,他曾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在衡山农运讲习所的报告,亲身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哥哥刘东安担任儿童团团长,我是儿童团团员,自幼受到革命的熏陶。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我初中刚毕业,即考入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该校是一所新型学校,校长汪德亮思想比较开明,还有一批进步教师和有名望的作家,如音乐家任光夫妇、作家黎锦明、进步教师王三一、孟绍曾、朱晨声、邹鸿操等。恰好当时衡山实验县的县长是鲁迅的学生、作家孙伏园,因此学校内外反帝、反封建的气氛较浓,学生的民主要求和抗日活动得到支持。学校图书馆为学生提供各种进步刊物,让学生自由阅读,这使我更加开拓了眼界。学校还对少数贫苦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使我这个贫苦学生在各方面得益非浅。不仅如此,我还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经常同他们交换书刊、畅谈心得。我与毛贤友、陈翔石、刘克感、杨京川、凌志谦、汤振文等同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彼此志同道合,相互信任。1937年寒假,陈翔石回长沙,经中共湖南特委的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他向党组织汇报了毛贤友和我的情况,回校后首先吸收了毛贤友入党。1938年4月毛贤友和陈翔石两人又介绍我入了党,随即成立了由我们3人组成的衡山师范党支部。这是抗日时期衡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后来该支部在领导衡山民众学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组织学生开展民众运动,发动农民起来抗日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企图南侵，衡山一带有随时沦陷的危险，这时衡师已迁往衡阳县渣江。组织上决定我赶回衡山，组织力量，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我约定刘东安、康杰、向大鉴（向前）、彭彬生、谭安猷等6人在衡山县城观潮门码头一家旅社碰头。当时日军飞机整天轰炸粤汉沿线的城镇，衡山城随时有遭空袭的危险。正当我们约定碰头的那一天，敌机突然来袭，在衡山县城投下了几十颗重磅炸弹，城内大片房屋被炸塌，死伤几千人。旅店周围也落下了3颗大炸弹，砖瓦落在我的床上，我幸免一死。幸存的县城居民连夜往乡下疏散。我为了不失去联络机会，继续在旅店附近躲避，敌机一走就回到旅店。第三天，6个人都到齐了。眼前满城碎瓦颓垣，尸横遍地，使大家悲愤填膺，决心留下来战斗。根据党的要求，为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我们发起并组织成立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开展抗日宣传和救死扶伤的工作。当时衡山实验县县长孙伏园很支持，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丁某对我们加以限制，1939年初我们被迫解散，决定分头到农村去活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建议要重视游击战，朱德同志在1938年7月，向蒋介石提出由国共两党在南岳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同意了，指定国民党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教育长，我党派叶剑英同志担任副教育长，还派了党内著名的军事家和理论工作者，如李涛、边章五、薛子正、吴奚如、李伯崇等同志担任教官，还有一些青年党员担任工作人员，如小说《红岩》一书中的“江姐”——江竹筠同志即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训练班于1939年初开学，调集国民党军队营以上几百名军官受训，编为五个队。后来又成立第六、七队，第6队是战地服务团和其它方面知识青年组成的，第七队主要是当地学生。中共衡山县委认为“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同志是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经叶剑英同志同意，将其中大部

分队员送游干班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经过考试，编入第7队，加上从军队调集的军官共考入100多人。现在记得起来的从工作队去学习的人有：刘东安、向大鉴、旷定嘉（即雷雨田）、谷济深（即石坚）、谭安猷、谭云龙、何欣光、吴澍、杨文明、唐芸、李德怀、谭耀金、谭俊山、王德球、罗栗宽、王裕、何泽兰、侯芸、罗焕、旷晴初、康华棣、何泽锋、何月明、罗惠仙等60余人（有10人编入6队）。

我们第7队开始驻扎在南岳山下的何键公馆，后来搬到圣经学院，生活比较艰苦，没有课堂课桌，每人发一条小木凳、一块小木板。叶剑英同志作过多次关于游击战的报告，吴奚如、李涛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薛子正主讲游击队政治工作，边章五用大报告的形式，讲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概况，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的实况。据一个材料说，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同志化名胡光，在游干班当译员，当时我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周恩来同志也多次来班作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游干班分学科、术科和野外演习。我在这里学习了军事科目如沙盘、爆破、筑城、通讯、兵器、防空、防毒等等，重点是学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及野外勤务。

我在游干班学习的时间虽不很长，但对我此后10年的地下武装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冷水滩“播种”

1940年6月，我被调到桂林工作（党的关系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通过老同学、地下党员凌志谦介绍，结识了桂林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严正。他以后被培养成为党的一名骨干，长时期与我保持联系。

1942年，党派我到冷水滩湘桂铁路的职工中去工作。这条铁

路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早就企图打通它。冷水滩是这条铁路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站。我以教员公开职业作掩护，以冷水滩铁路小学和职工学校为据点，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且结识了金培仁、孙洪池、黄襄等人。这时，严正也回到了冷水滩，他的思想很进步，革命热情高，在当地青年中很有影响。我和他商议，由他出面创办了一所小学，命名为芦溪庵小学，我先后介绍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校任教，计有：中共党员黄明、康玲、陈诗伯、王锐聪、汪叶舒及后来入党的言莉珍、朱森之等，在此，结识了当地进步青年严固、王济生及熊珍生等。我经常到学校进行交谈、讨论和学习，共同宣传抗日。通过严固、王济生的关系，我们与当地农民严开梅、严开铭、唐启森等人建立了联系。这些职工、农民和学生是我们在这里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火种，也是尔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和解放战争地下武装的中坚力量。

当时，我们的抗日工作还在发动阶段，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发民众的爱国感情，为今后的武装斗争创造条件。黄明同志去衡阳《大刚报》工作后，我们决定在衡阳市向阳街开设一家书店，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庄云光、张清和他的妻子在书店工作。命名为“三友”书店。“三友”之意，不云自明。恰巧张清同志的名姓与《水浒》中的人物张清同名同姓，我们一见面便开玩笑地说：“你俩夫妇可不是古代张清夫妇在十字坡开黑店卖人肉，而是偷运普罗米修斯之火英雄。我们是来取革命圣经的”。“三友”书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道理，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底，国民党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芦溪庵小学党员康玲被特务跟踪了，幸而在严正的母亲和弟媳的掩护下脱险，但芦溪庵小学因此暴露了，校长严正也受到特务的注意，小学只得停办，此后我也被迫离开了冷水滩。

临时党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1944年初,我再到冷水滩时,严正已在唐生智将军办的耀祥中学当教师。我和严正取得联系后就在这所学校里开展党的活动。这时我们联系了耀祥中学学生冯去光(即冯鲁仁)、席宏洁、蒋湘林、蒋当翘、席增勇、蒋德芳、邓德述、宾楚湘以及冷水滩扶轮中学学生马时松、康凤翥、高季平等。我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阅读进步文艺书籍,并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因此引起特务的注意与跟踪。正在此时,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桂黔进攻,情况危急,我便于1944年5月去桂林汇报工作,并通过联系人刘东安向当时路过此地的湖南地下党负责人周礼汇报了工作及介绍了严正的进步思想及活动情况,提出在冷水滩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设想。周礼同志表示同意,并指示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串联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上级党组织还同意我们在条件成熟时,接收严正同志为中共党员,建立党支部。

我和刘东安当即串联了刘云龙、邓钧鸿、雷天一、康凤翥等10多个湘籍秘密党员和进步群众,带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关于游击战争的书籍,轻装连夜赶回湘南,并约定以岩塘严正同志家为联络点。当时衡阳城已被日寇包围,国民党正规部队正在沿湘桂线往广西方向后撤,湘桂铁路沿线人心惶惶。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留下我和谭云龙两人在岩塘与严正共同战斗,谭在1938年入党并与我一道参加南岳游击干训班学习,很有工作经验。刘东安、邓钧鸿、雷天一、康凤翥等连夜从常宁山区赶往永兴、耒阳一带,准备在粤汉线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日后以粤汉、湘桂两面呼应,夹击日军。

我与谭云龙共同介绍了严正入党,随即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兼管组织和武装,谭云龙管宣传。严正管统战。

我和谭、严于6至8月先后在零陵、祁阳文明铺、东安伍家桥一带串联了严固、席宏洁、席增勇、席希文、蒋毅、蒋苏翘、王蓉、潘安民、李石生、李芸等几十个进步青年学生，举办文化学习班、农民夜校，发动青年和农民武装抗日，并秘密搜罗枪支弹药。根据蒋毅提供的线索，搞到了1支左轮手枪和1架军用望远镜。我们秘密串联了湘桂铁路线上3个排的守桥武装部队准备上山打游击，并成立了马列主义的秘密学习小组，先后参加学习的除党员外，有冯吉光、严固、李石生、李芸、席希文、席宏洁、席增勇、蒋毅、蒋湘林。严度，王载钦从大后方来沦陷区后也参加了学习。主要学习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教程》、《论党》、《整风文献》等著作。这个学习小组的成员实际上是作为建党对象培养的，他们是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骨干力量。

中秋节前后，我和谭云龙、严正、严固、蒋湘林、席增勇等从东安伍家桥经小沙子一带正在大埠头观测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突然侵入湘桂线广大农村，控制了铁路线的重要城铺，我们的人员和部队顿时被日军分割在零陵、祁阳、东安的广大农村，无法联系，串通的守桥部队人员枪枝全都散失了，组建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计划被打乱了。经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在东安县一带收集散失的人员武器，重新组织抗日游击武装。

打入“湘南民众联乡自卫纵队”

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入侵湘南，零陵、东安、祁阳一带的民众为了保卫生命财产，纷纷以乡为单位成立了自卫组织。特别在东安，因为是唐生智将军的老家，在乡军人和武器很多，组建自卫队比较容易。

1944年中秋节，日军占领了东安北部的芦洪市，并派兵向伍家桥一带骚扰，当地群众纷纷逃进深山避难，同时出现好几个乡自卫队，他们带着枪也随着老百姓上山，并控制险要山口和制高点，防止日军来袭。

伍家桥有一个在乡军官王伉，是唐生智的老部下，曾任国民党军 63 师少将师长，因非蒋的嫡系被解甲归田。他的长子王维城，当过团长，也是被撤职回乡的。他们父子审时度势，集合了一批在乡军人将附近区乡的民众自卫队联合组成“湘南民众联乡自卫纵队”，王伉自任中将司令，王维成任上校参谋长，下辖四个大队。因为他们只提自卫，未提抗日，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没有什么号召力。

经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打入这个纵队，促使他们抗日。该纵队有一个叫唐仁芦的，原是唐生智的警卫队长，在耀祥中学时，与严正相识，我们就利用这个关系，请唐仁芦介绍由严正找王伉谈判，向王伉建议，司令部成立政治组，吸收沦陷区广大青年学生及中小学教师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只要司令部给名义、发给养，政治组的人员配备、工作计划及日常活动安排全由我们负责。王伉表示同意。临时支部决定：严正同志任组长，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全部进入了政治组，就这样我们直接领导和控制了政治组，打入了自卫纵队司令部，在伍家桥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和武装斗争。

柳山政治组

1944年9月20日，政治组正式成立，并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因为该组驻地是在离纵队司令部约10里的柳山小街，故我们都喜欢叫它“柳山政治组”。政治组由严正同志任中校组长，我以“刘安”化名为第一股少校股长，谭云龙为第二股股长，临时由祁阳、零陵和东安各地聚集起来的秘密党员、进步

人士和进步青年谢德馨、王平凡、舒开举为少校组员，王载钦、严度、席宏洁、冯吉光、田志义为上尉组员，席希文、吴迥凡、蒋湘林、李石生、李芸、桂德生、严固、席增勇等人为组员。他们有的在柳山工作，有的则挂名仍在祁阳文明铺、冷水滩一带从事抗日游击活动。因为我们在冷水滩附近的铁炉冲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得到了王伉的认可，我们设法从纵队领了一个“第六中队”的番号，实际上该游击队直属我们柳山政治组的领导，亦即临时党支部直接领导。

柳山政治组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抗日青年先锋队”，参加的有一百七、八十人，附近的青年学生，及少数小姐、少爷纷纷要求参加，其中就有纵队司令的两位小姐王信一、王明一，达到了广泛地发动民众参加抗日的目的。先锋队设有军事课和政治课，军事课主要是射击、投弹，政治课主要由我和严正、谭云龙主讲，教材几乎全部采用八路军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编印的教材。后来，我和席增勇、蒋湘林、严正、席宏洁等从冷水滩、桂林、东安等处，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根据地问题》及大批马列著作及进步文艺书籍等几百种珍贵书籍，并且指定两名可靠的战士谭军、熊珍生负责保存、借阅，平时将书分装四箱，一遇敌情，二人即分两担挑运上山。

其次，开办了农民夜校，自编识字课本油印后发给农民学习，内容大致有“穷人、富人、阶级”、“农民与地主”、“共产党与国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只有抗日才能自卫”、“抗日必胜，日寇必败”等等。

我们召开了控诉日军暴行大会，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原在冷水滩教过音乐和美术的金仁培、孙洪池等来到了柳山，于是成立了以金仁培为队长的文艺宣传队，孙洪池任戏剧导演，吸收一批思想进步又有文艺才能的人参加。年底抓紧编写

了一些抗日文艺节目，赶到零陵、东安各支队驻地演出。文艺队的同志，冒着严寒、自扛行李道具，日行数十里去各地宣传，他们的演出，深受群众欢迎，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第三，设法搜集纸张、油印机，出版油印小报《抗战》三日刊，由冯鲁仁、席宏洁等编写刻印，每期发行数百份，分送有关部门、单位，介绍抗日战争形势，报导各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胜利消息，揭露日军、汉奸的罪行。

我和严正、谭云龙、冯鲁仁等定期到唐仁芦、胡玉质、艾应灵等直属大队给战士上政治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解军民团结打日本的道理，教唱“游击队队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促使这支武装走上抗日道路。

为了解决游击区粮棉自给，我们创办了柳山农场，由高级农校教师舒开举、黄厚元任场长和技术员，招收了20多名农民当工人，试种棉花和经济作物。同时试行民主建政，由我带领组员在零陵小江口，发动农民群众改选保长，把动摇不定分子选掉，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选上来，衡山师范毕业的教师黎亨就在这次当选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一作法没有推广。

铁炉冲游击队

柳山政治组既是政治组织，也是军事组织，又是临时党支部用以领导第8中队——铁炉冲游击队的领导机关。因此，我们便以射击训练为名，通过多种渠道搞到三、四十支长短枪，实际上只留一些给政治组自卫用，其余都送给了铁炉冲游击队。为了搜集武装，我曾由席增勇等带路，从柳山经芦洪市，跨越日军封锁线到零陵山区，一昼夜步行180里，搞到机关枪1挺、子弹数百发、4号柏朗宁1支、子弹数十发，全给了铁炉冲游击队。

铁炉冲游击队因以铁炉冲为根据地而得名。当时上级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因此我经常去冷水滩一带的铁炉冲、玉山杨家、岩塘严家，并利用从前在这里播下的火种，成立了一支由严开梅等几十个农民参加的游击队，开头队员是不脱产的，搞到的30多条枪交个人随身携带，遇有日伪军出动，立即集合出击，并派小孩老人在山顶瞭望，约好信号，一有敌情马上报告。这支游击队由张昆、严开梅分任正副队长，后来严开梅同志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该队经过多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多人。我也好几次参加了他们的战斗，同铁炉冲游击队的同志们一道打击日军、炸毁铁路。

该游击队在日军投降后一度解散，枪支弹药由地下党员秘密埋藏起来。

为了打击日伪势力，我们趁驻芦洪市的日伪军于1944年底公开筹备成立维持会之机，派严正同志出面向王维城参谋长做工作，指出日军建立维持会是对纵队的极大威胁，一定要设法予以打击。王维城在维持会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就派人枪杀了维持会长王安民。此举大大震慑了敌伪，维持会再没有人敢干了。日军千方百计探察游击队的情况，还派武装部队到伍家桥一带搜索，妄图报复。以此，王伉自卫队与日伪的矛盾激化了，坚定了走抗日的道路。

在夹缝中奋斗

1944年底，王伉的武装部队已扩大到9个支队，3,000多人枪，而且多次打退日伪几百人向牛头寨司令部驻地的进攻。大队逐步改为支队，并陆续收编了一些自卫队，凡不接受改编的，即以武力收编。他把零陵、东安、祁阳一带十几个乡联成一片，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区，重新任命各乡乡长，还打算任命

三个县的县长，气派不算小了。但他的部队虽经唐生智想方设法向蒋介石试探，却未得到蒋介石的承认。而原经国民党任命的东安县县长唐孟壑、驻在祁阳桂榜山的行政专员蒋伏生的自卫队，却很快得到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王伉自称纵队司令，人马比他们多，势力也大。于是相互摩擦开始了。国民党正规军派遣的突击队、特务武装别动队，汉奸武装“燕子”部，都陆续进入王伉统治区，要钱、要粮，遭到王部抵制。唐孟壑、蒋伏生要求改编王部，遭到拒绝。1945年3、4月间，王伉部在击溃汉奸武装“燕子”部，枪毙柳庆全营长后，唐孟壑在蒋伏生支持下，以千余武装包围黄泥洞、线江冲王伉司令部。经过几天战斗，双方伤亡很大，王伉被迫放唐孟壑部队进入根据地，唐洗劫了黄泥洞，烧毁一些民房后撤走了。王伉为了保存实力，继续争取蒋介石的谅解，便开始到处叫喊反共，并于1945年6月被迫接受蒋伏生的改编，充任蒋伏生部队的副总指挥。蒋伏生派出党政督导专员周文虎到王伉纵队建立所谓专员办公处，要求接管政治工作和政治组全体成员。我们拒绝接管，同他们专员办公处同时并存了一段时间。终因王伉怕得罪蒋伏生，我党掌握的政治组于1945年6月前后被迫解散，部分同志被派去铁炉冲游击队或回家发动农民搞游击队，另一部份人，如冯鲁仁、潘安民、席宏洁、王苹、唐建英（李茵）等同志转到了别的抗日根据地，冯鲁仁辗转到了延安。我与谭云龙带领邓德述、宾楚湘、蒋芝兰、邓化龙、胡瑶光等10余人，继续利用王伉与蒋伏生的矛盾集体打入王部新成立的美式武装爆破队学习。我们原计划拖出这些武装归并铁炉冲游击队，但因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未及实现，只秘密运出了部分子弹和爆破器材埋藏在柳山大庙。9、10月间，我步行到了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汇报了在零陵、东安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及党的活动情况。组织决定我留长沙市开辟工作。

二、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武装斗争

1948年冬，我从广州市回到湖南，周礼同志派我到衡阳市协助黄道奇同志（中共衡阳市工委书记）工作，后任两衡工委书记。周礼同志跟我们分析了敌情，指出：白崇禧还有几十万军队，困兽犹斗，要很好对付，要以衡阳市为中心，发动群众反征兵、征粮、征税，做好统战和宣传工作。方法上，要见缝插针，广泛布点，分散活动，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逐步做到用武力控制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线，牵制衡宝公路，以形成对衡阳市的包围，配合解放大军，牵制和打击敌人。

正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我接受了征战湘南的重任，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遥望湘南大地，好象已布满了干柴，只要紧紧依靠工委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确执行各项政策，那里将燃起革命的烈火，这烈火将乘革命战争胜利的春风弥漫整个湘南大地，湘南人民将获得彻底的解放。

现在，就我当时所掌握与现时记忆所及的情况，将两衡工委所属各支游击队建立的经过，发展与活动概况记述如下：

黄道奇、李建元部

正式番号是湖南人民解放军湘中游击队五支队，整编时有960余人枪，活动在衡、邵边界。黄道奇同志任政委（黄原为中共衡阳市工委书记。因工作暴露，省工委决定他撤至衡西开展武装斗争。仍兼中共两衡工委副书记）。李建元任司令员，这支武装是省工委所属的一支较强的部队，屡立战功。解放后，该队改编为衡阳县大队，李任大队长，黄任政委。道奇同志对这支部队知道最详，将由他另写回忆文章，故这里从略了。

李雄、林平白部

正式番号是湖南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李雄（文传源化名）任政委。林平白（我的化名）任司令员。原拟建5个大队，实际上只建了一、二、五大队。我与文传源、黄启成组成团队党委，我任党委书记，下分零陵、祁阳一、二大队4个支部，各支部兼管所在县的武装工作。这支部队人枪共500多，活动于湘桂铁路——零陵、祁阳一带。

（一）零陵大队（一大队）。

我是1948年冬到衡阳的，随即去零陵冷水滩找严固等人，严固是一个积极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抗日时期游击队的骨干。我再回冷水滩打游击，可谓旧地重游驾轻就熟。这里的人还在，枪也有。我与严固、严度、王载钦等商量，首先成立“新民主主义促进社”零陵、东安分社，发展会员，以便从中建党。以原铁炉冲游击队为基础，把青年先锋队的进步青年动员起来，把埋藏的枪枝挖出来，成立武工队，由严固和雷扶超负责，分组展开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宣传活动，发传单、贴标语、小型集会发表演说，突击行动，干了就跑，来去无踪。这支队伍男女队员潘宣之、王胤民、唐启森、熊珍生、唐鸿、唐世淑等30余人。后来武工队发展为零陵一大队，250多人枪，由严度、王载钦分任正副队长。由于平时的活动分散隐蔽，又不断地发动群众骚扰和打击敌人，因而长期拖住了敌军正规部队305师及宜山独立团的主要兵力。解放大军到达零陵前，一大队集中兵力一举攻下了零陵、冷水滩，保护了县、镇人民生命财产以及一些桥梁、涵洞、粮食仓库，向大军移交了20多万斤粮食、一列满载汽油的火车及其它作战物资。解放后，又配合大军收缴散兵游勇枪枝数千件。根据上级指示，该大队改为零陵县大队，严度为四连连长，雷扶超为指导

员，原武工队队长严固和潘宣之调零陵军分区政治部，其余同志分别转到零陵地、县、区工作。

（二）祁阳二大队。

祁阳二大队活动于祁阳南部大忠桥观音滩一带。它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是这样的。1949年3月，中共衡阳市工委派平智中学学生、建党对象郑政椿，回祁阳大忠桥活动，他通过参加祁南大、中学生学术研究会的活动，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并发起开办新民补习班和新民民众学校，有选择地向他们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土地法大纲》、《大众哲学》、《自然辩证法》等，进一步物色对象，建立“新民主主义促进社”，先后发展了郑飞雄、陈冬龙、陈桂阳、李道生、潘治中、彭振华、陈冬阳、邵球、席文选、徐定国、郑亿中、蒋湘豪、郑昌颜、黄正中、张显祖、郑澧淦、唐建中、宋时武、徐人忠以及学习班的炊事员郑正春为社员，由郑政椿为分社社长。1949年5月中共两衡工委派文传源同志去他们那里指导工作，6月我又到那里检查工作，认为条件成熟了，随即发展郑政椿、郑飞雄、陈冬龙、郑昌颜入党，并建立了祁阳支部，由文传源同志兼支部书记，郑政椿同志为副书记，还决定在支部的领导下，以“新民主主义促进社”为基础，组织武装斗争。为了搞枪支，有人提供：附近有个湖南大学毕业的柏荫堂，他父亲柏浦仁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抗日自卫队长，家里保存了不少破旧枪支，经支部研究派郑昌颜与柏荫堂直接接触，了解情况，获悉柏家确有10多支废弃的步枪和一挺缺脚架的马克沁重机枪。虽然国民党独立第10师正在拉柏荫堂，并给了他一张连长的委任状，但他并不想为国民党卖命，通过工作，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将全部破枪修好，并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两衡工委经研究批准，成立了祁阳二大队，由柏荫堂任大队长，郑政椿为指导员兼武工队队长，郑飞

雄为副指导员。6月初，该大队在三塘村附近缴了10多个散兵游勇的3支驳壳枪，同月中旬的一个黑夜在湘桂路右侧的马鸡、观山坳伏击向桂林方面撤退的敌人一个连，马克沁重机枪一响就把敌人吓散了，一举缴获了3支步枪、5部军用电话、一部电话总机，俘敌一名。通过这两次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接着他们又把当地地主、豪绅的枪支缴了过来，到8月中旬发展到100多人枪，于是将3个分队扩编为3个中队。9月下旬配合湘中游击队第一纵队解放了祁阳县城，此役又缴获了3挺轻机枪和一批步枪。解放大军到来时，发展到了300多人枪。解放后与第一纵队一道编入零陵军分区独立面。郑政椿调军分区工作，郑飞雄及其他同志大部自愿转到地方，在祁阳县工作。

柏荫堂在解放前夕自动脱离了部队，未参加整编。

（三）祁阳五大队。

祁阳五大队是由中共湖南省工委经郑琼、涂西畴同志派地下党员陈坚同志去创建的。陈于1949年5月到祁阳，6月与邵织成、陈辞、唐德阳、曹海瑞、陈玉才等在祁阳太和小学开办补习班，招收贫苦青年入学，名义上是教数、理、化，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秘密介绍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等，并宣传解放大军渡江的大好形势，激发大家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情，因此国民党特务曾多次进行搜捕，均未得逞。这时衡工委派李雄（文传源）前去与陈坚联系并指导工作，后又加派陈剑夫、郑政椿同志去传达指示和递送文件。陈坚、陈剑夫、文传源共同研究，先后发展了邵织成、陈辞、曹海瑞、全德义、谭运和、唐德明、陈玉才、陈奇、陈肇舜、刘长吉、李才昌、谭柏林等12人为党员，吸收了陈昌茂、邵宏仁、唐九崧等10多人为“新民主主义促进社”社员，成立了党支部，

指定陈坚同志负责。党支部一成立就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陈坚了解到金兰乡各保有枪支 50 多条，决心要把它弄到手。经商议，便先开展一场反对恶霸陈德华、保长陈宗儒的斗争，向公众列举他们的劣绩，保民代表便要求改选保长，结果把陈宗儒选掉，把我们的人陈绍先选为保长，这样就把该保的五支步枪搞了过来。后来陈辞把三保的五支枪也弄到手，陈坚还找了老同学王耀南拿来一支步枪，又出钱买了一支马牌手枪。游击队有了武装，白天分散保管，夜晚集中操练。9 月中旬基本武装群众已发展到 30 多人，遂批准他们正式成立“湖南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二支队二团队五大队”。团队委派王文定（陈剑夫）、邵织成为正、副指导员，陈坚、陈景梅为正、副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陈肇舜，副中队长谭运和，二中队长王镇雄，副中队长全德义，三中队队长陈奇。后来在战斗中逐步吸收一些农民和起义人员，扩大到了 40 余人。到解放后部队整编时，共有指战员 80 余人，轻机枪 2 挺，冲锋枪、手枪各 2 支，步枪 86 支，脱产人员 120 人，半脱产人员 300 余人。

解放后，该大队改编为祁阳县大队，陈坚、陈景梅任正、副连长，邵织成任指导员，其余同志也一一分配了工作。这支部队不久便派去黄土铺、步云桥一带剿匪，一个月即缴获了 240 多条枪，受到了县委的嘉奖。

赵琦、黄振部

这支部队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队第一纵队”，共有 3000 多人，长短枪 1900 多支、轻重机枪 80 多挺、大炮 4 门，活动于祁阳、衡阳、邵阳边界及新宁、道县一带，是省工委领导下的湘南地区最大的一支游击队。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骨干赵琦、陆民华是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和干训队转到地方工作的老同志。赵、陆二人和刘文通又是我 1939 年

在衡山师范时的同学，在衡师1939年入党的地下党党员。1949年初，他们找到了罗特和我，后由两衡工委批准，由他们3人组成党支部，并以他们各自联系的革命力量作基础，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和一些进步力量，策动和利用国民党军政界可以利用的人员起义，准备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5月，他们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游击队第一纵队”的名称，赵琦任纵队政委，黄振任纵队司令员，陆民华为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设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团。赵琦兼第一支队政委，刘文通为第二支队政委，张练斋（进步青年大学生）为第二支队司令员。为了解决部队枪支和经费问题，争取了原国民党退役师长彭林生起义，安排为纵队副司令员，他带来了200余枪，拿出银圆1万元，又策动祁阳县警察局长陈北堂带领30余名武装警察起义，安排陈为独立团团长。因此，游击队力量迅速扩大，短时间即与白崇禧正规部队几个团在祁阳边界关帝庙、祁、邵边界马渡桥、严家庙一带、祁、常边界山地、祁、宁边界山区及祁阳龙口园等处多次发生激战，最后终于会同祁阳第二大队解放了祁阳县城，后又配合解放军野战军参加了衡宝战役，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击毁敌军车3辆，歼敌军一个营，打死打伤敌军80余人。同时设立了支前委员会，支援我大军作战，保护了部分桥梁、涵洞及公共建筑。

解放后，经过整编，改为零陵军分军独立团，赵琦任政委，黄振为团长，陈北堂、张练斋分任第一、二营营长。

文益谦、康庆耕部

这支部队正式番号是“湖南人民解放军湘中游击队五支队二团队”，以文益谦为政委，先后由柏增寿、康庆耕为司令员。活动于衡山南岳至四行山之间的湘江两岸，共有人枪360余。文益谦是1947年在衡阳道南中学读书时，由何大群等介绍

入党的，以后陆续入党的有罗思义、刘剑平、文教良、罗英、欧阳滋、罗辉、赵恒、刘正平等 20 余人。经批准成立沅南区工委，下设青石峰、化龙桥、林源村、武装部队 4 个党支部。1949 年 5 月大军渡江前后，根据省工委关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着手筹建游击队，主要任务是在敌人溃退时，实行武装袭击，保护沅河铁桥不受破坏。文益谦、刘剑平、文教良、罗英等积极筹措，搞到了少数枪支，以党员为骨干逐步发展了一些农民参加，夺取了几个保的枪支和散兵游勇的枪支，策动邓芹香的帮会武装及国民党退伍回乡的军人杨增寿、王桂其的自卫团参加，该部于 6 月底正式公开番号，由文益谦任政委、杨增寿为司令员，文教良、罗英等分别担任第一、二大队的指导员。由于沅水是我解放军与国民党白崇禧部队对峙前线，沅南一带国民党正规部队驻扎很多，正沿沅河南岸建造工事妄图顽抗，游击队活动十分困难，稍一集中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经与敌人几次遭遇，彼此都有伤亡。该部队由于遭到敌军的严密监视、“围剿”，9 月初被迫横渡湘江转移到南岳一带活动。

1949 年 6 月，衡山工委派中共地下党员康华楚策反衡山自卫队司令康庆耕（乃康华楚之父）部。康华楚在重庆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是我党的建党对象，因受特务注意被迫转回家乡衡山，后由刘东安等人介绍入党，故衡山工委派他策动其父起义。该部驻南岳一带。

文益谦率领的游击队转移到南岳后，通过康华楚与康庆耕协商，康部所辖的 100 余人枪全部编入我湘中游击队五支队二团队，文原来所部为一、二大队，康部为三、四大队。文益谦任政委，康庆耕为司令员。

解放后，该部所有武器、弹药全部交给我军。

此外，在永兴还有一支 700 多人枪的团队雷焕、李方部。

解放后，在永兴改编，雷焕同志调地方工作，李楚璠、邓柏等同志调衡阳市工作。谭子山的小分队就地改编。湘南游击队二支铁路武装护路队则在胜利地完成了护路任务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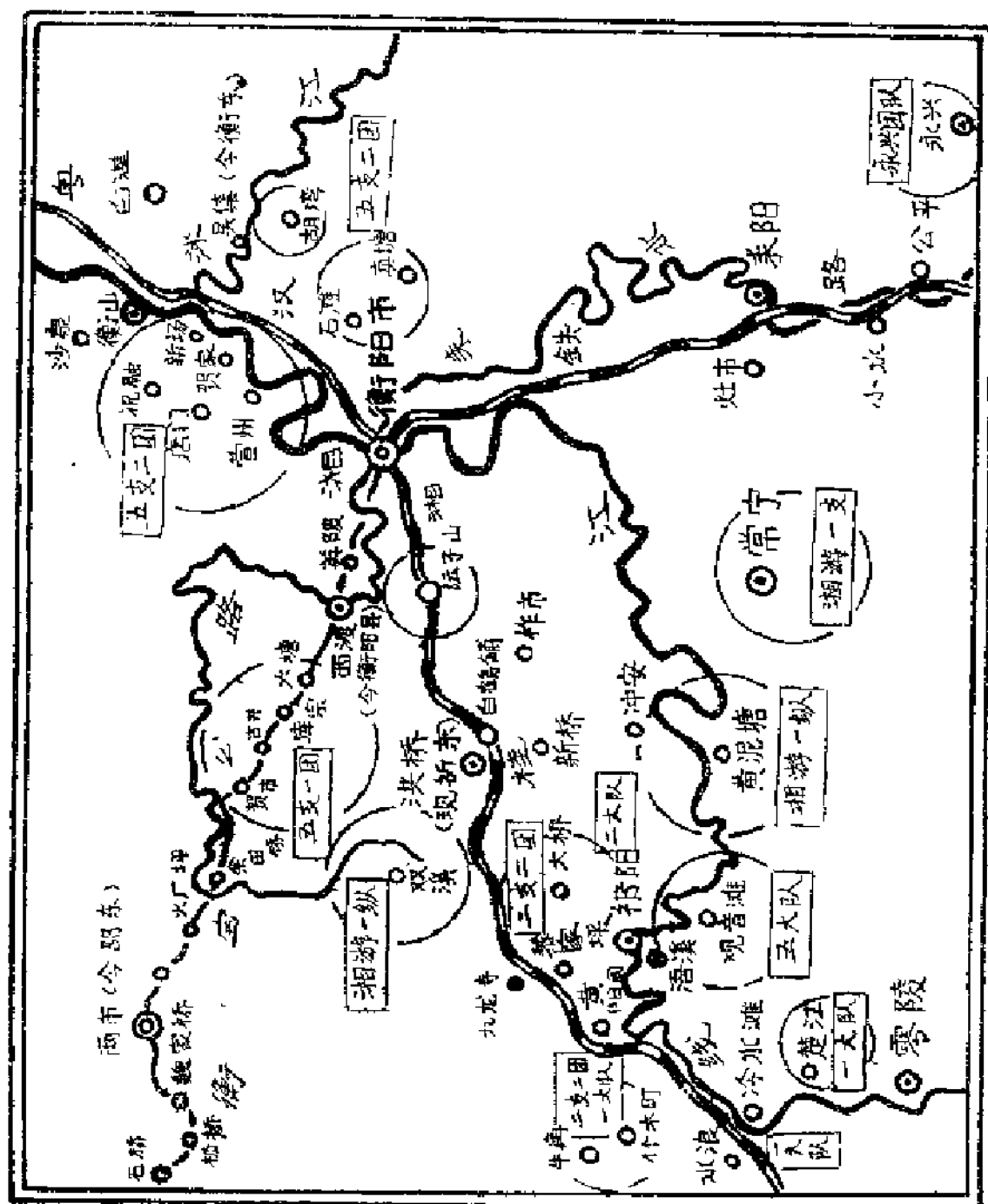
1949年，黄正中把大官僚地主李南民及其它几个地主看家护院的武装拉了出来，打着祁阳大队的旗号，于9月下旬伏击了祁阳县长柏式诺带着的保安中队几十人，缴了他们的枪，投降人员交野战军按俘虏政策释放了。祁阳三大队几十人因事前未经批准，解放后没有必要再建，乃责令解散了。枪支交给了野战军部队。

邓竹修的湘游一支队，陶自强的湘游四纵队，曾与湘游一纵队领导有过联系，但非中共衡阳工委直接领导的武装，详情不清故未录。

到1949年底，湘南游击队在这个过程中协助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衡山、衡阳、永兴、零陵、祁阳、东安、常宁、道县、江华、宜章等10多个市、县，湘南游击部队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各自就地进行了整编，有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合编，有的编入地方军分区或县大队继续进行新的革命历程。

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湘南大地，在10余年游击战争中牺牲的同志，建国后大都被追认为烈士，但也有少数人事迹不可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无名英雄，他们将永远和有名的烈士一样受到后人的尊敬。

解放战争末期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衡阳工委
所属游击队分布情况示意图。



湘中总队五支队一团队二三事

衡山县政协*

1949年5月，稻青麦黄时节，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关于把党的地下武装湘南人民赤卫队和湘中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湘中人民游击队，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加强敌后武装斗争的指示，黄道奇同志来到邵阳团山。湘中总队五支队一团队政委由黄道奇担任，司令员为李建元，下属六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李云胜，指导员李瑞云；第二大队：大队长李超，指导员蒋骥；第三大队：大队长邹伯猛，指导员李岚云、常泰迪；第四大队：大队长颜子贵，指导员袁怀德；机炮大队：大队长李光隆，指导员李岚云；侦察大队：大队长刘俊。再按三三制组编成排、班，加上从事隐蔽工作的人员共约800多人，拥有各种枪支600条。部队经过改编整训，政治觉悟大有提高，队伍更加壮大，活跃于衡阳、邵阳、衡山一带，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活捉敌乡长

衡阳西乡的金兰寺，地处衡阳、邵阳交界的群山之中，扼守衡（阳）宝（庆）公路，是当时湘南——湘西交通的咽喉，市镇也比较热闹。国民党在这里设立了金兰乡公所，派有乡兵驻守，派粮派款，拉丁抓人，为害一方。湘中游击队改编后，就把金兰乡公所定为第一个袭击的目标。而乡公所也慑于日

*衡阳县政协办公室通过访问调查整理了此文。

益壮大的游击队的威力，不敢再在街上办公，搬到离金兰寺三里路的金鸡寨，龟缩在一座庵子里。

7月，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黄昏过后，乡丁早已躲进寨子里关门闭户了。湘中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靠了夜色的掩护，摸到了乡公所寨子边，二班的一位战士向院子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打破了夏夜山区的寂静。紧跟着战士们齐声呐喊“冲呀”！声震千山万壑，吓得十几个乡丁纷纷从后院越墙逃命。当游击队冲进乡公所时，只剩下被手榴弹炸伤手臂和头部的乡长伍振勋靠在墙边，瑟瑟发抖。他一见游击队急忙摆手，连呼“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就这样，一颗手榴弹摧毁了一个乡公所，俘获了一名乡长。

以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游击队驻扎时就把这位乡长关押起来，转移时，就把他用绳索绑起牵着走。有的小孩子一见就大喊：“耍猴子的来了。”最后他亲笔写了手令，将乡公所全部枪支弹药交给湘中游击队。游击队派人按数向乡丁收缴了全部枪支弹药后，才把他释放。衡宝公路上的这口“钉子”就这样被拔掉了。

打击恶霸

衡阳西乡洪罗庙有座孤儿院，院长是恶霸地主、当过汉奸的陈伯珊。抗日战争时期，他装出一幅“慈善家”的样子，

“收养”战争中的孤儿，向国民党请功，与衡阳市基督教美国牧师顾信德挂钩，和社会上各团体联系，连讨带骗，聚敛了一大笔钱；衡阳沦陷时，他充当汉奸，帮日军拉伕抢粮；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门路，要来了大批救济物资，还受到行政院的褒奖，因此横行乡里，生杀予夺，新上任的县长都要来拜访他，他拥有稻田100多亩，还在洪罗庙南边小山上盖起了一座庄园，庄园中有一栋两层的洋楼，古木

参天，绿荫遍地，花园中花木扶疏，石桌石凳。他收养了30多名孤儿，要他们种花、种菜、纺织，还动辄打骂、饿饭，女孩子还要遭到他的污辱。他的第三、第四小老婆就是孤儿院的孤儿，被迫与他同居时还只有十四五岁。为了发动群众，开辟西乡一带的工作，对这个群众切齿痛恨的恶霸、汉奸，势在必锄。

1949年农历5月18日，游击队从四方进驻洪罗庙，放了一排枪以后，冲进了孤儿院。哪料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早已溜掉了。游击队从几个房里把他的大小老婆搜出来。他的大老婆吓得只好把仓库的钥匙掏出来。游击队打开仓库，只见各种物资堆满了几大房间，其中有食盐几千斤，面粉几吨，毛毯几百床，十几大包各色衣服，还有奶粉、罐头几十箱。这些都是从联合国救济总署虚报冒领来的。游击队当即决定，除毛毯用来补充军需以外，其余物资全部搬到洪罗庙街旁蒸水河畔的沙洲上，发放给四乡贫苦农民。群众欢呼雀跃，陈伯珊回来后一看，仓库空了，小老婆也逃走了，十分恼火，只有连呼：“共产党游击队，害得我人财两空。”

伏击敌军车

8月间，部队驻在排楼冲。一天，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最近以来，衡宝公路上不断有国民党的军用汽车经过，载运的都是军用物资。游击队的指挥员开会分析情况，决定在库宗桥到金兰寺之间的古井头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指挥员从各大队挑选了一批神枪手，组成尖刀连，由李超指挥，黎明前越过古井头，埋伏在院子里。由于群众基础好，封锁了消息，始终没有走漏风声。傍午时，一辆军车从衡阳方向疾驰而来，车上遮着防雨布，上面还坐着四个押运兵，车前车后又没有军车伴行，真是难得的好机会！战士们伏在树丛、

草窝里，屏住气息，枪口瞄准军车。等到军车拐弯上坡减速时，大队长一声令下：“打！”一排枪过后，汽车抛锚了。原来是轮胎被击穿了。一个押运兵当场被击毙。其他三人从车上跳下来还想顽抗，也都被神枪手点了名。这时，战士们冲上公路，从驾驶室把驾驶员拖了下来，驾驶员吓得都站不起来了。一些战士爬上汽车，揭开防雨布。出乎意料，车上一箱箱，一捆捆，有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枪榴弹，还有步枪和一些通讯器材，都是崭新的。战士们七手八脚把这些送上门来的军火弹药卸下来，由事先组织好的群众帮助搬运，足足挑满了几十担。一大队战士续正春，是全大队出名的大力士，一个人就扛了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横过一条街，跨过一座山，一口气扛了好几里。

这次伏击战，大获全胜，缴获了一批武器，毙敌三人，俘敌一人，焚毁汽车一辆。游击队无一人伤亡，大大鼓舞了士气，也鼓舞了群众。从此，游击队在行军时，队伍里锃光发亮的崭新迫击炮、轻重机枪，特别引人注目。群众都说：“咱们的游击队也美式装备了。”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 湘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与斗争

谷子元 何大群*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简称“湘游”),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1948年10月至1949年夏受省工委和华南分局委托五岭地委双重领导),由湘南工委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老游击区的基础上组建的一支人民游击武装。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湘游”通过艰苦、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使自己得到了迅速发展。司令部辖11个大队,1个警卫大队,两个直属中队,共有3500人枪。在粤北、湘南各兄弟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活动于湘南15个县市的广大地区,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作战,为解放湘南大片土地作出了贡献。

“湘游”建立的党群组织活动概况

湘南地濒五岭山脉,素为湘、粤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湘南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长期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长期武装斗争的历史。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支援和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党的领导下,1928年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

* 谷子元当时系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何大群当时系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反，插旗分子出，坚持了“敌后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春，游击队奉命集中北上，编入新四军警卫团，走向了抗日前线。在后方，湖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并恢复和发展党员1000多名。1944年冬，日军侵占粤汉铁路湘南地段的部分城镇和乡村后，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在铁路沿线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其中宜（章）、乐（昌）县工委书记罗良幹领导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在湘粤边境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一直坚持到1946年春。从北伐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的20多年里，湘南的武装斗争基本上没有间断。湖南党组织的活动也一直没有停止。抗日战争初期恢复发展的党组织虽然经过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的摧残转入了地下，但仍以各种方式坚持了斗争。

1944年11月10日，党中央派遣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又称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南下，开辟湘粤赣边区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部队进入湖南湘北地区，打击敌顽，建立抗日民主政权。6月，南下支队党委派遣原湘南特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谷子元、李林先潜回湘南老游击区，恢复、整顿党组织，建立游击武装，并奉命积极与五岭部队取得联系，为南下支队开辟湘粤赣抗日根据地做准备工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9日，南下支队在粤北南雄上杉奉命挥师北返。谷子元、李林仍在湘南坚持斗争。一年中，既恢复整顿了多处党组织，开展了党的活动，又筹建了游击武装，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1月，谷子元到长沙与原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取得联系，获悉上级决定原湘南特委书记谷子元、游击队大队长李林留湘南工作。周对谷说：“现在要大力抓城市工作”，要谷通知何大群回省另行分配工作，加上已于日军投降后调离湘南的谢介眉，原湘南特委负责人至此已全部调离湘南。

1946年秋，李林在耒阳被捕。谷子元设法将李营救并送其

出走后，仍留湘南工作。除继续抓党和武装斗争工作外，还开展了统战工作。

1947年7月初，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通知谷子元到长沙汇报工作，并宣布省工委的决定，成立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由谷子元和何大群两人负责。并说：往后陆续调人来，当前要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武装斗争。谷子元回衡阳从新京中学找到何大群，向何作了传达，当即与何研究了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确定工委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抗征、抗粮、抗税）和“三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反蒋运动，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从1948年上半年起，省工委陆续调干部到湘南地区工作，朱汉樵、雷天一、王来苏为湘南工委委员。结果，在原有党组织基础上，湘南工委先后恢复、组建了十几个县、区工委。其中有：汝城县工委，书记朱汉樵；耒阳县工委（后由于斗争需要，扩建为耒、永、安、衡中心县委），书记雷天一；衡阳工委，书记谭善绍；资兴县工委，书记陈传春；安仁县工委，负责人张英奇、张牧阳；临武县工委，书记范卓，副书记毛允明；桂阳县工委，书记徐行；郴、永、桂边工委，负责人即书记黄平；郴县城区区委，书记陈修河，后李楚；郴县栖凤渡区委（包括良田和小溪支部），书记李达海；永兴区工委，书记李德贵；郴县二区龙广洞区委，书记王振周；宜章特支，书记邓厚泽；衡东边新市特支，书记周发韶，后蔡道彝；酃县区工委，书记孟庆德；嘉禾特区，书记李耀周；嘉禾特支，书记李莎青；祁阳县支部，书记高翔；常宁县支部，书记张嗣贵；等等。到1949年春，全湘南恢复和发展的党员约2000名，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如秘密农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以及某些山区的打猎会、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协会、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学术研究会

等,开展了“三抗”、“三反”斗争,以及爱国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和策反工作。1947年冬,资兴县工会秘密联系大革命时期、抗日时期的老党员在农村开展了“三抗”斗争。临武县工委王荐贤在贝溪村及其附近组织农会,举办农民夜校,先后在县城附近建立了7个地下农会,参加的农民达300多名。1948年3月间,湘南工委委员朱汉樵到宜(章)乐(昌)栗源堡一带整顿党组织,进行“三抗”宣传,发动群众,成立了抗征队。4月,王来苏回到耒阳家乡,依靠当地党员,先后在茅田冲、双洲、竹市等地建立了秘密农会,开展了抗“三征”斗争。5月,雷天一在耒阳筹建“立文书局”(此后书局即是湘南工委联络点),同知识分子普遍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在此之前,耒阳大义区白云党组织和农会赤卫队,动员全乡开明士绅营救了李林同志。

与农村斗争相呼应,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的城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也蓬勃发展,掀起了“三反”斗争,1947年6月,衡阳市克强学院的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的“五·二〇惨案”进行罢课声援。宜章县湘南中学等校的师生举行演讲大会,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实质。1948年春,郴郡联中学学生掀起了反对校长肖文铎迫害学生的运动。同年底,衡阳市江东区工委书记周炳杰领导衡阳铁路工人,举行“三反”大罢工,粤汉铁路从长沙到曲江一段的工人也先后响应。1949年4月,衡阳市各校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南京政府制造“四一惨案”的罪行,在演武坪举行了声援大会,沉痛悼念死难烈士。耒阳的广湘中学和永兴三中等县城的学生,亦积极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游行示威。同月,“岳阳惨案”发生后,衡阳市党组织以船山、湘南、建德等中学为据点,发动学生罢课,声援岳阳学运。

以谷子元为书记的湘南工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在广大农村和

城市开展的“三抗”、“三反”斗争，既给了国民党当局以严重打击，又为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8年初，五岭部队逐步由粤北向湘南边境开展武装斗争，找到了汝城县地下党组织，与工委所派的联络员朱上烟等取得联系，建立了交通线。在此之前，朱上烟在汝城、郴州等地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党员。

1948年春，湘南工委副书记何大群代表工委在坪石召集朱汉樵，朱上烟、朱亚林等人开会，具体研究了汝城党的工作，决定：（一）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机构；（二）组织群众开展“三抗”、“三反”斗争；（三）开展爱国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四）搞好交通联络，积极培训干部；（五）紧密配合，大力支援五岭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待机进占县城。

1948年夏，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通知何大群去香港与华南分局和五岭地委联系，积极配合五岭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同时令何将衡阳城市的党组织交由省工委派人接管。8月下旬，何大群回到湘南，将省工委的决定向谷子元作了汇报，共同研究了湘南工作的部署问题。9月，何大群去香港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取得联系。10月，何离开香港到广东曲江，与五岭地委副书记袁鉴文取得联系，经研究决定：将湘南工委所属宜章、坪石、乐昌一带的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站，交由五岭地委所属的曲江工委领导；将广东党组织在衡阳等地发展的党员交由湘南工委领导。从这时起，湘南工委既受湖南省工委领导，又受华南分局五岭地委领导。

10月底，湘南工委在郴县栖凤渡召开了碰头会，讨论华南分局、湖南省工委、五岭地委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湘南工作的实际情况，着重研究如何配合五岭部队和党组织进一步广泛开

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工委成员分赴各地检查了解了武装力量发展情况，指导各地党组织积极领导武工队和抗征队开展斗争。

1948年11月中旬，五岭地委在大庾岭的帽子峰召开扩大会议，通知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前去参加。由于环境变化，谷赶到帽子峰时，会议已结束，人已分散，五岭地委书记张华将会议精神向谷子元作了传达。主要内容是：将湘南地区划分为三线开展工作：第一线是桂东、汝城一带，在粤北武装力量支持下，积极组织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由刘亚球、李林负责；第二线是汝城、桂东以西，粤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农村，大力发展农协组织，进一步发动农民抗“三征”，输送游击队员，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从各方面支援第一线，由谷子元负责；第三线是衡阳到坪石沿粤汉铁路的城镇和附近的农村，广泛开展工运、农运和学运，从兵源、干部、情报等方面支援第一线，由何大群负责。谷子元听了传达，提出铁路以西各县还有党组织，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些地方已经具备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是否可以搞武装斗争。张华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表示：“不是说没有什么工作吗？”谷摆了历史情况，张说：“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总之，你们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嘛！还是照你们原来的部署搞罗！”停一下后张又说：“我是听他们讲的，这个情况我先不知道。”

11月底，湘南工委在郴县栖凤渡区委所在地、党员牛绩熙家（谷子元的住地）召开了会议，传达五岭地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湘南实际情况，讨论划三线后湘南党的领导和工作部署问题，决定：（一）首先创造条件，按时向五岭部队输送干部，包括红军时期的老游击队员；（二）深入开展爱国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对武工队、游击小组的领导，迅速而又有步骤地开展武装斗争。

1949年春，根据五岭会议决定，湘南工委分批向第一线输送游击战士。最后一次13人集中于郴县城关，隐蔽于街坊工厂，由于山区交通不便，来接收者逾期太长，被敌发觉只好疏散。李林后来说：“要我们按期来接有困难，以后不要送了，你们自己搞吧！”从此，二、三线与一线的联系中断，逐渐形成一线与二、三线两个游击区并行发展的局面：一个是一线以汝（城）、桂（东）为中心的游击区；另一个是二、三线粤汉铁路沿线各县及其两侧城镇、农村大片地区的游击区。为了便于抓工作，湘南工委一方面调整了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先后从衡阳等城市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分配到各地加强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领导。

“湘游”的建立与发展

“湘游”的建立是湘南人民长期武装斗争的继续，它是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949年2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伟大胜利后，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军队纷纷向南逃窜，人民群众个个欢欣鼓舞。在这大好形势下，湘南工委于1949年阴历五月初五（公历6月24日），在耒阳大义乡枫树下，村党支部书记谷长宽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适应新形势开展斗争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工委书记谷子元，副书记何大群，工委委员霍天一、王来苏，工委秘书黄镇，郴县城区区委书记李楚、肖昶等。会议经过讨论认为：湘南与五岭地委的联系中断，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无论如何不能等待上级派人来指挥了。因此，决定成立“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宣布了负责人，确定了组织原则和斗争策略。会后，工委将湘南游击司令部成立的情况，用书面报告了五岭地委。并以司令部、政治部名义正式出示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广

大群众协助我军开展斗争，迎接解放。

“湘游”是支队（师）一级建制，司令员兼政委谷子元，政治部主任何大群（后雷天一为副主任），共有3500多人枪。

司令部下设南、北两个指挥所，作为司令部的派出机构，以适应战线过长、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北区指挥所：联系在耒阳、永兴、安仁和衡、耒边的游击武装，指挥员刘明星（因病未到职），副指挥员谭永康，政委雷天一（兼）。南区指挥所：与在郴县、资兴、宜章等地活动的游击武装联系，指挥员肖昶，政委李楚、黄俊如。

司令部辖11个大队、1个警卫大队、两个直属中队。大队（团一级建制）设正副大队长，正、副政委（有的称指导员）。大队下辖中队（有的大队下设团队）。中队设正、副中队长，正、副指导员。中队下辖分队。大队正、副政委，中队正、副指导员一律由中共党员担任。还有相当一部份大队长、中队长也是共产党员。

各大队组建情况如下（人枪系根据近书黔南各县落实政策办认定数）：

第一大队由郴县城区区委派出党员王云于1949将桂东普乐方捷三部（30余人）整编，并发动贫苦进步青年参军扩编成大队。大队长方捷三，副大队长郭名香、肖一平（中共党员），政委王云。辖三个中队，189人枪。主要活动于资兴、郴县一带，以及紧邻各县的边境地区。

第二大队是在1949年2月，由湘南工委派王来苏同志利用红军游击队留下的两支一号驳壳种子枪成立的武工队。随后，即扩建为大队。大队长王来苏，副大队长谭永康，政委伍刚，副政委周汉。主要活动于耒阳河东，以及紧邻的安仁、永兴、衡阳等边境地区。1984年4月省委统战部认定为510人。

第三大队则由何奇组建的资兴西里乡游击队与渡头游击队合编后发展而成。大队长何奇（中共党员），副大队长朱克威，指导员（政委）陈佳春，后何力洪、罗继开，副指导员（副政委）唐振良。辖二个中队，一个政工队，222人枪。主要活动于资兴、郴县及永兴、桂东边境地区。

第四大队是在陈修河（党员）组建的游击队的基础上组成的，5月，发展为大队。大队长兼政委陈修河。辖二个中队，一个分队，一个政工队和宣传队，188人枪。主要活动于粤汉铁路郴、宜段沿线及宜（章）、资（兴）边境和宜（章）、郴（县）边境。

第五大队：以郴县栖凤渡区委委员段韬组建的骑田岭武工队为基础组成，4月发展为大队。大队长段韬（中共党员），副大队长黄力生、黄翠芳，政委李达海。辖三个中队，144人枪。主要活动于郴县境内及粤汉铁路沿线之西边山（即骑田岭）和郴永、郴桂、郴宜等边境地区。

第六大队：以桂阳地下党员邓名炯组建的“郴桂边人民解放工作队”为基础组成，6月发展为大队。大队长何炳辉，代副大队长谭芳荣，政委邓名炯。辖三个中队，一个直属队，222人枪。主要活动于桂阳及临、桂边和郴、桂边境地区。

第七大队：原“湘南挺进纵队”队长刘子剑，于1949年春组队后，主动找党的关系。同年4月，湘南工委派周××同志去该队工作，后因故调回，至5月底，改派曾熙去该队任政委。并先后派进党员干部、地下农会青壮年农民去充实队伍。大队长刘子剑，副大队长任南方、徐术勋，副政委任尚诚。辖五个中队，一个警卫中队，500人枪。主要活动于耒阳河西及常宁、永兴边境地区。

第八大队：它的前身是衡阳牌楼冲党支部书记、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刘纯宜变卖公产购枪武装赤卫队而组成的“湘衡支

队”。该队一部分人枪编到“湘中二支队”，留下一部分仍接受刘纯宜同志领导，并不断扩大。这一部分同志殷切期望与我游击队一起战斗，因而编入“湘游”序列。大队长兼政委刘纯宜。辖三个中队，一个机炮队，400人枪。主要活动于衡阳西北乡之牌楼冲、演陂桥、马尾岭、库宗桥及衡（阳）、邵（阳）、祁（阳）边境地区。

第九大队：由老党员李又村、新入党的谷一心策动耒阳县警察中队以及平陵乡乡公所起义的人枪为基础，逐渐扩建为大队。大队长李保安，副大队长李发云、曹青云、陈章标（党员），指导员（政委）谷一心，督导员李又村。辖三个中队，150人枪。主要活动于耒阳东湖、三都、上架及永、耒边和耒安公路沿线。

第十大队：以安仁县起义的农民武装，老游击队员吴戴嵩率领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动贫苦农民、知识青年参加组建而成。大队长吴戴嵩，（后为周武夫、中共党员），政委李济农。辖三个中队，197人枪。主要活动于安仁境内。

第十一大队：以衡阳西渡武工队为基础，逐渐扩编而成。大队长先后为伍光汉，伍尚德（党员），政委先后由汤建辰、刘信、谭新东担任。辖二个中队，265人枪。主要活动于衡阳西乡、檀山咀一带，以及衡（阳）、邵（阳）边境地区。

警卫大队：以我党从1946年就控制的耒阳大义乡地下乡公所的人枪和当地农会的赤卫队员为基础，并从二大队抽调个别干部，与谢铁峰率领的耒阳西北武工队人员组成。大队长谭祉繁（中共党员），政委唐永尧。辖三个中队，100人枪。该队随司令部行动。

还有两个直属中队：

①司令部第三中队，是郴县栖凤渡区委组建而成的。中队长曹崇礼（中共党员），指导员谷安周，70余人枪，主要活动于

本地和郴永边境、粤汉铁路线上及两则农村。

②司令部直属第六中队：由衡、耒边境负责人伍鸿基、刘明星、蔡道沂组建。其中一段时间属司令部和耒、永、安、衡中心县委双重领导。中队长廖俊恒，指导员蔡新民，有100余人枪。主要活动于以新市为中心的衡、耒边境地区。

这期间，在湘南工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下，耒、永、安、衡中心县委，各县工委、区工委，“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烽火迎解放”，各地还纷纷组建了一些地方武装，有的游击队由司令部与地方党组织双重领导。

其中有：临（武）、桂（阳）边人民游击队，由欧阳显杰当队长的“临桂边人民游击队”和王荐贤领导的贝溪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而成。7月，湘南支队把临桂边人民游击队改名为临武人民解放工作队，并将王荐贤的贝溪游击队、宜章的黄驭白等部合编为“湘南支队独立大队”，由420人枪扩大到605人枪，活动于临武、宜章以及桂（阳）、嘉（禾）边境。

资兴县解放大队：由资兴县工委派出的地下党员陈大林、李大白等策动起义的县自卫队副总队长陈弟情部和我地下农会会员组建而成。经请示湘南游击司令部同意，资兴县工委授予了该队番号。大队长陈弟情，指导员陈大林。辖三个中队，一个政工队，152人枪，活动于资兴县境内。

郴桂边中队：由郴城区委所属的华塘支部组建而成。中队长谢万福（中共党员），指导员邓文光，30人枪，活动在郴、桂边境的华塘、保和等地。

唐廉中队：由中共郴城区委所属的良田党支部、地下党员李昌硅组建而成。中队长唐廉（中共党员），指导员李昌硅，后邓名佐，55人枪，主要活动于郴县东边璠岭、五盖山一带。

此外，还有由县委直接指挥正在发展扩大的县、区武工

队。资兴县有由县工委组建的基于队。队长曹林，袁克强，60人枪；由黄静等组建的程、永、复（乡）边区武工队，队长陈正南（中共党员），50余人枪；复兴区武工队，队长夏南，30余人枪；城北武工队，队长朱谷平（女党员），40余人枪；三都武工队，队长谢奇梁，27人枪；永正区武工队，队长黄镇江，16人枪。桂阳县有：县工委联系的衡阳工委领导的桂（阳）、临（武）、蓝（山）、嘉（禾）、江（华）边区游击队；安仁县有：县工委张英奇等组成的候吉福武工队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敌情的变化，各地党组织先后建立了一批地下交通联络站。我游击司令部成立后，中共栖凤渡（丰乐乡）区委、耒阳大义区委，分别担任南、北交通联络总站的工作；郴城区委谷安周家和耒阳立文书局分别担任与五岭地委的交通联络站任务。这些联络站，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敏捷可靠、深入敌人要害部门的地下交通联络情报网。它不仅为“湘游”作了耳目，还通过各种关系为“湘游”输送兵源，供应党内学习资料，油印重要文件，采购医药用品，以及对外大量筹款，在后勤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湘游”的主要活动与斗争

1949年四、五月间，白崇禧部从武汉溃逃进入湖南后，敌“华中剿总”就盘踞在衡阳，58军、35军、交警总队、99师盘踞在耒阳、永兴、安仁一带；82师、11师、交警二旅、别动队、保安10团、郴州师管区盘踞在郴州；暂200师驻宜章；暂2军副军长郑绍裘拼凑的“湘粤赣边区反共救国军”司令部和国民党少将、军统特务霍远鹏的“反共救国军湘南纵队”（适存部队）盘踞在永兴、安仁、酃县和资兴边境。此外，还有衡阳警备司令欣冠、二区行政专员段子为和三区督导员何清都成倍

扩充自卫队、警察队等反动地方武装。他们的战略部署即所谓“御敌于国民之外”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是企图在湘南与我军决一死战。失败后，妄图依五岭山脉同我周旋。我湘南游击司令部针对敌人的动向和所作所为，在各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开展了多种活动与斗争。

1. 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湘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湘南工委于7月上旬，在耒阳大义乡司令部驻地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决定：（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湘南游击司令部”名义和“湘南人民革命军政委员会”名义，分别发布告，大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号召广大群众，协助我军迎接解放；（二）在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进行整党建团和整军活动，培训干部，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三）加强统战工作，团结社会民主力量，建立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组织，采取依靠群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分化瓦解敌党、政、团、县、区、乡、保等组织，建立两面政权的地下乡公所，粉碎敌特“以组织对付组织”的阴谋；

（四）司令部所属各大队逐步向粤汉铁路沿线及紧邻各县城附近集结，创造包围城镇，相机进攻的条件；（五）加强农村建政工作，实行减租减息，耒阳大义和资兴渡头、宜章赤石等有条件的地区，首先实行。会上还起草通过了《党内秘密条例》，

《游击队政治工作条例》和《中共湘南工委整党建团决议》等文件。会后，湘南工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狠狠打击敌人进攻的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北区指挥所根据工委和司令部的布署，首先大力翻印了宣传品，如司令部的“布告”和“告湘南人民书”的顺口溜，还写了大量标语口号，分送各地党组织，并派人在赶墟前到墟场张贴，还通过各种途径，把宣传品送到地主、士绅、乡政府官员手里，有的还分别附上借粮、借钱、征枪等通知书，收到钱、粮、枪后，给予司令部

统一印制的收条。南区指挥所印发了《宣传大纲》，《告三湘父老书》，《给国民党伪政权武装同胞的信》等。在衡（阳）、耒（阳）等地；耒阳大众学校党支部翻印了大量文件和宣传品，寄发各地。衡阳工委采取由本地发信到外地，和由外地发信到本地的办法，先后向湖南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顽固分子，发出大量警告信，积极搜集敌军情报，供给四野46军136师，并在电厂建立地下印刷组，出版了秘密小报《挺进》。与此同时，安仁县工委和游击司令部政治部还印发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土地法大纲》、《中原减租减息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简章》，《农会组织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湘南游击司令部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印发了《政唱新民主主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好地方》等政曲，号召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城乡广为散发，以唤起民众，消除顾虑，不受反动派的谣言所欺骗。

2. 积极培训干部，提高游击队的素质。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各地党组织游击队，根据建党建军文件精神，先后进行了短期整训。1949年7月底，司令部率领所属人员与二大队指战员会合，在耒阳大义乡元家冲曹家村，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整训，由何大群讲政治课，王来苏做军事示范，通过官政兵，兵政官，和山地军事演习，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8月中旬，司令部又调集了二、七、九大队和警卫大队，在司令部驻地耒阳大河滩狮子岭紫霞仙（佛教丛林）进行整训。通过学文件和诉苦教育等，查思想、查作风、查军纪、查斗志，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自我教育。九大队分队附刘后稼在执勤中强奸少女，严重装坏军民关系。经查证属实，由该大队报司令部批准，处决了他。这期间，由政治部副主任雷天一，民运科长曹荣等负责，主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

共培训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120余人。各地党组织也开展了短期整训。临武县工委熊子烈，王存贤、毛允明，先后办了两期训练班，培训了80多个工农青年。南区指挥所组织所属部队在资兴清江、渡头和郴县龙广洞一带进行整训。各大队也都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了培训。通过培训与整顿，既改变了部队严重缺乏骨干的被动局面，又提高了整个队伍的素质，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3. 加强统战策反工作，彻底分化瓦解敌人。1949年秋，白崇禧部及其“华中长官公署”加紧南逃准备，疯狂地进行“清乡”活动；湘南工委和湘南游击司令部立即布置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策反活动，分化瓦解敌人，粉碎敌人清乡阴谋。在耒阳，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甲、乙两派之间，党、团之间，复员与转业军官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谷子元同志是耒阳县大义乡白云村人，他从1927年搞农民运动开始，就在这里从事党的工作，任过湘南特委书记，与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当时，通过做工作，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的一批转业复员军官，不仅把大义乡公所掌握在我们党组织手里，让他们听我党的指挥，而且孤立分化了国民党县政权在耒阳的统治。一次，县长召开乡长会议布置清乡围剿事宜，前去参加的寥寥无几，搞得他们会都开不拢。司令部以及所属的二、七、九三个大队在这里活动，先后策动耒阳县警察中队第三分队长黎坤，常宁白沙乡乡长王化行，“湖南义勇军”第九大队徐术勋，以及环湖乡乡长郑清华，平陵乡乡长曹青云，马水乡乡长梁彪，下塘乡乡长资扬烈，兴业乡乡长谢世南等率部起义。转业军官、骑兵旅长陈陶，副师长谷乐军，团长谢绍辉，刘吉祥等经我党争取，情愿交出各自心爱的长短枪40多支和望远镜、军毯等用品。这为司令部以及二、七、九三个大队在耒阳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安仁县工委张英奇、张牧阳

等，邀集当地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座谈形势，鼓励他们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并通过张兴中促使“谈话会”成员、国民党转业回乡军官李超华上台当县长，从而使安仁县政权摆脱了白崇禧部的控制，争取了县警察局分队长唐名辉，县政府主任秘书何达才和“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湘南纵队”司令部直属大队张佐夏等率部起义。衡阳市城厢区工委周震阳等，大力发挥“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这一统战组织的作用，积极策动了衡阳市市长杨晓麓，衡阳市参议长王继五，以及衡阳市警察局局长胡笃一等人起义。祁阳区工委陈静波，利用父亲陈炳文与国民党新七军第二师少将副师长周昆源的至交关系，策动了新七军第二师起义。酃县区工委金健等，通过秘密谈判，策动了国民党回乡军官、酃县自卫队主任金超俊率部起义。这孤立了白崇禧部张淦兵团驻耒、永、安、酃部队和当地顽固分子段子为、交警头子霍远鹏，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湘南的崩溃。

4.护桥、护路、护厂，筹集粮草，支援大军南下。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前夕，白崇禧部积极准备炸毁粤汉铁路沿线桥梁隧道和城镇工厂、邮电等战略设施，企图阻我主力继续南下解放大西南。湘南工委和游击司令部及时通知各地党组织和游击武装，认真负责做好护桥、护路、护厂支援大军前进的工作。一直担任保护栖凤渡乡南、北两用铁桥和婆婆崖隧道安全的直属第三中队，早已严阵以待，当敌人准备炸毁桥梁隧道前夕，机智地拔掉雷管，乘机击退了担负炸桥任务的敌工兵连，保护了铁桥隧道的安全。10月7日，南区指挥所执行司令部进攻郴州城的命令，率一、三、五大队主力和直属唐廉等解放郴州城，保护了郴城苏仙铁桥。在安仁县工委张英奇等退过与县长李超华秘密谈判，有放地保护了全县境内的银行、粮食、邮电、医院、学校以及县政府的全部档案资料，抢救了国家财

产，保证了南下大军的后勤军需供应。郴县栖凤渡区委书记（五大队政委）李达海与曹修竹（区委组织委员），动员民主人士曹希正、乡长段阳春等出面召开军政人员和士绅代表会，成立了“栖凤渡地区餉械筹备委员会”，由曹希正、段阳春任正、副主任，负责为我军搜集枪支和筹集粮草10多万斤，支援了游击队和过路大军的粮草供应。沿耒水河边的党组织，积极准备支援大军渡河，永兴三王乡党支部率领永兴民运工作队员，发动组织20多只民船搭浮桥，保证大军渡过耒水，直插粤汉线，追歼白崇禧军。祁阳区工委高翔等在县城交通要道，散发大量传单，警告敌人老实守法，停止一切反革命活动，保护了粮仓、机关、学校、工厂、银行。盘踞在衡阳市白崇禧“华中长官公署”，在七、八月份就强迫衡阳电信局，衡阳铁路局机务段和衡阳盐务处等要害部门，向零陵和桂林一带搬迁，此计不成，又想将衡阳电信局的设备拆迁疏散，把衡阳电厂和衡阳机务段炸毁。衡阳城厢区工委与两衡工委配合，积极组织发动群众与敌周旋，机智灵活地保护了大部分电讯设备和电厂、机务段的安全。大军进入湘南时，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搞好迎解支前工作。我部所属武装主动进攻打击敌人，为大军进军大西南扫清道路。

5. 全面开展游击战争。日军投降后，湘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希望休养生息，过和平民主生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破坏“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湘南地区党组织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吸取过去没有武装就没有说话的地位的经验教训，千方百计搞武装，组建武工队。同时，争取控制乡保政权，建立两面政权的地下乡公所，开展统战工作。在此基础上，紧跟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在原有老游击区和临（武）、桂（阳）、蓝（山）、嘉（禾）等地，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依靠群众，由点到面地逐

步开展了游击战争。

早在1945年6月，谷子元、李林与南下支队先行潜入湘南后，就在郴县东边山组建了郴县游击队，由李林负责。1946年5月，李林在耒阳大义乡被捕经营救脱险调出湘南后，游击武装由谷子元交大义乡白云党支部谷安忆和刘永戟负责，重建了游击小组。同年9月，谷子元在耒阳家乡被青年军205师山炮营和耒阳县警察围搜后脱险，转移到衡阳农村清潭附，游击小组则与我党所控制的大义乡队附潭社繁掌握的武装相互依存，配合行动。1947年6月，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后，在省工委指示下，湘南各地党组织一面组织武工队，一面采取派进去、拉出来等办法，争取和控制了一批乡、保组织及其武装。栖凤渡区委先后派党员曹崇礼和杨国雄打入栖凤渡（丰乐乡）乡公所，曹崇礼掌握了邮电，杨国雄担任了枪兵队长，同时还先后派党员牛绩熙、曹修竹当了保长，推举民主人士段阳春当了乡长。1948年，段韬率领的骑田岭武工队和刘纯宜领导的衡西赤卫队相继组成，由秘密串连活动进入公开武装斗争。大军渡江前夜，永兴的民枪李湘部已为我控制，工委委员王来苏率领的武工队伏击耒阳县政府的催粮队，支援人民反“三征”、反内战的斗争，各地武工队、游击小组纷纷组建起来，积极收缴警察所和乡公所枪支，宣传我党我军各项政策，部队迅速扩大成长。各地党组织配合武装斗争的开展，依靠群众，抓住时机，破坏敌人部署。1949年4月，郴城区委领导下的鞭炮行业党支部书记谷安昌与我党衡阳工委派在粤汉铁路衡郴段线上的情报员取得联系后，机智地炸毁了敌人在郴州火车站堆积如山的枪弹炸药库。5月中旬（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湘南工委派员赴桂阳、临武成立临桂边人民游击队。不久，临武县工委率领临桂边游击队配合连江支队，首次打进临武县城，震惊了敌人，鼓舞了群众。6月下旬，湘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有了统一的

指挥，全面的游击战争便如火如荼地在湘南各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湘游”先后进行的游击战斗达八十余次。在郴资永战场，五、六月间，首先是一大队从桂东普乐出发，解放了资兴兰市、谷洞、廖江市、木根桥等乡镇，推毁了这些乡镇的政权和自卫队；三大队首战滢溪江，解放渡头司，进军旧市、东江、冷水等乡镇。7月初，资兴县自卫队总队附陈弟情提前起义，一度攻占县城，旋即退出，继由南区指挥所统一指挥一、二大队和陈弟情部攻克资兴城。在江口阻击敌交警，配合兄弟部队打彭公庙，还打了龙溪，两次进军塘溪洞，解放了桥口，袭击了白崇禧部的寸石口哨所，在许家洞、石泉铺、郴资公路沿线，伏击了白崇禧部。五大队自1948年成立后，先后粉碎了良田、小溪、李氏黄家自卫队的五次围剿。1949年3月后，两进栖风渡，与交警七支队激战，攻打黄茅、良田自卫队。袭击万寿桥强敌，三战李氏黄家地主武装，包围五里牌自卫队。4月，在南区指挥所统一指挥下，与一、三大队解放了郴州城。进城后，司令部警卫大队大队长谭祉繁代表司令员迫使和接受郴县县长周庚星带领全部武装在塘昌铺投诚，交出步枪300余支，子弹万余发。五大队再战彭公庙。资兴解放大队第一次攻克资兴城撤出后，7月配合一、三大队再克资兴城，二次参与攻打彭公庙，阻击敌保安团李子才部，并在廖市回龙山歼灭白崇禧军。二、七、九大队和警卫大队横扫耒阳敌乡公所，先后组织大岭、大义突围，与白崇禧部战于黄狗恋窝、小水铺和承坪岭，10月，与主力会师，解放永兴、耒阳。十大队经过茅里坪、龙海坪、罗鼓洞、罗家桥等战斗，配合大军参加衡宝战役。八、十一大队在祁、衡一带袭击白崇禧军，八大队最后活捉了敌少将司令左大凌。六大队袭击东堡、大乾、中和、万元和郴县永宁乡公所，在沙坪袭击保安团的抢粮部队，在芦村八栋新屋阻击保安第七团和第十团，10月，郴桂边中队

配合湘南支队，激战清和圩，攻打桂阳城。临武游击队取得连江支队的帮助和统一指挥，两次攻克临武城，袭击铺下，解放了香花岭锡矿区，还参加了文昌圩的伏击和五里碑阻击等战斗。四大队继解放赤石、杨梅山煤矿后，经历了平和缴枪，白石岭斗交警，龙王庙、上水源、与敌周旋，袭击谢子才、张文照等地方武装，勃水岭鏖战，袭击里田、桃花岭，进军白石渡，解放宜章城等战斗。

各大队经历的主要战斗

1.攻入临武城。1947年12月，临武县工委范卓、毛允明、王荐贤等根据湘南工委指示，举办农民夜校，组织秘密农会（公开称学生自治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失学失业青年读书会”，为武装斗争准备力量。湘南工委主要负责人曾多次派人去督促检查工作，这时粤北连江支队也派邓貽鼎潜入县自卫队做策反工作，工委派谷子元亲自授予临桂边人民游击队番号，任命欧阳显杰为队长，袁理凡为政治指导员。时粤北连江支队黄孟洁团进入临武汾市，谷即请连江支队领导帮助，配合行动。3月24日，游击队配合连江支队一举攻入临武城，解放了城北和大片农村，这是我湘南地区游击队第一次进县城，也是我们解放最早的县城。县长雷孟炎率交警和自卫队逃到麦市，是役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30多箱，打开牢门，放出受害群众70余人。

2.炸军火库。1949年春末，长期潜伏活动的郴县城区谷安昌党支部，与衡阳工委派在粤汉线刺探敌情的党员黄勇取得了联系，得知白崇禧部调来40多节车厢的武器弹药到郴县火车站，堆积在两边月台上，谷安昌向湘南工委负责人反映了这一情况。4月25日，工委负责人指示区委组织委员谷安周，同该支部成员开会，研究如何打乱敌人的内战部署。会上决定乘装卸

需要劳动力之机，派人混进去把敌军火库炸毁，分工由胡鹤云作掩护，谷安昌、刘简文、唐子云年纪较大，办事老练，执行炸破任务，时敌人戒备森严，接近炸药车厢很不容易，正好敌人抓伏搬运枪弹，谷、刘、唐乔装苦力，有意让敌人抓进去装卸。谷、唐都是做鞭炮的行家，早已准备了鞭炮引线，乘敌不注意时，潜入车站将长长的引线埋藏在炸药堆里，傍晚收工时，偷偷点燃了引线，迅速绕道梁家湾，奔回奎马岭窑洞，只见车站火光冲天，顷刻地动山摇，一连爆炸了三天三夜，车厢里，月台上的武器弹药全炸毁了，喜得群众拍手叫好，吓得敌人丧魂落魄。

3. 解放资兴城。1949年7月初，南区指挥所指挥员肖昶，政委黄俊如，在瓦家坳开会，研究攻打资兴县城。会后，由于敌人有所发觉，我地下党策反的县自卫总队副队长陈弟情率部提前起义，一度攻入县城，活捉了县长郭拥民、警察局长邹毅强。后因敌众我寡，战斗失利，县长、警察局长脱逃，起义部队被迫撤出县城。南区指挥所再次在李家坳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攻城部署，7月10日下午，指挥所率领一、三大队和陈弟情起义部队攻城，与敌保安七团、交警反共救国司令部黄存荣团1000余人作战，一大队从西门，三大队从南门攻入县城。陈弟情部控制县中后山制高点，掩护一、三大队攻打反共救国军司令部。著名女作家白薇早已做过敌团长黄存荣的策反工作，在我政工队的喊话下，黄存荣首先率部退出县城。交警司令部凭籍美式装备负隅顽抗，我方以炮轰毁敌工事，发起强攻，午夜敌被迫情逃，我缴获步枪135支，电台一部和大量军需器械，打开牢门释放了40多名政治犯。11月成立了以肖昶为主任，袁漫游、王云为副主任的军管会，宣告了资兴的新生。白崇禧部82师从郴州城向资兴反扑。7月下旬，我游击队因敌主动撤出资兴县城，配合湘南支队及粤北支队进攻彭公庙，与敌

交警作战。

4. 大岭激战。1949年8月，安仁和平解放前，南下大军已进驻攸、茶、安边境一线。7月，我二大队通过大义整训后，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决定翻过耒、安交界的大岭与大军联系。部队取道浔江、马水向大岭前进，在敖山庙途中，暴露了目标，当部队到达大岭时，刚从安仁、茶陵一带被我主力击溃的白崇禧部也同时从安仁那边上了大岭。同时，由刘铭鼎率领的反动地主武装和交警霍远鹏部紧随我之后，逼我向白崇禧部方向前进，企图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全歼我部于大岭丛山峻岭之中。我二大队派出的联络通讯员又先后被敌人捕捉，军情难以送出，数十倍于我之敌人，已杀气腾腾地向我扑来，气焰十分嚣张，大队长王来苏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向尾随之敌展开强大攻势，战斗从凌晨4点开始打到12点，敌人先后组织4次冲锋。我部利用有利地形顽强还击，号召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与敌人作殊死决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山那边的白崇禧军，一时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行动。当敌人登上峰顶，向我组织包围时，我二大队已乘隙冲出包围圈，向敌人开展反击，有力地打击了顽敌，振奋了群众。

5. 奋战小水铺。7月，七大队刘子剑部奉命攻打耒阳西乡之白沙乡公所，俘敌60余人，缴获长短枪64支，子弹4千余发，敌二区专员、反共顽固分子段子为大吃一惊，立即组织力量向我部围攻。当时，七大队正奉命开赴粤汉线进攻小水铺乡自卫队以及美武装的铁道兵团之敌，由于敌人装备优良，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我指战员奋勇冲杀，敌又调来耒阳县自卫队、永兴交警队投入战斗，对我进行夹击，七大队长刘子剑命令部队“血战到底”，在四中队指导员被俘、战士谢光明和伍支武壮烈牺牲、伍坤等负重伤的严重情况下，中队长段荣阶、伍青荣等再次带头冲锋，指战员个个奋不顾身，打得敌人难以

招架，我部乘胜迅速转移，龟缩在宋阳之敌人深感寝食不安。

6. 彭公庙会战。粤北支队、湘南支队与敌暂200师在汝城之文明战斗后，于7月24日进入资兴县境内。湘南支队副司令员李林命令我南区指挥所率部队到青市会师，攻打彭公庙之敌。经资兴军管会与南区指挥所共同研究，决定放弃县城，由肖昶率一大队去青市，并通知正在江口执行阻歼敌交警任务的三大队迅速到青市会师。湘南支队司令员刘亚球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研究进攻彭公庙计划，由粤北支队叶昌主力团和湘南支队向彭公庙之敌交警胡孟清、曹泽林部作正面强攻，我一、三大队担任断敌后路，截击逃敌任务。7月22日下午2点左右战斗打响，粤北支队从正面猛攻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夺取了前沿阵地。敌企图打通后路逃跑，向我阵地猛烈攻击。我部英勇还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多名。第二天敌发现我无重武器，即组织大部队向我猛冲。我部一面坚守阵地，一面要求刘亚球司令员和边区总队调重武器支援。时战士李彩良等负伤，情况十分紧急。边区总队重武器随后赶到，猛烈还击，大股敌人，才缩回彭市。激战到第三天，敌不支，我军进驻彭市。敌97军82师一个团纠集自卫队和地主武装千余人又向彭公庙反扑。时湘南支队直属第三大队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失利。湘南支队司令部命令部队向桂东沙田转移，由我一、三大队担任后卫。我坚决回击尾追之敌，胜利到达了沙田。

7. 塘溪突围。8月初，南区指挥所率一、三大队从桂东沙田经资兴龙溪到达渡头、清江，成立渡头办事处，何遵为主任；随即翻过人迹罕到的山河大山，直插郴县塘溪、山河，乌岭、大浪江一带，成立永丰乡办事处，主任曹维青。还成立农会，建立游击队活动据点，与郴县南面驷田岭的五大队，西面华清、保和的谢万福中队，东面的唐廉中队，北面栖凤渡的曹崇礼中队，构成对郴城敌人的包围圈。部队进入清溪后，沿

郴、资公路开展活动。首先攻克桥口镇，袭击敌军用汽车。在大浪江截击敌100余人的抢粮队，夜袭距郴城10公里的寸石口排哨所，毙敌2人，俘敌2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40枚。郴城之敌，惊慌万状。郴县民报当时刊载了一条消息：“共匪肖昶部三千余人，甚为猖狂，在麻田、大浪江、乌岭、打奎上、陷池塘等地骚扰。”因此敌调集两个正规团和自卫总队3000多人，以地头蛇首纶言为向导，重重包围塘溪，企图一举歼灭游击队。我抢先登上山河的山巅望仙亭，乘隙甩掉敌人。唐廉中队攀上海拔1900米的狮子口后，分成两路，一路由黄俊如率领指挥所一部分火枪与唐廉中队会合；一路由肖昶、李楚率领一、三大队郴过山河大山，向清江转移。部队突围后，根据司令部相机攻取郴城的指示，又迅即回到塘溪一带。

8. 勃水岭阻击战。9月21日，敌暂200师从良田下车向汝城、资兴边境去进攻湘南、粤北友邻部队，我四大队在勃水岭组织了一次伏击，毙敌10多人，其中副营长一人，敌从九子岭，双头岭用强大火力向我方压来，我游击队将敌人引入山高林密的勃水岭与之周旋，敌分片进行搜索，我利用地形还击，敌人始终不敢逼近。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3点，我吸引敌军越过几个山头，走了130多里，终于甩脱敌人。但敌人不甘心，3天后在教场坪又与我发生遭遇战，我方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和夜袭战术，使敌人防不胜防，不得安宁。在赤石一带拖住顽敌15天。其时，郴南支队也就将主力转移粤汉铁路西侧的临武一带活动。

9. 界首会师。8月底，郴南游击司令部所属警卫大队和二、七、九大队在大义乡的石文冲会合，决定第二天晚上去歼灭夏塘乡资扬烈部。后来得到党和群众密报，白崇禧部已调集兵力进驻牛口、夏榴一带。由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司令部即

命令部队转移到大河滩，开辟狮子岭、紫霞仙驻地。旋即调五大队段韬部进入栖凤渡乡配合围歼湘阴渡之敌。由于五大队被敌霍远鹏部第七支队与特务汪治华的所谓“湘南特务团”袭击而返回骑田岭，我计划未实现。敌人调兵遣将，四面紧缩包围，企图一举歼灭我军。这时，司令部曾派北区指挥所雷天一同志通过地下党组织与进驻安仁的四野46军136师取得联系回到狮子岭。司令员立即决定率部突破敌人层层封锁，插入安仁与解放大军会师，遂留下七、九两个大队与白崇禧部周旋。这时，宋阳段子为正率领队伍与白崇禧部合围我狮子岭，扬言要“血洗太义”。9月24日下午5时，司令部率领警卫大队，二大队从陶州渡过耒水，经太义桥头下、安平司进入安仁，冲破安、永边封锁线，袭击承坪岭白崇禧部及碉堡，缴获冲锋枪两支，毙、伤、俘敌数名。敌跟踪，我军改变行动计划，向茶陵县境之界首进发。半夜鸡鸣，指战员仍在羊肠小道上疾进。而进驻茶陵界首的解放大军也多次派出侦察部队四处巡逻。这时正巧和我们先头部队会师了。我们第一次看到闪闪发光的“八一”帽徽特别高兴。在洋溢着一片战斗豪情的气氛中，侦察部队和我们于9月30日拂晓一道进抵界首，与第二野战军18军会师。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在茶改一中驻地热情接待了谷子元和游击队全体人员，大家欢呼若狂，个个精神抖擞。第二天，耒、永、安、衡中心县委领导人和第二大队由四野46军136师派人接到安仁，稍事休整后，即与解放大军进军耒阳。司令部警卫大队则配合18军向永兴方面挺进，于10月4日解放了永兴城。

10.解放耒阳城。10月4日，王来苏奉命率二大队同四野46军136师从安仁向耒阳进军。5日，部队进入耒阳县境后，兵分三路：一路由郝新民、廖仁柯等带队，配合136师一个团，经坪田、洲陂，从新市渡耒水负责截断新粤汉铁路和耒衡之

敌，相机进攻耒阳城：一路由雷天一率领，配合136师一个团经大岭等地，从大陂市渡耒水向县城前进攻取县城；一路由王来苏率一个中队配合136师一个团沿耒安公路，直扑县城。6日午4时，部队到达竹塔市、石子江一带，随即派人到耒水东岸侦察。傍晚136师命令二大队趁天黑强渡耒水。这时，耒河上的浮桥早已被敌军烧毁。花桥乡地下党员杨天芳和当地党员、革命群众一边打捞出两只预先沉入河底の木船，分三批轮着掩护，于8点左右胜利地渡过耒水，并迅速抢占塔脚下、马阜岭等制高点，随即派出两个侦察班搜索前进。大队指挥部设在托里后背樟树下。两个小时后，侦察员回来报告守敌已经逃窜，我部于10月7日凌晨进入县城，耒阳宣告解放。

11. 活捉反共救国军湘南纵队少将司令霍远鹏。8月，安仁和平解放后，反共救国军湘南纵队少将司令霍远鹏，慌忙把酃县的唐振文支队调往安仁，在酃县边境建立起一道防线，他则龟缩在鵬塘、弯岭、高路一带，妄图依靠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势，负隅顽抗。安仁县工委张英奇随大军参战。当他率部解放关王庙后，便领着大军把霍远鹏盘踞的高路团团围住，继又带着大军从捷径挺进太平圩，楔入敌司令部与直属大队之间，然后迅速找到早已被我策反、答应大军到来时即率部起义的直属大队长和参谋长陈秀龙等，令其火速行动，就这样导演了一幕“瓮中捉鳖的好戏。”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少将纵队司令霍远鹏曾经鼓噪一时，“要以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对付共产党”。当他束手被擒时，还喃喃自语：“直属大队那里去了？为什么不开枪？参谋长那里去了！”当他睁开朦胧的睡眼时，才知道他的司令部已插上了白旗，直属大队长、参谋长都早已撕下了胸前的符号，摘下了国民党的帽徽起义投诚了。

12. 解放郴州城。9月，政治部何大群巡视南区指挥所，传达司令部“相机攻取郴州城，迎接南下大军”的命令。指挥

所遵照司令部的指示，把队伍隐蔽在山河一带深山丛林中，密切注视郴城敌人动态。同时加强对专员何清的策反工作。10月初，大军迅速南下，郴城之敌，惶惶不可终日，准备炸毁铁路沿线桥梁隧道，凭藉堡垒作垂死挣扎。10月6日，根据郴城联络站谷安昌的准确情报，指挥所指挥员肖昶，政委李楚，当机立断，向所属一、三、五大队，政工队，直属中队，发出了向郴城总攻的命令。7日，由李楚、肖昶、肖一平亲率领的突击队，由上白水、出牙石桥、苏仙桥攻入县城。三大队从资兴，五大队从走马岭相继赶到。战至下午1点，经我策动的82师师长何清，实现了不向我开枪的承诺，最先撤走。余敌仓皇向桂阳方向溃逃。我在战地缴获山炮4门，重机枪4挺，新式步枪8支，子弹8000发，吉普车2辆，被服仓库一座（内军衣军被万套），弹药库两座（内弹药千吨），火车头20辆，客货车厢200节，炸药两车厢，胜利解放了郴州城。12日，南区指挥所指挥员肖昶、政委李楚率驻防郴城的我游击队及各行各业代表和居民在鞭炮声中迎接湘南支队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进城，17日又迎来了南下主力136师政委李平及其一个先头团。

13. 攻占桂阳。9月1日，活动于桂阳的第六大队，计划攻打驻在保和、华塘的郴县自卫队，在芦村和八栋新屋间与敌保安7团、10团遭遇展开了一场恶战，政工员欧阳杰牺牲。由于众寡悬殊，我六大队边打边退，引敌深入。保安10团尾随不放，与湘南支队相遇，我配合湘南支队进行反击，战斗十分激烈。敌保安10团被打垮了。是役缴获重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11日，六大队郴桂边中队配合湘南支队攻打桂阳城，并担任先锋。由于南区指挥所率所属部队解放了郴城，从郴城溃退之敌，密集桂阳，经我策反的自卫总队在敌人的压力下，未按原计划实现内应，何苟富、袁常亮等7人牺牲，骆花同等2人被俘，战斗失利。湘南支队司令部于10月11日向郴城撤退。10

月12日，六大队又进逼桂阳城，向驻桂阳城的自卫总队、警察队和坪地山的“桂常新剿匪司令部”发出通牒，命令他们向我游击队投降。敌人在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声威下，不得不于当晚与我第六大队进行谈判，同意我方提出的四项条件，向我投降。我六大队于10月13日入城，宣布桂阳解放。

14.生擒左大凌。10月中旬，八大队长刘纯宜，令一团队在牌楼冲集中，准备前往衡阳军分区，接受整编。忽有反共救国军南岳纵队左大凌部2000余人偷越衡宝公路，窜入我游击根据地，大肆奸淫掳掠。我八大队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主动出击，与敌展开战斗。左部特务大队长吴作林及其副官被我俘获，吴慑于我军威力和救策的感召，表示愿意缴械投诚，当即送来步枪50支，轻机枪3挺。正在这时，我四野旅顺支队突然赶来歼击左部。左部腹背受击，遂趁机从两侧遁逃。待尾追左部的旅顺支队到来时，恰与八大队对峙，几乎发生大误会。经双方弄清情况后，均转头追击，吴作林也主动向左大凌部大声喊话，劝其投诚。敌毫无反应。八大队遂配合旅顺支队向两侧逃跑之敌发起歼击，一起搜山，活捉到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左大凌，及其所属官员50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5.进军衡宝。衡宝战役即将打响，司令部命令第十大队配合主力136师作战，任务是搞好侦察，带好路。10月5日下午，大队长周武夫召开干部会，传达了136师抽调我十大队大部指战员参加战斗的命令。当晚，136师向白崇禧部发起进攻，敌沿耒安公路溃退，我游击队担任响导，沿耒安公路追踪前进。在耒安交界的界头，政委李济农跌伤，游击队由周武夫率领前进。中秋晚上，明月高照，我游击队带领主力追到通水铺附近，接上级命令要迂回包围敌人，十大队对地形不大熟悉，加以林深路隘，地势险要，大队长周武夫率领指战员边问边走，翻山头，绕小路，摸着爬着，始终冲在前面。10月8日中午，

部队追到常宁和衡阳交界的湘江渡口。已经走了两天两夜，步行200多里的指战员，饥饿，劳累，个个感到非常疲乏。正埋锅造饭，又接到强渡湘江的命令，周武夫连饭都顾不上吃，马上到江边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建议主力用强大火力压住敌人，强行渡江。经过猛烈炮击，我军强渡成功，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条件。

通过以上战斗，先后在耒阳、衡阳、安仁、永兴，祁阳、常宁、酃县、资兴、汝城、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等广大地区，配合大军和兄弟部队于7月10日解放资兴。8月18日解放安仁。10月4日解放永兴，7日解放耒阳，同日解放郴县，8日解放衡阳市，13日解放桂阳，22日解放宜章，27日解放酃县。12月1日解放临武，5日解放蓝山。11月后，二、七八、九、十一大队在衡阳军分区，接受整编（十大队部份编入四野136师），一、三、四、五、六、九大队和警卫大队以及部分直属中队在郴县军分区接受整编。至此，“湘游”的历史任务宣告完成。

（湘南游击司令部战史整理小组 整理）

建立湘南游击司令部直属六中队 (建新部队)

蔡新民*

1949年7月中旬，耒（阳）永（兴）安（仁）中心县工委委员伍鸿基同志来到耒衡边境对河坪我家里，口头传达湘南游击司令部和中心县工委的决定。他说：上级决定，由你们支部负责，在边境一带建立一支游击队，保护地下工作人员，配合解放军打击敌人。这支游击队定名“建新部队”，编为司令部直属六中队。组织上决定由你担任政治指导员，全面筹划负责建队工作。但队长尚未确定，你看谁合适？没有等我回答，他接着又说：“廖俊衡怎么样？他是个知识分子……但办事有胆识。”我表示完全同意。他又说：“你作好思想准备，马上会有派令下来。”他走了。

不久，联络员谢朝利同志从司令部带来司令员谷子元、政治部主任何大群签署的派令二张交蔡道沂同志转给我。一张派令任我为指导员，一张派令任廖俊衡为队长。这时，蒋有采同志从湘南游击二大队回来了。他向我说：“我请示过王来苏大队长，回来要在边境沿铁路线建立一支游击队。”我告诉他：

“我们正在筹建‘建新部队’，你就在此协助好了。”我把蒋有采同志留了下来。

7月下旬，特支开会讨论建队事宜。与会的有周发部、蔡

*蔡新民当时系粤赣湘边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直属六中队（建新部队）指导员。

道沂和我。会上决定：把队部成立起来，暂驻楠木坪附近荒山“神仙洞”的古庙里，派农民蔡本发当炊事员，党员廖茂光当联络员。并由蔡道沂同志拿出谷子五石开餐。建队武器，有蒋有采同志从二大队带来的一枚美国无柄手榴弹、一支土造驳壳枪、一支左轮手枪。同时，由蔡道沂、廖俊衡两同志马上赴冠市找“人民自救会”成员、警察大队长沈振华，动员他交出警察大队枪支，由我与廖仁柯、蔡言瑶、蒋有采等同志作好兵员准备。散会以后，大家分头进行工作。此后很快成立了队部，兵员准备工作也做好了，只是蔡道沂、廖俊衡同志去冠市活动沈振华交枪的事不够妥当。

原来冠市警察大队新来一个中队长罗芳华，是衡阳清乡委员会和复兴社的头子廖云章派进去的心腹。他对警察大队长沈振华的行为已有所怀疑，沈受到了他的监视，管不着事，一切兵权掌握在罗芳华手里。沈振华对蔡道沂、廖俊衡同志表示：“你们动手，我决不为难就是了。”我们分析了沈振华的情况，对他不放心，怕他出尔反尔。8月初，我与蔡道沂、周发郁、廖俊衡、蒋有采、廖仁柯等同志，开会讨论对付的办法。具体作法是：撤开沈振华，并加以监视，由廖俊衡同志找人民自救会成员、冠市乡长罗昆，利用罗去说服罗芳华征兵，派一些人打入警察大队，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时值警察大队忙着派捐催款，罗芳华感到兵不够用，加上罗昆的乡长面子，说服了罗芳华，同意招收10个人。于是我们派党员蔡长庚带领农民段人保、谢汉良、梁池、张云芝、廖仁周等九人，拿着罗昆的介绍信去警察大队“报到”。

8月中旬，我收到蔡长庚的情报：“打入警察大队的同志情况良好，盼迅建动手。”收到情报后，一天下午，我穿着一件长衫，扮成小学教师，按照事先约定的地点，去与蔡长庚接头。我从新市对河坪步行25里，来到冠市街上，走进偏僻处的

一家“客来欢茶馆”（这是衡阳区工委属下冠市支部为我们安排的接头地点），在靠墙边的一张桌旁坐下，要了两碗茶，一碗自喝，一碗留待蔡长庚。不一会，蔡长庚身穿“黄狗皮”，大摇大摆进来了，坐下喝茶，低声对我说：“我们已初步取得了信任，可以随便出进，与老兵一样被派出去执勤和站岗放哨。”他告诉我说，大队长沈振华不住在队部，也很少到队部来理事，里里外外是中队长罗芳华摆布。今天派兵出去执勤，留队的敌兵也不多。根据这个情况，我决定装成沈振华的老朋友，以探望沈振华为名，去警察大队把底细摸清楚。于是，我要蔡长庚先回，通知自己的同志，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我随后就到。

我从冠市街出发，走过小石桥，从左侧小路直奔警察大队。大门口是我们派去的梁池同志在站岗。他看到我来了，见四无人，低声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我告诉他不要急，先摸清情况再说。他怕有人发现，马上大声喝道：“你干什么的，站住！”“我是你们大队长的好朋友，特来探望大队长。”为了让蔡长庚知道我来了，我故意放高嗓子回答。蔡长庚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就走出来领我进门。

警察大队的住房，座北朝南，是前后两栋毗连的两间一厅的瓦房。进大门是天井，过天井是正厅，正厅两边是敌兵宿舍。天井右侧有小巷，进小巷是敌军官的住房，蔡长庚低声告诉我：“这是两个分队长（周、朱）和一个特务长住的。”再走进去，对巷是一栋横屋，他又低声告诉我：“这就是中队长罗芳华住的。”

侦察完毕，回到大门口，我装腔作势地向蔡长庚握手告别，大声说：“请转告你们的大队长，改日再来拜访。”“一定转告，不送了，先生慢走！”蔡长庚也大声说。

8月19日，我又打扮成小学教师，来到冠市“客来欢茶

馆”，坐在靠墙的那张桌子旁边喝茶。不一会，蔡长庚来了，他走到桌子旁，刚要入坐，忽然警察大队的特务长鬼头鬼脑，左顾右盼地走进茶馆来了。蔡长庚先招呼：“特务长请坐，由我请客！”“不啰嗦，我坐一会就走。”敌特务长转着贼眼，四处张望。

我边喝茶，边与茶馆老板闲谈，问他生意好不好，一月能挣多少钱，敌特务长瞪了我一眼，看到我若无其事的样子，便阴阳怪气的拍拍蔡长庚的背心说：“老弟，小心点，不要把吃饭的东西弄掉了。”说罢，便走出了茶馆。

蔡长庚见敌特务长走远了，便低声对我说：“这个家伙是顽固派，罗芳华的爪牙。”接着说：“最近敌人的狗鼻子好象嗅到什么，晚上岗哨由一个增加到三个，除了大门口外，又增加了左右两侧门的岗哨。敌特务长还放出空气，说近来有土八路活动，冠市出现行迹可疑的人，要加倍小心。”

我立即赶回神仙洞，召集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上述情况，认为事不宜迟，应该赶快动手。同时制订了具体行动方案，并派人与冠市地下党支部书记罗竹林联系，请他配合行动。

8月21日（即农历7月29日），趁冠市街赶场（有人说冠市不赶圩，但我是根据廖茂光说冠市月逢29赶圩而作出的决定，当天冠市街上也确实行人拥挤），我们29个游击队员，装扮成赶圩的老百姓，分作三起，分别由廖俊衡、廖仁柯、蒋有采三同志带领，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挑着箩筐，把武器藏在身上，分头到了冠市街。我马上找到罗竹林同志，与他商量前去的29个同志白天怎么隐蔽。他说：“我都考虑好了，同志们吃的、住的和安全问题，我都作好了安排……”于是，我介绍事务员廖茂洪和联络员廖茂光与罗竹林认识，让他们一起去安排。我则到预定地点冠市卫生所去停脚。

为了周密筹划行动，在冠市隐蔽了两夜一天。到8月23日夜幕降临时，到处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晚上10点多钟，蔡长庚到冠市卫生所找我，他说：“站岗的已经换班了，左侧站岗的是我们的谢汉良同志，右侧和大门口的岗哨都是敌人，如果这个时候动手，只要胆大心细，是有成功把握的。”他告诉我，警察大队长沈振华因老婆死了，在家办丧事。我马上派人通知罗竹林同志，请他派人监视沈振华的活动。接着，我和廖俊衡、廖仁柯、蒋有采等同志商量决定凌晨一点动手。

我们把队伍分成两队，第一队7人，为先遣队，其中有我和蔡长庚、廖俊衡、廖仁柯、蒋有采等同志。第二队有25人，埋伏在警察大队大门口前面的稻田里，听候行动。如果看到红色手电光，说明接近胜利，就进入警察大队收缴武器；如果看到绿色手电光，说明战斗失利，就掩护同志们撤退。

我们先遣队离开冠市卫生所，摸黑过了小石桥，到达警察大队左侧门的岗哨处。正在站岗的谢汉良同志一听有动静，知道是先遣队来了，便前来接头。我要他去收拾右侧门口敌哨兵的枪。他象夜猫子一样，一晃就不见了。接着由蔡长庚同志引路来到大门口的岗哨处，敌哨兵喊道：“什么人，口令？”蔡长庚从容镇静地回答：“是我，蔡长庚。”另一个哨兵没精打彩地问：“你怎这么晚才回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和蔡长庚一个箭步冲上去，分别用手枪对准敌哨兵的胸口：“不许动！”后面五、六个同志也紧跟上来了。两个敌哨兵看到自己已被一群人包围着，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缴枪，我……我投降！”

这时，谢汉良同志把右侧门的敌哨兵也押过来了。同一个时候，原来打入警察大队的段人保、张云芝、梁池等同志携带7条步枪和一挺机枪赶来。我安排段人保、张云芝等同志用机

枪把守大门口，又叫几个同志控制正厅两边的队兵营房，廖俊衡、蒋有采、廖仁柯等同志去捉中队长罗芳华，我和蔡长庚同志去捉分队长和特务长。

我和蔡长庚走进小巷，来到敌分队长和特务长门口。房门未关，油灯未熄，敌分队长和特务长和衣而卧，呼呼大睡。我一见墙角上放着5条崭新的步枪，一起抱过来，交与把守大门的同志。蔡长庚用手枪狠戳了一下一个敌分队长的脑袋，喊道：“统统起来！”3个敌军官从梦中惊醒，眼看枪口对准自己，吓得魂飞魄散，束手就擒。我们刚把这3个家伙捆好，廖俊衡、廖仁柯、蒋有采等同志把敌中队长罗芳华也捆送来了。敌特务长望望蔡长庚，又望望我，大概想起了在茶馆里那次相遇，深深叹了一口气。我说：“感到后悔了吧！告诉你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是你们要抓的土八路，没有想到吧，现在解放军已渡了长江，挺进湖南，解放了长沙，对垒在湘南地带，势如破竹，解放就在眉睫，你们的天下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今晚，我们是来要枪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把武器交出来。”我回头问敌中队长：“你就是罗芳华吧？”罗芳华低头站着，声音颤抖地说：“噢……不……不是！嗯……嗯……是……是罗芳华，饶我一条狗命吧！我家有六、七十岁的老母，无人奉养。”我对他说：“只要老实交枪，我们可以不杀你。你现在下命令，要你的士兵徒手走出营房集合。”罗芳华口里说：“是，是，是。”就被蒋有采、廖仁柯等同志押到敌兵营房门口，他大声喊道：“弟兄们，快起来，徒手集合！”

这时，埋伏在稻田里的同志，看到红色手电光信号，一齐冲进敌营房，收缴枪支弹药。我们不费一枪一弹，缴获机枪一挺，步枪50多支、手榴弹40多枚，子弹多箱和其他军用物资若干。

大约凌晨3点多钟，我们押着29个俘虏（敌兵除出勤者外，尚有30多人留队，当晚黑暗中逃跑了几人），携带着缴获的武器，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兴奋，急行军开赴预定地点散市徐家祠堂驻扎。

第二天，因同志们一夜辛苦，决定休息一天。29名俘虏经教育后每人发给一块银元的遣散费，放他们走了。

徐家祠堂周围地势平坦，都是些田丘村落，队伍驻扎不便。8月25日队伍移驻徐家祠堂对河丘陵山地，进行了三天的简单整训，清查人数，划队分班，上政治课，学习射击和扔手榴弹。这里林木茂密，只有几户人家。我们不敢骚扰乡亲，没有住处和厨房，就在林子里埋锅造饭，露宿风餐，吃饭没有菜，有了饭和水喝也可以了。

上级指示我们的任务，是要对付驻扎在新市对河坪的白崇禧部某师指挥部，保护地下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这时，队伍只有40多人。经队部研究，决定在开往新市的路上，用“滚雪球”的办法扩大队伍，并由廖仁柯、蒋有采同志组织20多人的宣传队，沿途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

8月27日，我们从散市出发，经福全、双江（现属衡南宝盖乡）、竹林、新塘（现属衡南冠市镇），盐沙塘、沙子塘、楠木（现属衡南九龙乡）等地，于9月2日下午到达芳草洲（现属耒阳肥田乡）驻扎，迂回行军100里，历时7天，一路上所过集市村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群众拥护爱戴，青年踊跃参军，增加兵员约80多人，收集地方零散步枪20多条。

我们驻扎的芳草洲这个地方，位于耒水北岸，东与楠木、新市，西与两河圩、肥田形成一条15里长的曲带，群众基础好。与对河坪敌人师指挥部只一水之隔，可以随时打击敌人。但地势平坦，无高山丛林，不好隐蔽作战和集中活动，此时，

敌人前线失利，防禁甚严，常在新市戒严、巡逻、检查，新市的地下联络站“妇女缝纫社”的女同志受到注意，随时有暴露被抓的危险。

我们根据我敌双方情况，9月4日召开了队部会议，研究行动方案，决定将地下联络站全体成员撤离新市，转移到楠木农村，配合游击活动。游击队的活动方式，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即白天疏散到乡亲们家里，参加生产或休息，晚上集中活动。

会后，我们行动起来了。一开始是破坏敌人的通讯电线，使敌人的神经和耳目失灵。到了晚上，由廖仁柯、蒋有采、张云芝、段人保，女同志蒋乐春、孙锦、段祝英等，带领游击战士渡过耒水，人分组，地划段，把从对河坪到瓦园车站之间敌人的一段通讯线剪断。我们剪断，敌人接上，连接连剪，接接剪剪，反复多次，剪断敌人的电线积4,000多米。吓得敌人不敢到关美、楠木一带割草牧马。特别是我们把敌人在安仁作战俘去的两个解放军战士（一个班长，一个卫生员）从敌师指挥部里救出来后，敌人更加慌张，说：“不要乱跑啦，隔河的土八路厉害啦！”

当我们对敌斗争正酣的时候，解放大军紧逼得敌人已站不住脚，缩头夹尾逃跑起来了。10月6日（农历8月15日）上午，解放军407团进驻新市，我们与407团会师，新市解放了，耒衡边境解放了。

解放军407团驻新市庙岭天主堂，“建新部队”驻天主堂斜对面乡公所，相距咫尺。这天正是中秋节。解放军团参谋长王桂元同志，领着一个战士，热情地为我们送来猪肉，要不是这块肉，我们还没想到当天是中秋节呢！

原来敌人的师指挥部于10月5日晚上就拆断耒水上的浮桥，撤离对河坪，登上距新市对河坪5里远的金钩坳高地，抵

抗解放军的进击。10月6日白天和晚上，敌人在金钩坳上断续地发出重机枪和手榴弹配合的“咔、咔、咔……轰”的声音。

吃过中秋晚餐，407团团部开始研究次日的作战方案。参谋长王桂元同志通知我参加。作战方案中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建新部队配合作战，并且当晚要准备好第二天部队渡耒水的渡河工具。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立即派人赶赴对河坪，通知党小组长蔡言瑶同志组织党员、团员，发动群众，一夜间把渡河工具和撑渡人员安排好了。

10月7日8时开始，部队分批渡过耒水。407团的战士在耒河滩上，分成左、中、右3路，作包围式向金钩坳前进。我们建新部队也分3组配合：队长廖俊衡、副队长陈孝平各带部分战士配合左、右两路，我和廖仁柯、蔡德一配合中路王参谋长的队伍。

我们时快时慢地前进着，沿途群众热情地向解放军战士送茶送水，间或听到敌人的冷枪、冷炮，当我们走到距金钩坳半里路远的长场茶树林里时，忽然部队停止前进，战士们采摘些茶叶树枝做成叶圈戴在头上作掩蔽物，席地而坐，鸦雀无声。

战士们在茶林里坐了约个半钟头，已是中午12点了，还不见团首长发战斗命令。战士们等得发急，听到敌人的枪声，引起战士们的急躁咒骂。王参谋长听到战士们不耐烦的声音，只是微笑。他胸有成竹地拿着望远镜，朝金钩坳看看，再东看看，西看看，似乎预先与东西两路人马约好了什么。这时，我也忍不住了：“怎么还不打呀！”“不要发急，听我的。”王参谋长回答。

时间一秒、一分、一刻地消磨着，已经是一点了，只见王参谋长举起望远镜，象探照灯那样移动侦视着敌方和左右方。他发现左路和右路俯伏前进到了金钩坳山脚下。突然，发一声

喊：“同志们！作好战斗准备！”

战士们被这一声喊，活跃起来了。如卧虎起身，子弹推进枪膛，战士们分作3人小组，组组紧握拳头在表战斗决心，一切准备好了。

冲锋号响了，“冲啊！”战士们发出喊声，端着枪，如龙似虎，争先恐后向金钩坳扑去。

左路坡度小，先冲上山顶，右路坡度大，与中路同时到达山顶。敌人却逃跑了。坳上只有敌人一堆堆的重机枪子弹壳摆在那里。几个战士看了看子弹壳，骂道：“他妈的！逃跑了，唉！”

“追！同志们，向瓦园前进！”这是团首长发出的命令。407团战士马上分成两大队，轮流休息，交替追赶。这时，王参谋长抽调几个战士组成侦察组，我和廖仁柯、蔡德一配合在里面，走在大部队的最前面侦察前进。

金钩坳距瓦园25里路，侦察组穿过春江铺公路时，距瓦园只有5里路了。这时，天已大黑，满天乌云遮住了月亮，朦朦胧胧，要集中眼力，才能看清不远的物体。侦察组的同志有时快跑，有时慢跑，有时卧倒，有时俯伏前进，终于到达了瓦园。没有发现敌人，我们迅速回师，在春江铺遇上大部队，沿马路长排坐着，休息吃饭。

侦察组也休息下来吃饭。王参谋长与其他团领导交换情况后，把自己饭盒里的饭菜分一半给我吃，另外两个解放军同志分给廖仁柯和蔡德一同志吃。看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13个钟头后才吃上饭。

饭后休息一会，开始夜行军。团首长用“建新部队”的“建新”二字做口令，部队沿公路向耒阳方向出发，侦察组还是走在最前面。

侦察组经过灶市，到达余庆圩马路时，天已大亮。太阳从

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来了，光辉照在夜露润湿的征衣上，退去了我们身上的凉意，这时，大部队还没有跟上来，王参谋长向我们打招呼说：“同志们！大部队拉在后面，休息一会吧！想睡就睡一觉。”同志们熬夜熬得眼珠子发红了。一直没有谁感觉倦意。经王参谋长说，睡意就来了。一个战士持枪做警戒，其余的同志横七竖八倒在马路上睡着了。

大约睡了两个多钟头，王参谋长把我们叫醒时，后面大部队赶到了。大家吃早餐，侦察组继续沿马路前进。到了秧田，已是耒阳和常宁交界处。王参谋长用手把我们拦住，说：“前面是常宁县了，我们经常宁转回衡阳市，与衡山方面追敌的同志会了师了。谢谢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代表407团全体指战员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止步吧！”我们与王参谋长及几个解放军战士，虽是3天的共同战斗，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时，恋恋不舍，互相久久地紧握着手，“再见吧！再见吧！同志们！”

我们3人回转路上，到达灶市龙陂时，天已傍晚。在龙陂徐家一个同学徐冠斌家里借宿一宵，10月9日回到新市。这时，我们的队伍因配合407团追敌分散，等待集中后，重新待命。

10月12日，我和蔡道沂同志去郴州请示司令员谷子元同志对建新部队去向的指示。他告诉我们：“部队迅速开往耒阳接受整编，一枪一人不能失散。”于是我们10月15日赶回新市，决定16日开往耒阳，后因故推迟了一天。

10月17日（农历8月26日），部队到达耒阳，待命整编。伍鸿基同志通知我：“送部队到达耒阳后，部队整编工作交队长廖俊衡同志办理，你速回新市，办理地下组织移交。”10月20日，我赶回新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地下党员、团员进行审查，造具名册，分别向衡阳县委、耒阳县委移交关系（耒

阳党团员名册交伍鸿基同志，衡阳党团员名册交蔡道沂同志)。其他地下组织如地下农会停止活动，人民自救会和民主人士联合会解散，妇女缝纫社作为生产组织继续营业。善后工作办完后，我参加衡阳县委与南下同志会师，由党组织安排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湘南人民行动支队”始末记

罗 立 德*

1949年4月间，解放大军已陈兵武汉，革命的洪流漫及荆楚。白色恐怖笼罩衡城，敌我斗争至为激烈。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在《衡山民报》主编副刊，发表过进步文章，与康华楚、胡遐之经常联系，后到衡山县中任教，与刘东安常在一块，对我的思想影响极深。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奉刘东安同志的指示，在康华楚、胡遐之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地下党的策反工作的。具体任务是策动衡山县自卫大队罗介凡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人民行动支队”。

(一)

罗介凡是从广西大学回来的，是当时衡山县长向大藩的外甥。向委他为县自卫队大队长，作为自己的保镖队，也是作为日后反共的一支基本力量。罗虽被向紧紧牵住，但还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曾在桂林参加过学生运动。我与罗既有族谊关系，又是中学同学。他的自卫队当时驻在西门外荷塘别墅。荷塘别墅的主人李天池与我是姑表兄弟，我也常去走动。

记得那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即端午节的第二天，我特地到天池家看望罗介凡。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带着试探的口吻问道：“想不到在这样的 时候，你从广西回来弃文弄武呀！”他以低沉的口气说：“当个这样的兵头有什么意思！是舅舅的情面而不得已。”他嘴角边掠过一丝苦笑。我接着问：“你对当前的形势怎样看？你舅舅他们怎样打算？”他说：“国民

* 罗立德当时系湘南人民行动支队司令员。

党的军队敌不过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成为铁的事实，谁会替国民党卖命！不过我舅舅他们的看法与我不同，他们态度怎样，我也不太清楚。”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介凡，我们是一家人，又是同学，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看清形势，决不能做国民党的送葬品。你要注意，不能因舅舅关系而断送自己的前途。”他感到一筹莫展，有些为难，希望我和他多联系。

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回头我向遐之汇报了。原来遐之等人都已做过介凡的思想工作，对他进行了多次启发和教育。所以我这次去比较得心应手。

与此同时，我们前后多次研究讨论了如何对付和解决“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湖南义勇总队”（简称“青年救国军”），5月间，“青年救国军”为了扩充实力，在衡山扯旗招兵。遐之叫我立即找几个可靠的人打入里面，我即过河找了康凡、康明德、康靖生3个青年农民。他们都是我家的邻居，康凡曾被抓去当壮丁，后来被我军俘虏，遣散回乡。他经常向我谈起解放军如何好及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我曾经向东安同志谈及康凡，来安要我带他进城来会面。一次我把康凡带到东安房里，康凡唱解放区的歌，东安就把谱子和词一一记录。记得当时录了《东方红》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

康凡到“青年救国军”报名当上了兵后，过了三四天，他就到太平洋酒家（胡遐之家），把“青年救国军”的内部组织编制、武器（计有汤姆逊冲锋枪40多支，美式左轮手枪20多支，子弹20多箱，手榴弹5箱）和中队长以上官员的名字，官兵共80多人的情报都告诉了我们。后来又一次紧急通知我们说，“青年救国军”从广东运来一批美式武器，都搁在大队部，尚来拆箱。遐之即引我到谭家祠堂后观察地形，决定让周俊卿等人在半夜时分从后面的矮墙进入取出武器，康凡等在里面接应。并事先约定内外同时行动的暗号。可是，半夜时分周俊卿等人一直来

听到里面发出暗号，我们未敢妄动。第二天才得知丁香芹（反共“青年救国军”的总队长）已将这批武器转移了地方，四周又加派了岗哨，事未成功。

到了6月份，衡山已完全处于白色恐怖中，我与东安同志已很少会晤。我就在华楚、遐之的直接领导下，加紧进行策反活动，6月初，我到荷塘别墅再次与罗介凡交谈。这次我从他的话语中感到他内心紧张，惶惶不安，很想寻求出路，我也由于任务紧迫，直接向他摊了牌。我说：“形势已非常紧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由南京直达武汉，长沙指日可下。程潜、陈明仁与白崇禧发生了尖锐矛盾。白崇禧妄想组织湖南的残余力量作负隅顽抗，这好比鸡蛋碰石头，不值得解放军一击。现在大多数地方武装准备弃暗投明，有些则打算上山为匪。何去何从，你再不能犹疑了。”

介凡听了之后说：“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有目共睹的，我怎么会跟国民党跑？你看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

我于是压低声音：“我和遐之他们是一起的，我来你这里也是华楚、遐之交给我的任务，你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他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请放心，我一定听你们的。”

接着我就询问他自卫队内部的情况。他说：自卫队共有步枪97支，轻机枪3挺，白朗宁手枪6支，左轮手枪2支，手榴弹15箱，子弹40多箱。同时告诉我，有个中队长要换。我当即向他推荐了董有为，他是我们中学时的同学，也曾参加“芜茗文艺社”，很可靠，同时我又和他商谈了如何应付向大藩和县委政府的有关人员。这次我们一直谈到傍晚时分，我临走时，他悄悄地递给我一支小号左轮手枪和50发子弹的子弹带，让我防身。

这已是6月中旬的事，罗介凡的思想已坚定下来，县自卫

队这110多人枪已基本为我们所掌握。华楚、遐之负责的几处工作都做得很扎实。这时衡城显得很空虚，地主豪绅大都隐蔽到乡下，除了国民党的若干顽固派和欧阳俊等几个特务分子外，大都销声匿迹了。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青年救国军的头子丁香芹和江之滨（军统特务）感到困守空城不是好办法，决定将队伍拉出县城，拖到河东。这是康凡送给我的情报，我和华楚、遐之经分析，认定了。江是想窜入河东深山密林，以便流窜，并企图与广西边界敌军结成一伙，于是指示康凡要严密注意动向，及时报告。

果然，6月25日下午，康凡递来一张小纸条，说他们将于明天开赴河东斋家岭。其时，我因事离城。27日才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到“太平洋酒家”找华楚、遐之研究。胡当面向我作四点指示：一、立即率领罗介凡部队过河，尾随“青年救国军”，并设法消灭之。二、保护洙河铁桥，不让“国军”炸掉。三、必要时打出“湖南人民行动支队”番号。四、衡城解放时，将队伍带过河来，维护县城治安。由于当时对一切指示不能作文字记录，以免意外，我就努力把这四点反复牢记在心。

走出“太平洋酒家”，日影已西斜。我径直向西门外荷塘别墅走去。这时，罗介凡在外表上仍与县政府保持正常的联系，除了与几个亲信通了气外，士兵一概不知底细。我除了暗中与他保持联系外，一直未在自卫军里抛头露面。我悄悄地告诉他上级已决定我们把队伍带过河去，任务是尾随“青年救国军”。我也把“青年救国军”暂驻地点告诉了他。他紧急地问我：“什么时候出发？”我说：“就在今晚，事情一说出就不宜迟，恐夜长梦多，走漏风声。”他说：“那么给养呢？”我说：“过了河以后再说，总会有办法的，反正县自卫队是县乡供给。你把田粮处的拨粮条子都带上就行了。”

接着我和他商讨了一些具体措施，立即派人到河边察看动

静，以私人搬运东西为名，雇上三只船等着。又召集全体官兵假称县政府急令自卫队火速过河“围剿”土匪。命令一宣布，即不允许自由走动，命令各中队长亲自带队过河。说到这里，介凡轻轻地提到县政府、警察局，我斩钉截铁地说：“县政府、警察局那边不用通气，不予理睬，只要过了河，他们也只好望洋兴叹。”

夜幕降临，部队19时集合，急行军来到观湘门码头，10点左右顺利地渡过了湘江。紧接着急行10多华里，到达梅冲住宿。第二天迳直朝荆竹寺进发，这是我们预定的目的地。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更重要的是离反共“青年救国军”驻地——斋家岭只有七、八里，便于乘机消灭它。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这下是兵马先到，自然就慌了手脚。于是只得向庙里的两个和尚借粮，可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后勤人员时时告紧，第二天两个和尚找也找不到了。我们就火速派了两三批人下山向附近地主豪绅借粮借款。正在这时，我的弟弟思齐带了一批青年来到山上。他们大都是“群众社”成员。原来“群众社”是由谭振东同志（地下党员）组织的党的外围组织，思齐已是地下党员——这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同一天的下午，罗慎思与彭伟也赶到了荆竹寺。他俩在衡山时与遐之有密切联系。彭伟是地下团员，是遐之叫他们赶来协助工作的，我分外高兴，觉得身边增添了力量。于是我和慎思、彭伟、思齐很自然地集聚在一起，研究部队的一些问题，组成了队伍的领导核心。

所有上山来的青年，革命热情很高。他们在山上打柴煮饭，下山筹粮借款，来回一百多里总是争着干，更重要的是承担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日夜不歇地刻写翻印资料，当时翻印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

《约法八章》等重要文件，向部队和附近农民进行宣传。

我们这时未曾正式打出番号，但大家心里是亮堂堂的。孤驻在深山丛莽之中，生活虽苦，但由于革命激情的激荡，队伍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紧张欢乐的气氛。

(二)

在部队情绪安定，斗志昂扬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冒难涉险去消灭青年救国军。

8月9日，我们决定首先派罗铨经与已经打入青年救国军的康凡联系。“青年救国军”驻斋家岭，离我们的驻地荆竹寺约8华里。铨经化装贫苦农民，以亲戚的名义去给康凡报信。假称康的父亲病危，借以探听丁香芹部的情况，并通知康凡，准备消灭“青年救国军”，要他组织可靠的人作内应，从康凡处得到情报：7日上午，丁香芹、江之滨曾召集全体官兵训话时提到：“就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颗定时炸弹，我们不挖掉它行吗？”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的实力很快就会大大地扩充。”训话后，丁香芹即坐着轿子，带领10多个警卫人员下山到县城开会去了。我们针对这一情报作了分析，认为丁到县城一是开会，二是想纠集一些游杂武装，以便扩充自己的实力，然后吃掉我们。据此我们作出决定，先下手为强，必须在丁回来之前发动进攻，一举歼灭“青年救国军”。

第二天，我叫铨经再与康凡接头，进一步探听虚实。铨经回来告诉我情况没变动，丁香芹尚未回，康凡已组织了10来个可靠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当天晚上，我就在荆竹寺后栋楼上正中的佛堂里召开干部会议（包括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和所有青年知识分子），我指出：“机不可失！我们如果不先下手，是有可能成为他们刀俎下的肉，因此决定在今晚下半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青年救国军”。究竟如何打法，采取怎样

的进攻策略，请大家讨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拉”与“打”，双管齐下。“打”，就是由彭伟、罗介凡带领队伍，趁天未亮，包围丁部，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对付该总队实力较强的罗力平部，配备两挺机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潜伏在该总队部的后山窝，配备一挺机枪封锁前面的出口。“拉”，就是我与慎思利用家族叔侄关系去“看望”罗力平，争取他起义投诚。我在会上严肃地说：“罗力平与我关系甚密，可能被说服。但他与丁是连襟关系，与江之滨是要好的朋友，很可能死拼到底。”最后我与彭伟、罗介凡约定：我们进入罗力平部后，如果里面发出枪声，那就意味着谈判破裂，应集中火力猛攻，不要顾及我们，争取全部彻底消灭他们。

散会时，已1点半钟，我安排彭伟、介凡去巡查岗哨，自己作了一些战斗的准备。3点时分，介凡集合了部队，进行紧急战斗动员，随即摸黑出发了。我临走时招呼思齐，要他负责家里的事，坐镇把守，如果听到密集的枪声，还需要组织人力把弹药运送上来。

我和慎思身着便服，没有带任何武器，走到“青年救国军”的驻地——斋家岭的山卡子时，天刚微明。我们的队伍已潜伏好了。我就径直朝山卡子的岗哨走去。这里四周寂静，有双层岗哨，警戒森严，我们老远就有意识地咳嗽，哨兵听了，喊我们站住。一个持枪士兵对着我们，一个走过来盘问，我说是罗力平的堂叔，特来看望他。哨兵仔细打量我们，见是书生模样，又无武器，就领我们往前走。在这个高峻的山谷里，只有两栋大屋，山谷的最深处是一栋大庙宇，大庙下边，靠左有一栋大瓦屋，即大队部。两栋相距约200来米。哨兵领我们到大队部，屋里的士兵尚未起床，但已有人走动了。我们进入罗力平住室时，他刚起床。对于我的突然早来，他感到惊诧，但还是装作镇定说：“立德叔，怎么这样早来了？”

“早上凉快，有点事去，顺路进进屋。”我一边回答，一边坐到靠窗口的空床上。门是敞开着的，这时康凡握着冲锋枪站在门外，我暗暗地用眼睛向他打了下招呼，窗口已有来回走动的持枪士兵，这大概是康凡布置的。罗力平靠床边站着，对我们有些猜疑。回头看看自己的床铺，想拿什么，罗慎思眼明手快，两步窜到他的后边把他枕边的一支左轮和床头的两支冲锋枪提了过来，放在桌上，罗力平马上变了脸色，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看既已开了锣，就只得亮相了。我站起来指着桌上的枪支对罗力平说：“这些东西搁在这里，你不用，我也不用，我趁这样的时候到你这里来，当然是因为有一点不平常的事。看来，你们把队伍从衡山城拖到这深山里来，大概是想当山大王吧？”

罗力平胀红着脸说：“不要谈这些吧！我知道你们是要干什么，你们不要来那一套。我眼着丁香芹是没有错的。我们的武器全是美式的。”慎思紧插道：“你想和我们打吗？”罗力平横着脸说：“要打就打，莫怪我不认族家。”

这时，康凡在门口低声报道：“总队部左参谋长下山来了。”

我立即叫康凡派人严密监视，顺手拿起了桌上的左轮。

顿时，屋子里空气异常紧张，象摆了一颗定时炸弹，我紧握手枪，咬着牙对罗力平说：“你想打么？你看看你的门口和窗下是谁的人，你指挥得动么？”

罗力平睁大着眼，大声喊：“康凡！”康凡没有应他。他火了，一时不知所措。我紧接着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早已派人打入你们内部了。”说着，康凡紧张地报道：“左参谋长朝这屋走来了。”我命令道：“把他押起来。”只听到堂屋里几句争吵声，接着就是关门声，把左参谋长押起来了。

罗力平呆了，想冲出房，被慎思一把拦住。慎思对他说：你今日要下手，我们出不去，你也活不了。我们这次来，说实在的，还是为了争取你走光明的路。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得丢盔弃甲，你这几十条枪能做什么？”

罗力平颓丧地坐下来。

我接着说：“力平，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长沙已和平解放，湖南许多县纷纷响应，白崇禧这点残部已逃之夭夭了。你还期待什么？这是最后的一刻，我劝你弃暗投明，跟着我们走解放的路。”

罗力平若有所思地听着我们讲话，又不时看看门口窗口，眼看他们的参谋长竟一下子被我们关起来了，不知道他的队伍里究竟打入了多少共产党，他带着软弱的声音对我说：“我怎对得起丁香芹呀？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说：“现在不是什么对得起或对不起的问题，而是你朝死路走还是朝活路走的问题，一切都已布置好了，你同意，还有你的一份功劳；你不同意，我们会用武力解决。你该立即作出决定。”

罗力平听了这些话，霍地站起来带着恳求的语气对我说：“立德叔，好吧！我跟你们走！但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一是不杀丁香芹和江之滨，二是不拆散我手下的队伍。”

我和慎思考虑了一下，为了迅速顺利地解决“青年救国军”，当时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我要他下命令，叫士兵都投诚，把武器全部缴上来，他接受了。

慎思和力平一同呆在屋里，守住武器，稳定人员。我与康凡就带领自己的队伍直朝山上总队部冲去。

原来我们在解决罗力平部时，总队部的那些家伙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当我们冲到离总队部70来米的地方时，几个穿着美式军装的家伙在阶梯边，发觉这突然的袭击，火速窜了进去，

然后从窗眼里向我们射击，开始是单发的手枪射击声，我叫同志们伏倒，接着是两排密集的冲锋枪扫射。我趁他们换梭子的机会，一跃而起，高喊：“缴枪不杀，我们解放军是宽大俘虏的！”我们勇猛地冲了上去。他们被这突然的四面八方的射击吓呆了，屋里的枪声停止了，我们冲到门口，一些人战兢兢地举起了双手，口里喃喃地连喊：“投降，投降。”我们走上前去缴了他们的武器。我用枪口顶住一个家伙，急迫地问：“你们的头头在哪里？”那家伙忙指着后山上说：“跑到后山上去了。”我立即命令康凡带几个人朝后山上追去。我和几个战士押着这一群俘虏来到罗力平大队部前面的草坪里，刚歇口气，康凡押着江之滨来了。江之滨这个老牌军统特务，这时丧魂落魄，头发蓬松着，上衣和裤子都被荆棘挂破了，一只脚穿着个布鞋，另一只布鞋却提在手里，嘴里告饶哀求。

这时“青年救国军”全部人马都集聚在草坪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只有丁香芹和随带的10多个警卫暂时成了漏网之鱼。我走到前面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宽大俘虏的。希望你们改过自新，参加我们的队伍。如果不愿当解放军想回老家，我们也不勉强……”当时有几个广东籍的人，说是被骗来的，迫切要求回家。我们也就当场释放了。

队伍顶着正午炽烈的太阳回到了荆竹寺。我把江之滨和那个参谋长押在楼上佛堂侧边的一间小屋里。这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江之滨。干部队伍中议论纷纷，总括起来是三种意见：一是立即处决；二是力主释放并指出我有言在先；三是关押着，日后请示或交上级处理。我感到非常困惑，难作决断。我考虑更多的是怕队伍出乱子。罗力平虽说过来了，但他的人马暂时还归他掌握，那里面成员复杂，有青红帮，有军统特务。他力保江之滨，我们如果立即杀了江，他可能一怒反戈，或其他特务分子从中捣乱，这对于我们这支尚未完全稳定的武装力

量，势必带来某些不利。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把江之滨和那个参谋长释放了。

部队接着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是组织编制和人员的安排。我召开了一系列的大小会议，通过部队主要成员的酝酿、讨论，大家临时推选我为支队司令员，彭伟任政委，罗慎思任参谋长，罗思齐任政治部副主任。第二天晚上，我在楼上佛堂召开了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我宣布了衡山地下党组织交给我们的四项任务，宣布了番号名称及领导成员，同时宣布了任命罗介凡为第一大队长，罗力平为第二大队长以及各中队长、指导员的名单。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官兵集聚在红旗下，举行支队成立大会。我在大会上宣布了支队番号、支队的编制和干部名单以及支队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这时我们共有机枪3挺，卡宾枪20多支，冲锋枪40多支，步枪120多支，各种手枪20多支，手榴弹20米箱），着重阐明了革命队伍的性质、组织纪律、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宣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逐条作了详细解释。同志们听了都觉得新鲜，感到振奋。

（三）

大会过后，部队进行了两三天的整训。就在这时，原来参谋部派出与河东地下党联系的同志折了回来，说是国民党军队封锁了河岸，过不了河。极着彭伟同志自告奋勇，决计亲自去联系，但下山走了二、三十里也因国民党军溃部四处抓人而折回来了。于是我决定带领队伍下山完成党交给我的第二大任务，

“保护涑河铁桥”。途中我得知涑河铁桥已被国民党军炸毁，我懊悔自己进军迟了一着。临时改变行军方向，遵照地下党交给的第三大任务，“保护衡山城治安”，带领部队向衡山县城靠拢。翌日下午，部队来到珍珠堆，即听说解放军前锋部队已到达石

湾，我就带领康凡前去接头。

经与 46 军 137 师肖师长、师政治部主任 赵靖远同志洽谈，决定动员所有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战士都编入警卫营。

8 月 22 号，137 师师部正式召开了欢迎大会。知识青年都编入师部学生队，罗力平带领全部战士（包括武器）编入师警卫营，我被任命为学生队队长。

在我们参军的第三天，东安同志与遐之同志都先后赶到了富塘，特地向 137 师师党委说明湘南人民行动支队是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并将我与彭伟、罗慎思、罗思齐、罗力平等同志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

东安同志走后的第三天，我们的队伍出发了，我们荷枪实弹，跟随着从山海关外一路打过来的老战士朝着祖国的南海边挺进，挺进！

湘中一支队五团第一大队的建立

毛际寿*

桥头河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之时，富田桥地区的人民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暴。

受中共老党员蒋牧良、刘石渠、朱昌模等培育过的几个学生，在湘乡地下党领导下的一群20岁上下的革命青年龙楚玉、毛际寿、黄裔祥、李健君、刘佩秋、李斗秋等，满怀革命激情，以敦行乡中心学校为据点，在富田桥地区的群众中，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思想发动工作，他们秘密串连，传阅革命书刊，编写剧目，组织排练，巡回演出了“马保长”、“从黑夜到天明”等歌舞和哑剧，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唤起群众觉醒，并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教唱革命歌曲，传播革命思想，一时富田桥地区“团结就是力量”、“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的歌声，有如春风化雨，点点滴滴注入劳动人民的心田，为一大队的建立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49年初春，桥头河的暴动部队打出了“毛泽东五纵队”的旗帜，震慑了驻扎在敦行乡中心学校隔壁的国民党富田桥警察所，他们增加岗哨，日夜巡逻，大大加强防卫，并对中心学校的龙楚玉、毛际寿等非常注意，这样就加速了这群革命青年武装暴动的步伐。但他们赤手空拳，如果在富田桥警察所的鼻子底下夺取枪支，立即就会遭到几十个警察的镇压。于是决定避开富田桥警察所的视线，先由刘佩秋等到锦石乡去夺取地主几支手枪武装自己，之后再行大搞。可是在锦石乡的夺枪

* 毛际寿当时系湘中一支队五团直属机炮连指导员。

行动，也立刻引起嗅觉灵敏的富田桥警察所的反应，警察所长亲自来到中心学校，盘问了龙楚玉和毛际寿。当时，龙楚玉带着老作家蒋牧良的女儿蒋北雁在身边，警方对龙楚玉的行动就监视得更加严密，并以手枪试探她会不会用枪。

这时，桥头河的暴动部队在田心街遭到敌军夜袭，三个大队皆被冲散，肖汉人等一批首义志士壮烈牺牲。顿时，乌云压顶，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安、宁、邵边区，在富田桥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龙楚玉、毛际寿等革命青年，处境更为险恶。此时除地下党的区工委书记曾路中加强了领导与具体帮助之外，中共湘乡县工委的主要领导成员陈明也来到富田桥中心学校进行指导并发展了党员，这时已是1949年的3月。

由于敌人对桥头河暴动部队残酷镇压，防卫相应加强，对革命青年行动严密监视。根据当时这种敌我斗争形势，龙楚玉、毛际寿等就改变了斗争策略，在地下党区工委书记曾路中的支持与领导下，策划了这样一种夺取敌人武器弹药的办法和形式，即由地下党的统战对象，当时担任敦行乡乡民代表主席的龙满苍出面收缴敌人枪支，诈称：“共产党的游击队到处缴枪、要粮，我是乡民代表主席，应该维护地方治安，我带过兵，打过仗，我打算出面组织敦行乡自卫队，与富田桥警察所联合起来维护我敦行乡的治安。你们的枪支藏在家里势必被共产党缴去，现在都借给自卫队，由乡公所正式出具借据，天下太平之后，‘完璧归赵’。”这个办法很灵，连老奸巨猾的乡长李瑞仁也相信了，有枪的地主们也表赞同。这样就只凭一席话，未流一滴血，一下就收缴了地主的20多支快慢机、驳壳枪，连同乡公所步枪，共获得40多条长短枪，于是一支拥有40多人枪的革命武装，在湘乡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于1949年3月在富田桥秘密地组成了。

中共湘中地工委和湘乡县工委派陈明进入游击队任政委

员，曾路中任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4月初，他们将桥头河的暴动部队和富田桥的起义武装合编建立为“湘安支队”，富田桥的武装编为湘安支队八大队，任命龙满苍为大队长。1949年5月又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改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支队五团第一大队。

这个大队是在湘乡县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是在与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浴血战斗中发展成长的，最后拥有300多人枪，成为五团三大主力之一，它在五团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歼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消灭尹立言的“西南民主联军”和粉碎白崇禧的六个师、两个旅的“大围剿”，为湖南的胜利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个大队在解放后又经过多次整编，1950年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428团，参加了抗美援朝。

湘中地下党武装斗争的一个侧面

张生力*

湘乡县工委领导的“湘(乡)、安(化)支队”建立于1949年3月,5月根据省工委的决定,改编为“湘中第一支队第五团”。从1949年4月到10月,我在这支部队中搞政治工作,曾任支队宣教处长及五团政治处主任等职。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段时间写了5本“军中日记”,在“文革”中散失了一本。现将1949年6月11日至10月6日的日记,以时间先后为序归纳为8个问题,摘抄如下,以供史学工作者和其他同志参考(括号内的话是摘抄时作的适当说明)。

- 一、歼灭尹立言的“西南民主联军”前后(6月11日至27日);
- 二、反白崇禧“围剿”的22天(7月2日至24日);
- 三、截击潭宝路敌军(7月25日至8月1日);
- 四、迎接解放军进入湘乡(8月2日至11日);
- 五、建立湘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8月12日至18日);
- 六、清乡、借粮、搜索残敌(8月21日至9月5日);
- 七、南下干部同地下党干部会师(9月7日);
- 八、三、五两团在宁乡整训(9月9日至10月6日)。

一、歼灭尹立言的“西南民主联军”前后

尹立言原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旧部,曾任国民党部队的旅长、纵队司令、新八军军长。1949年初,他勾结湖西土匪和帮会头子石美豪、陈策勋等,组成“西南民主联军”,自任总司令,号称三个军和一个独立师,实际人数不到3000,枪

* 张生力当时系湘中第一支队五团政治处主任。

枝只有1500多。1949年4月，从武冈出发，经过溆浦、沅陵、辰溪、安江、绥宁、城步、东安、零陵、祁阳、衡阳、衡山等县，于6月中旬到达娄底，勾结冒充地下党武装的蒋麒生部，企图吃掉我“湘中第一支队”，称霸湘中地区。6月24日，湘中第一支队集中一、二、三、五团共5000多人枪，聚歼尹立言的“西南民主联军”于温汤。四个团共俘敌官兵1200余人（其中有敌副总司令兼补给司令龙锡金、龙耀湘），缴获长短枪1100余枝，迫击炮四门，骡马30多匹，救出被掳掠的妇女10余人。尹立言仅率200余人枪趁黑夜大雨逃脱。他逃到湘乡壶天后，蒋麒生为他设宴“压惊”。席间，“尹落壳”痛哭失声。我在6月11日到27日的“军中日记”中记述了尹部被歼前后的部分史实。

1949年6月11日

上午，经委会（经济委员会）在政治部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决定即应办理的工作。我负责拟布告，下午交卷。晚饭后，据报有敌情。有的说蒋麒生部已到壶天附近，有的说尹立言部队数千人已到娄底。司令部通知所属各单位戒备，是晚平安度过。宣教处（在坪底之役中）遗失的木箱，已于本日找回。在坪底被（蒋麒生部）俘去的曾指导员草庭已被释放。

6月14日

聂昭良（五团司令员）与陈明（政委）赴宁乡，出席五县会议，政委由我暂代。中午，我同司令部刘总务员赴壶天，拟与尹部正式谈判。到惜阴堂后，道听途说的消息很多，我遂中止赴尹部。是晚在参谋处开会，决定重新部署，严密戒备。晚4时，我部改为纵深部署，团部开至烟波冲。

6月15日

我同参谋处成昆处长同赴姜（亚勋）部后方司令部，见了欧阳高参。此人很有风趣，为一旧式军人。当时有民众代表3人到姜部，声言代表尹部，要我们与尹部谈判。当即约定，联合指挥部、尹部及民众代表各4人，在朱杉坳谈判。我同成处长及周干事前往。到达目的地时，仅见4个民众代表。据说：尹部已在开动，路线经姜部防区。又说：尹已收编蒋麒生部，蒋部现距本部不远。我们3个代表马上各回原部，并于本日中午开赴安化，晚间到达插花庙。

6月17日

早饭后，据报又有敌情，各大队登山，临时指挥所仍在原地。我同成处长喝了一点酒，准备作战（司令员及政委尚未回部）。后来俘获尹部独立第一师一个小勤务兵，他17岁，是城步人。问他尹部情况，他都不懂。尹部派两个代表（唐再励和谢剑）来我部，谈了很久，他们不承认收编蒋麒生，并解释误会，希与我部合作。午饭后，我同成处长到尹部见了尹，谈1小时，他承认收编了蒋部，但愿撤回原委任状（尹曾委任蒋麒生为师长。）。他发誓说：“我如果要了蒋部的一兵一枪，我不是人。”我们在途中见了他的第一师，大约只有步枪400支，轻机枪4挺、汤姆逊4支，重机枪一挺，人数约600，其中有太太、轿伕。我回部后，写了一封信给聂昭良及陈明同志，希望多在插花庙停留一天，以便派人到龙田出积谷，解决发饷问题，还谈了见尹的情况。

6月20日

上午在惜阴堂举行部务会议，我作报告。会议内容：①团结五县军事力量。②党对当前军事形势的分析。③党对当前工

作的指示。④党对干部教育的决定。⑤本部的编制（由支队政治部改为团政治处）。

6月21日

上午举行干部会议，检讨军风纪问题、支队司令部政委章文（官健平）及司令员姜亚勋于中午到本团。在干部会议中，章文讲了话。散会后，本团全体集合在河边，听姜亚勋、章文两同志讲话。聂团长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

6月22日

湘中第一支队开始向尹部攻击。晨8时，我部由惜阴堂出发。中午，在万家坪午餐。晚宿黄家岩。此地是安化、湘乡两县的边境，距茹草约5里。

6月23日

我到一大队兼任教导员，开始实际工作。上午，首先在大队部开谈话会，会上进行战斗动员，配合一、二、三团歼灭尹立言的“西南民主联军”。

6月24日

23日晚由黄家岩出发，天黑不见掌，路泞不易行。大雨倾盆，衣服湿透。全团在山上休息了两个小时，打着雨伞在泥草地睡觉。直到侦察员回报了情况，才摸黑下山。24日晨，我团到达红旗坳，截击尹立言部。阵地喊话：尹部官兵赶快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不打士兵！不搜腰包！

6月25日

24日晚11时，我和龙大队长满苍率领一大队由红旗坳出发，

到湘乡小碧桥截击敌人。我们的尖兵到达小碧桥时，发现敌人许多电光，尖兵退了下来，其他人也退了下来。在后面的人不明情况，乱跑到田里。龙大队长指挥大家冲上去，开了几十枪，敌人四逃。我队马上用机枪封锁桥头。肖大队附执中活捉了一个敌人，得了一条枪。我同一个战斗员把俘虏及枪解到司令部，请司令员立即增援。25日清晨，增援的两个大队及警卫队跑步前进，三个大队登山，与敌人作战。在这次战斗中，五团活捉了敌军250余人，内有营长2人（谭凤鸣、肖鸿钧），营附一人。五团共缴获步枪367支，轻机枪11挺，重机枪2挺，手枪4支，汤姆逊13支，花机枪2支，卡宾枪2支，马3匹，炮一门。

俘虏（谭凤鸣、肖鸿钧）口供：本年阴历2月25日左右从武冈出发，经溆浦、沅陵、辰溪、安江、绥宁、城步、新宁、东安、零陵、祁阳、衡阳、衡山，来到湘乡、安化，路上未停过，沿途抢谷物。第九军风纪最坏，官兵大都湘西圈子里的。这次最先突围的是警卫团及独立第一师第二团，突围时间是6月24日下午2时。第一团及25师一部分，是在6月24日下午6时40分突围的（俘虏被审问后，均已释放）。

6月26日

本部在茹草举行战斗检讨会。支队司令部要我团上交小炮及马匹，我团照办了。

6月27日

上午，我在一大队第二中队举行评功会。评功标准如下：①作战最勇敢，立功最大。②执行任务最力。③缴获最多。④被迫不后退。⑤确能遵守纪律。根据以上标准，第二中队选出9个战斗英雄，一个纪律模范。

二、反白崇禧“围剿”的22天

1949年6月底，白崇禧命令陈明仁第一兵团6个师“围剿”湘中第一支队。进攻宁乡第一、第二团的是敌87师、88师、23师，进攻安化第三团和湘乡第五团的是敌19师、63师、307师。支队司令部的反“围剿”方针是：“保存自己，牵制敌人”，“相机作战”，“跳出敌人包围圈”。7月下旬，陈明仁准备起义，“围剿”部队才陆续撤退。

7月2日

本团由十字铺移至路管宿营，晚得情报，白崇禧调集6个师向我第一支队包围推进。本晚11时全团出发，虽有星光，但山路难走，许多人跌倒了，仍走了一晚。

7月3日

上午，在周家湾早餐，人均极疲乏。中午在燕子岩休息。据说：杨家滩、明镜井、桥头河均有敌人。下午，开至杨柳井，战斗员情绪较坏。因为昨夜走了一晚，今中午又未吃午饭，大家饿极了，渴极了，倦极了。三大队在路上停了很久，在杨柳井吃了饭，东睡一个，西睡一个，既不集中，也不放哨守卫，散漫得很。严梓成大队长不愿干了，聂司令员也气得很。龙大队长（一大队）抱病率队行进，声嘶力竭。晚宿安化界头口王家，此地距温汤仅2里，距桥头河约8里。第二大队在杨家滩捉到了尹立言的1个人，搜出了尹立言太太的信，信中说：唐生智、肖作霖与尹有关系。另一封信是湖南省政府一个人写的，认为尹是民主促进社的力量。

7月4日

上午9时，聂司令员在杨柳井集合全团讲话，批评昨晚行军

的缺点：一是干部不健全，首先是军需处干部不健全，在路管没有遵照命令办足3天的粮食。二是家乡观念太重，三大队有一个分队急想回家，把枪交给分队长，分队长急得哭，大队附也急得哭，经查明是个姓刘的在鼓动风潮。三是反革命分子在本部队活动。四是乱传命令，行军打手电，谈话，择路走。上午行军至坪底，龙振华同志到他被俘的杂货店里，指责店主向敌人告密，致使他们3人（他及肖绊池、彭月恒）被俘。龙大队长也痛斥了店主。我部经过坪底时，路旁居民均招待茶水。晚宿新庄，司令部开了一次扩大干部会，决定：（1）筹足三天粮食。（2）健全情报网。（3）取消各单位的箩筐，寄存大件行李及破枪。（4）减少各单位徒手，做到一好枪一好兵。（5）以大队为单位打游击。

7月5日

上午，本部在新庄处理缴获物，并令各中队成立锄奸队。下午，看见蒋麟生的一张反动布告，原文如下：“查姜逆勋、聂昭良两匪部盘踞湘（乡）、安（化）、宁（乡）边区一带，奸掠烧杀，无所不为，受害民众，十室十空。弗独使萑苻不靖，造成地境恐怖，尤复野心勃勃，图谋不轨。本军为除反革命势力，暨为我湘、安、宁等县起见，现已准备会师，向该两匪盘踞及流窜地区实施围剿。即前流窜湘乡县清溪、安上等乡之聂匪第七大队长曾经叛部，经本部围剿，业已全部缴械并将该大队长曾经叛予以枪毙。凡我当地民众都应本军民合作之旨，协助本军进剿，毋使小丑跳梁，除恶务尽……凡属我各地青年曾经参加姜聂两匪部工作者，准其归来自新，携械投诚者，当予重赏。倘仍顽梗彷徨，执迷不醒，定即拘拿其家属，从严惩处不贷，切切此布。司令员蒋麟生。6月25日公布。”

（这个反动布告贴出的时间，既是尹立言的“西南民主联

军”被我第一支队歼灭之后，又是白崇禧调集6个正规师“围剿”我第一支队之时，由此可见蒋麟生与白崇禧配合得很好。

7月6日

本日晨，我团开往田平地，行至山下，忽接支队司令部命令，说流沙河有敌军，要我部到壶天一带活动。我团遂遵令前进，在万家坪早餐，在进塘午餐。下午4时，全团在进塘附近集合，聂司令员讲话，约法三章：（1）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2）晚上行军不准打手电，不准讲话，不准掉队。（3）不准请假回家（指战员都是本地人）。本日行军路线：渡头塘——→魁门头——→大屋场。今晚我团在渡头塘休息时，距敌军哨兵仅半里地（全团强行军通过时，可见敌哨兵在灯光中移动，敌我均未对射）。

7月7日

早晨，我到司令部去联系，部内的人大都没醒。聂司令员早晨从家到部内时，见沿途有失去联络及睡着的战士，便大声叫他们起来，要他们归队。昨晚行军最好的是一大队，最糟得是直属中队。今天止午附近无敌军，司令员下令加强警戒，我亦回一大队睡觉。中午醒来，再去司令部联系，忽接报告，说敌军到明镜井来了，距本团驻地仅三、四里，司令部各单位紧急集合。各部分的人大都吃过午饭，只有第一大队还没吃，饭煮好了，顾不上吃，闻讯即走，各部在火烧坳集中后，由小路向杨家滩前进。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有一班军士在放人哨，未退出，当晚仍失去联络。第二大队担任后卫，他们听见敌军在火烧坳附近的轻机枪声。第一中队第三分队队长李洪及战士邵建国、周南方被俘，失枪3支，运输班长叛入白崇禧军当情报员。我们在路上听说杨家滩有放军，于是改变计划，在太师湾廖家吃晚饭。饭后，本团在月色中向邵阳快溪前进。月光很好，田野沉

寂，但闻村犬狂吠声，本晚行军秩序较好，无人讲话，无人掉队。但因连日行军，大家均极疲倦。到达大冲彭家休息时，战斗员坐下来就睡着了。

7月8日

清晨，本团未吃早饭，即向快溪开拔。快溪靠近龙山，距邵阳县城120里，距杨家滩20里，是毛炳文的故乡，居民多穷苦，附近多土匪。龙山大王成仁和拥有人枪数百，有七、八千担租，四、五十座山，又在开铤矿，家住太子庙，距快溪40里。邓介松在龙山设立指挥所，走中间路线，我团已派人去与他联系。目前敌情不严重。

7月9日

清晨，本团各级干部在毛氏支祠开会，讨论发饷问题，由司令员、政委、教导员、供给处长、经委会主任组成发饷委员会，决定采取政治方式，向敦行、崇信等乡的地富大户筹借，限三五天内完成。会后，我和曾路中同志在毛氏支祠举行民众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曾同志说明本党政策及解放军的任务，我要求民众协助本军，了解本军。遂即成立农会及村政府，选举村政府主席与农会正副主席。农民有地区观念，对人选颇多争执，但当选者又有些不愿干，当时闹得很厉害。

7月10日

早晨8时，本团由快溪开赴漣里，在秀溪前面集合讲话。聂司令说：我们现在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周围现无敌军，肖海波逃到蓝田附近，潭宝路上非常空虚，白崇禧军非常害怕解放军。昨天我军捉到了白崇禧部30多人，都是落伍部队。本团的动摇分子在这次反“围剿”中落伍了，走散了，政治处只剩下

13个人。现在按照约法三章来检讨一下，觉得都有进步。以后，不准私人向老百姓借东西，要由大队或中队去借，要有正式借据。第二大队已派一个中队到杨家滩去接600多套军服，这些军服是蒋麟生强迫杨家滩老百姓做的，现在杨家滩的人答应送给本团。傍晚，二大队到杨家滩去的一个中队回来了，未接到军服。今晚接到情报，说有白军约2000人在向我军驻地急进中，现距我军约十余里。本团于今晚11时出发，走了29里，在富田桥宿营，吃饭时天已大亮。

7月12日

一大队一中队三分队在天堂万家冲游击，蒋麟生部第一支队百余人不放一枪即四散，我队缴获步枪1支，手榴弹2个，子弹55发。

7月13日

早晨，我第一大队由杨梅子坳开至富田桥燕贻堂。上午，我部捉到了蒋麟生部的两个情报员。下午，蒋麟生的代表李益坚（秘书长）应曾路中之约，与本团直属中队指导员毛际寿同到大队部。据毛际寿同志报告，蒋麟生的参谋处长李芳人说，蒋部现在不打姜部，不打聂部，也不打国军，不宰猪牛，哪个人咬他们一口，他们就要打。戴剑虹在蒋部冒充党员，蒋曾给了他40多块光洋。他们说不能受姜部的领导，也不能受聂部的领导，他们要保存原有的番号。即使整编，决不能编为一个团。他们认为目前是军事第一，只要有军事力量，不患无政治路线。李益坚不承认错误，态度傲慢，是个无能之徒，面目亦可憎。饭后，他即返蒋部。晚上，我部又捉到蒋部两个侦探，搜出蒋麟生给李芳人的信，要李芳人与我部联系，但应戒备，以防意外。本大队原拟解决蒋的第一支队，本晚因接聂司令员给蒋的

信,要求彼此合作,本大队的计划遂作罢。另据报告,杨家滩有白军2营,本队即于晚9时开到龙家坊宿营。

7月15日

本大队由龙家坊开至太阶堂,将要到达该地时,听说该地的蒋麟生部杀老百姓的猪,我队当即搜索前进。

7月16日

本大队接到几方面的报告,说白军六、七百人分三路进攻田心街本团,团部登了山,未放一枪,敌军则大放其枪炮,黄昏时,退回杨家滩去了。

7月17日

下午2时,二、三大队突袭常丰乡赛田警察第九中队,缴敌枪20余支,毙敌傅分队长,敌伤1人。

7月18日

傍晚,曾路中同志由家里来大队部,他说:63师汤季楠师长是程潜的人,有意同解放军靠拢,但缺乏决心。最近,他奉令来清乡,据说是“等因奉此”。该师希望本团同他们联系。他们来清乡时,本团只要离开一下就行了。

7月19日

上午,捉到了一个侦探,是国民党71军警卫营的,我们审问后释放了。下午捉到了一个军官,名叫谢厚景,安化蓝田人,30多岁,中央军校第二分校17期毕业,在国民党206师当参谋。去年3月15日在洛阳被俘,在河北受训10个月,释放回家,今年3月到衡阳第五编练处工作,今天早晨由永丰来到灰木坳,

身上带有一包金子和12块光洋，本队都发还给他了。他是坐轿子来的，我们的战士不让他坐轿子。

7月20日

拂晓，本队开至儒家冲，司令部住在刘镛家里。下午，党总支委员会在司令部开会，到会委员有聂昭良（军事委员）、陈明（书记）、曾路中（锄奸委员）、刘汉初（民运委员）、杨白英（组织委员）及我（宣教委员）。会议内容：（1）检讨本团缺点。（2）如何纠正缺点。（3）建党整党工作。（4）本团行动方向。傍晚，刘锡宇同志从永丰来我团，传达省工委对我团工作的指示：（1）多要一条枪，不如多要一担谷。（2）多要一个兵，不如多要一个干部。（3）隐蔽力量，对国民党部队勿出击，不要把他们吓跑了，要把白崇禧的部队消灭在湖南。（4）各级党员仍要秘密，不能公开活动。

7月21日

月亮落时，本团开往古塘湾附近占领阵地，并在该地早餐，后经洪山殿主扶州午餐，午后，刘资生同志到部。（他组织领导的地方兵团，在这次反“围剿”中同敌71军打了几次，在逃水桥打死敌军一个连长、一个排长，打伤两个排长。后被敌军包围了两天，刘资生司令员躲在柴堆中，几乎被俘，党员被俘者30余人，死了3人。部队埋枪而散。7月20日在洪山殿重新集合，与5团靠拢时，只有步枪22支）。下午3时开拔，途中闻炮声。敌军架设的临时电线被我政治部的同志拉掉了。

7月22日

下午，第二大队由刘资生同志率领到谢家渡一带，镇压反动势力，收集刘资生部散失的枪支。

7月23日

下午，在司令部举行党总支委员会，刘资生同志（县工委书记）参加了。会中决定：（1）本团即刻向永丰一带截击白军，军事计划由聂昭良同志拟订。（2）本团立即在谷水成立人民工作委员会，由陈明同志负责，政治处设在谷水。刘资生同志在谷水工作，不在前方司令部。政治方面的工作计划由陈明同志拟订。（从这时起，县工委书记刘资生同志兼任五团政委，陈明同志专任政治处主任，我和曾路中同志仍任副主任）（3）刘资生的部队（地方兵团归队的）编为一个中队，归入第一大队建制。

7月24日

清晨，全团在案山举行第11次干部会议，到会者约80人，分队长及服务员都参加了。聂昭良司令员报告：（1）围攻我湘中第一支队的敌军6个师已全部撤退。（2）我们当前的任务：军事方面，向潭（湘潭）宝（宝庆，即邵阳）出击。政治方面，建立地方政权。（3）检查部队的缺点，即刻予以纠正，以便担负新的重大任务，下午4时，本团在十字铺集合讲话后，即向谷水推进。

三、截击潭宝路敌军

7月25日

清晨，本团由兰塘出发，在文坝冲午餐，此地距永丰25里。本晚，全团党员大会，到会的约40人，比过去增加一倍。讨论：（1）本团行动方向问题，决定向永丰进击。（2）维持军风纪问题，决定加强经济政治工作，并设立军事法庭。（3）建党问题，决定在一周内发展一倍党员。（吸收战斗英雄、纪律模范入党。）

7月26日

拂晓，本团集合在树林中，由聂团长讲话。旋即开至道子口早餐。此地距永丰20里。上午，我召集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开大会，报告：（1）举行纪律竞赛。（2）组织经济委员会。

（3）选举政治战士。（4）新党员入党问题。中午，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地主武装的收编问题。陈明同志主张收缴他们的枪枝，不能给以番号，更不能再让他们率领。如不愿交出枪枝，他们就应马上打击敌人。对朱八部队应切实联系。我的建议：（1）对湘乡县自卫团，要他们马上行动，里应外合，解放县城。或者要他们把部队拖出来，在潭宝路（湘潭至邵阳）进行截击工作。但在目前，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名义。（2）我们的行动如果不能与湘乡县城的起义武装配合，我们就应实行突击扰敌等工作，3个大队轮流出击，或者混合组织突击大队担任此项工作。（3）马上草拟政治接收与军事接收计划。（4）动员全党干部进行接收与建立地方政权的准备工作，最后能集中在政治处举行几次座谈会，研究接收工作。关于刘资生的部队改编问题，到今天仍未解决，他们要求成立直属中队或突击队，干部会议答应了这个要求。

7月27日

拂晓前，第一大队奉令派一个中队到永丰五里牌去破坏敌电线及桥梁，共去了46条步枪和一挺轻机枪，由龙满苍大队长率领，指导员孙拱，龙振华都去了，傍晚归来，劳而无功（因为国民党71军军部驻在永丰，防守严密）。晚上，党总支委员开会，决定本团应向永丰与浏水之间发展。

7月28日

下午3时，在金蚌不远的地方，第一大队破坏了几百公尺电线，第三大队今天拂晓在永丰下面5里路的高临山截击敌军。

缴了5担子弹，5担手榴弹，500块光洋，步枪3支，省政府统计处官印1个，会计处关防一个（当时白崇禧强令省政府撤往邵阳）。

7月29日

第二大队一个中队在街埠头截击，首遇敌人4辆指挥车，配有冲锋枪。敌军见我，即登山，我无所获。继又截击军车4辆，我部缴获冲锋枪1支，左轮1支，电话机1部，现洋7000余元。现款都是在我一中队战斗员身上检查出来的。

7月30日

拂晓前，第一大队出发。原拟在街埠头下面1里处徒涉测水，但当本队到达测水时，发现街埠头无敌军，全队即在街埠头徒涉，分两路前进。首先切断电线，断绝交通。次即占领山上阵地。清晨，敌卡车一辆到我军埋伏地区，第一中队放枪，车停。龙振华指导员首先爬上车，未带红指挥旗，即叫车开走。另一个分队认为敌车要开走，即放排枪，龙振华被打死，当即把他抬走了。本队共截获敌卡车4辆，1车棉军服，1车帆布胶鞋，共约200担。首运至船上，再运至杏子铺。车上多系中下级军官。本队检查时，只没收公物，不准要私人的东西。刘××不守纪律，要拿一个女人的皮包，我马上退还给那个女人了，另外没收了少数药品。中午，永丰之敌（71军）约500人向我进攻，首先放迫击炮，本队大部分已过测水。王春华（指导员）及我马上过河，登山，炮弹打得很近，大家很镇静。途中闻机枪声及炮声，战斗员仍要抽纸烟。我军缴获的东西，只挑走了50担，因为老百姓都走了。这些东西计有棉背心2000余件，棉大衣200余件，帆布胶鞋178双。本队到达杏子铺附近，即在山坳上检查，由分队长李森桃及另两个战斗员担任这一工作，连

中队长身上都检查了。搜出的东西（缴获的战利品），在大队部标卖，共只得11元几角钱，每个指战员分了500个铜板。下午5时，传说测水敌军已渡河，本队移驻长石冲宿营。午夜闻枪声，突击队（地方兵团回部）首先开走，本队亦移动（本日二、三大队也出击了，缴获不少东西）。

7月31日

拂晓，本队到达大风墩。下午，接到司令员的命令，全队即返杏子铺。我失掉了洗脸手巾，就用汗衫洗脸。失掉了牙刷，就用手指刷牙。临时向政治处借了一块钱，买了这些东西。

8月1日

全团分队长以上干部在团部开会，检讨几次出击的优缺点。我在团部看到7月31日的《湘乡民报》，登载了本县联防办事处主任熊貽谋在虞塘之役中被我第三大队击中胸部的消息。据情报，熊已死（这是5团截击潭宝路的重要战果之一）。

四、迎接解放军进入湘乡的工作部署

8月2日

5团在杏子铺举行干部会议及党总支委员会，决定本团向潭市推进，准备接收县城，另计划成立军管会。在这两次会议中，陈明同志与聂昭良同志均有争辩。聂的态度不太好，陈也发了火。主要是收编地方武装的问题，聂主大收，陈主慎重。

8月8日

上午，政治处召集各大队教导员、指导员开会，决议：①各大队成立模范班。②全团成立军风纪纠察队，陈明任队长，

我兼队附，下设三个组，共10人，人枪向大队调用。下午3时，全团向虞塘推进。7时半，第三大队包围了潭市敌自卫队，当晚收缴枪枝15支，自卫队的兵都走了。直属中队在涟水河上检查船只，收缴了敌军20大包东西。

8月4日

本团在潭市休整，晚上听到长沙解放的消息，大家非常兴奋。当时，党总支正在会商全团行动问题，原来决定全团开到安化龙田去整训（这是根据支队司令部政委章文的来信而作出的决定），因为听到长沙解放的消息，马上改变决议，决定向湘乡县城附近推进，准备接收政权，迎接解放军。（附注：当时冒充“江南地下军第四军第六师”的司令员蒋麟生，早已于6月25日在湘乡上里各处张贴了布告，声称：“曾奉中共明令，委派本部参谋处长李芳人兼任湘乡县县主席，刻正筹备组织。”如果5团这时不去接收县城，蒋麟生部即会去占扰县城）。

8月5日

上午，曾路中同志到县城去联系（他是党总支委员会决定派去的）。县自卫总队附杨治荣来我团接洽，要求改编。聂昭良同志答应给杨当个副团长，中队长都不更换。党内同志表示反对。我在山上换到陈明同志的信，要我马上回政治处工作（不再兼第一大队指导员）。我首先写了一封公函（根据党总支和干部会议的决定），印发给县内各机关、团体、学校，要他们准备移交。下午，草拟了一个安定地方的布告，交印2000份。

8月6日

上午，聂昭良（团长）、刘资生（兼政委）任命杨绍荣为

五团副团长的命令发出去了，中途被政治处扣留，聂在信上批复说：“最好由政治处专政，我马上辞职。请政治处派人接受团长的职务。”刘资生同志来调处，他在原则上认为陈明同志的看法是对的。陈说：“如果我错了，愿受上级的制裁。”事后，刘又要陈去同聂面谈，他们争论了一小时。下午开党员大会，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认为党总支委员会的决议是正确的，同意陈的意见。党员大会决定成立湘乡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选举刘资生（县工委书记兼五团政委）为主委，聂昭良（团长）、陈明（政治部主任）为副主委，张军（张力生，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县长兼政委，刘汉初（组织科长）为副政委，胡开骊（县工委副书记）、龙国屏（宣传科长）为文教委员，曾路中（政治处副主任）为军事委员，曾草庭、傅炳煌为锄奸委员，刘健吾为经济委员。开会时，县工委副书记胡开骊同志来了，他在会议中说：“目前湖南的局部和平是不稳定的，彭鐸（国民党71军军长）的部下还在动摇分离，对湘乡的压力仍很大，情况很复杂，五团现在不应该去接收县城，而应奉命去安化龙田整训。

8月7日

上午，全团举行干部大会，因为受了胡开骊同志的影响，本团决定仍向谷水开回去，并派人到宁乡支队司令部开会。部队到达谷水后，即成立人民工作委员会，建立湘乡上里谷乡村政权。中午，接到曾路中同志从县城带来的报告，说国民党71军已于昨（6日）晚开走，县城已成真空状态，要五团进城去接收。根据这个情况，聂昭良、陈明及我建议改变本团行动方向（不去安化龙田山沟里整训）。胡开骊同志反对，认为我们违反支队司令部的命令，违反干部会议的决议。陈明同志说：我们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现在情况变了，一定要改变行动方

向。晚上，刘政委（资生）要我写了一个约二千字的报告，向支队司令部请示许多重要问题（主要是行动方向问题）。

8月8日

上午，全团开干部会议，通过军管会委员人选（名单见前），通过军风纪纠察队组织办法。下午3时，全团开至锦屏寺宿营。曾路中同志回来了，他在县城曾与杨昭荣草拟了一个协定，答应给县自卫总队请求上级准许成立地方兵团。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大家不同意（成立地方兵团）。

8月9日

上午开干部会，决定陈明同志去长沙向省工委请示（行动方向问题）。曾路中、刘林、刘健吾3同志组织代表团赴县城，曾路中为首席代表。下午，全团开到泉塘（距湘乡县城约10里），住在攸叙女子中学内。途中，第三大队收缴了县自卫总队9条枪。五团1,000多人枪已兵临城下。

8月10日

中午，听说南下解放军已由湘潭上开，本团写了一个代电去慰问。下午，政工队及民宣股去县城工作。傍晚，本团开至原驻地附近的邓家瓦屋，这是为了便于警戒的缘故。

8月11日

上午，湘乡各界慰问团百余人到团部慰劳。秧歌队30人，刘秋明（龙国屏的爱人）在内。向聂团长献礼的是谢瑞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的女儿，代表中有柳官铎等。我请秧歌队到政治处开座谈会，并招待午餐。下午2时接到县城来信，说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将入城。我马上进城去。傍晚，第

四野战军12兵团46军138师开来了约8千人，师长是任昌辉同志。各界民众热烈欢迎，万人空巷。任师长要各界代表欢迎他的部队，不要欢迎他个人。朱费隐（起义的县长）、舒培因（起义的警察局长）当晚只同任师长谈了几句话。本团的同志纷纷去见任师长者10余人，聂团长也赶到了。我们同任师长马上研究截击敌军、布防、支援前线等问题。晚11时，我和聂团长才回到邓家瓦屋团部。距城约10里，12点钟才到。肚子饿，喝了一杯酒，替聂团长写了一个报告给支队司令部（报告工作及请示）疲劳极了，张不开眼，草率成章。回到政治处时，鸡已叫三遍了。

五、建立湘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

8月12日

上午，我在本团司令部看见了省委派来的组织员胡正乾同志及支队司令部派来的刘润民同志。胡是来协助刘资生政委整理本团党务的，刘是来指导本团整编的（包括地方兵团）。下午，我同聂昭良、胡正乾、刘润民、曾路中等同志去138师司令部。当时，任师长决定成立湘乡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任昌辉，副主任刘资生（县工委书记兼五团政委），委员聂昭良（五团团长）、张军（张生力，五团政治处代主任）、曾路中（五团政治处副主任）、胡开骊（县工委副书记）、周志先（138师414团政委）、彭久炼等。秘书冷戈（138师科长）、胡开骊、张军。本会主要工作是支援前线（包括合编地方兵团）。

8月13日

上午，我在临时工作委员会（设在138师司令部）拟订了2

个计划，一个是发动湘乡县各民众团体支援前线的工作计划，一个是督导县政府支援前线的工作计划。决定曾路中同志专驻县政府，负责催办军粮。下午6时政，治处拟开座谈会，我请138部414团政委周志先同志出席，报告工作经验，他因事不能来，我们的会亦未开。晚上，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138师师部开会，决定整编湘乡县自卫团，并要县政府及5团各负责筹备粮食、草料，目标为10万斤粮，10万斤草，10万斤柴，3万斤马料。

8月14日

各界开展支援前线工作，本团政治处派出5个同志帮助县政府催粮。下午，朱费隐（起义的县长）、杨绍荣（起义的县自卫总队附）、舒培因（起义的警察局长）及自卫队、警察队各中队长，均在138师师部开会，冷戈（138师科长）说明党的政策，要他们安心工作，不要受人之骗而把部队拖走（当时该两部有些不稳定的情况）。次由聂昭良、张军（张生力）讲了话（旨在稳定部队，支援前线）。

8月15日

上午，任昌辉师长带领聂昭良、刘资生、曾路中、张军去49军军部，见了钟伟军长。他要本团向邵阳方面活动（任务是清乡、筹粮、替大军了解情况）。同时决定地方兵团与第5团合编。当时由138师下了一个命令，任命吴嵩岳（地方兵团副司令员）为（5团）副团长，王梅奇（地方兵团副政委）为（5团）副政委。地方兵团的中、下级干部都担任（5团）副职。晚上，在政治处开了一个临时党总支委会议（刘资生政委参加了），决定了大队级和中队级干部，其他干部未定。

8月16日

下午，138师召集两团（5团及地方兵团）指战员讲话，

地方兵团未到。黄昏时，138师冷戈科长来讲话，他说：“只要你们打敌人，我们有的是新武器，一定可以武装你们”。是日上午，刘资生同志向地方兵团讲了两个钟头的话，（他说）来说服干部。下午，地方兵团派了7个代表去见任师长，任师长问：“你们是不是党员”？答：“是”。“你们听不听指挥？”答：“听指挥”。任说：“那么你们赶快去合编”。

8月17日

上午，在泉塘开干部会，两团干部出席了，结果不好。中午，陈明同志由长沙打来电话，我未接到。晚上8时，我在《湘乡民报》见到了新华社战地记者阳地同志，（谈起我在北京大学的同学杨赓）他说杨赓现在汉口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新华分社担任社长。本晚，湘乡各界人士举行欢迎解放军大会（在县城公共体育场），会议很乱，有一个人喊错了口号，他喊：“我们要打到南京去”！（其时南京早已解放了）。城内的军队都上了前线，只有一个军部（49军）及两个警卫连留在县城。

8月18日

清晨，本团开往三角塘，地方兵团不愿合编，都把枪丢了，本团捡了377支长枪，8挺轻机枪。我同省委组织员胡正乾同志去看望他们，临时开了一个检讨会，地方兵团的干部说明了不愿与5团合并的原因：（1）不应委派×××为高参，因此人是他们的敌人，（2）5团指战员歧视他们。（3）5团未替他们解决给养问题。（4）5团缴获的战利品没有公平分配。（5）5团把地方兵团编散了，而且他们的干部都是副职。我劝了他们很久，他们都不愿到5团来。下午5团开往石狮子江，刘资生同志率领地方兵团干部到县城去了（刘也不兼任5

团政委了，由我暂代政委）。本团驻县城办事处奉49军命令撤销，曾路中等同志未离开县城。

六、清乡、借粮，搜索残敌（日记简略）

8月21日

上午，本团在娄底休息。下午，我在一家祠堂里开民众大会，到会者约70人，民众要求本团维持地方治安（当地有土匪活动）。

8月22日

本团开往杨家滩，在水桶底发现敌机，并闻机枪声，知系敌机在杨家滩扫射。本团开到杨市时，居民多已闭户，谣言甚多。

8月24日

二大队及机炮队向杨家滩游击（这时本团在安化桥头河），敌军曾发炮数10发。下午，我在桥头河豫湘小学开座谈会，到会者发言甚多（主要是要求本团维持地方治安）。

8月26日

本团上午在小碧桥，纠察队审理的黄金案已告一段落，王有林拿出黄金2两7钱2分，本日上午交到团部。下午开往西阳，团部住在春元中学。陈明同志从长沙归来（他是8月9日去长沙向省委报告请示的），谈了上级（支队司令部）对本团的枪评：（1）不听命令，乱出布告（实际是安民布告）。（2）在潭宝路打汽车（打的是敌军逃跑的汽车）。（3）准备接收县城（实际上5团没有接收县城任何东西）。

8月27日

我部捉到了蒋麒麟一个大队的号兵，该部在外面派粮要款的都是这个大队，入枪仅20多，有4条枪在酉阳被我3大队缴了。

8月28日

下午，在团部开党总支委会，决定审查全团干部，整编部队，并在湘乡上里14乡镇分区举行会议，以便筹粮发饷。

8月29日

谷水街上出现了蒋麒麟的布告，他自称“江南地下军第四军第三师”师长。布告上说，“该部是奉中共命令及49军钟军长的命令成立的”。又说：“杨家滩、娄底一带有人诬蔑本师，离间党军，本师决予以歼灭之。”本团同志看了这布告，有些人非常气愤，有些觉得好笑。

8月30日

听说我大军145师派人送信给蒋麒麟部，说蒋部暂受145师指挥，要蒋部即造具人员武器名册。该师（145师）正在收集蒋部的材料，以便处理。蒋部现在各乡招兵买马，大发其委任状，任意收缴民枪，强索民众款、谷，民众敢怒不敢言。（9月初，145师即收缴了蒋部枪支）。另有曾硕斌部散匪，在乡下实行炮烙刑。胜岩乡白露湾附近的童家冲，有个石匠叫陈竹华（混名十石匠），在8月28日左右受炮烙队之害，被烙去一块光洋，陈竹华的老婆被烙得快要死了，酉阳河口的章六婆（60多岁）被烙去铜元数十串。另有一个彭哲夫被烙死，其子正在做道场时，炮烙队忽到，又烙其子。炮烙队大都只有一、二条短枪，七、八个人。各地人民为了自保，组织梭镖队以保家。

8 月 31 日

本团各级干部大都调整好了，陈明同志专任团政委，我任政治处主任，曾路中同志去县城工作，杨白英、曾草庭分别到娄底、杨家滩去。清乡、借粮的人员及部队已派定，各大队的人枪已调整。起义元勋有的被编余，有的另调工作，其中有人不满意。

9 月 1 日

上午，司令部举行清乡、借粮预备会议，决定了清乡的办法。对于借粮方面，决以大户为对象，每乡借1000石。半晚，陈明同志到司令部去开会，说益阳地委书记及湘乡新县政府的人员都来了，要陈明与聂昭良两同志先到县城去商量重要问题。今天有人从杏子铺来，说该地的炮烙队曾于上月30日晚到曾富先家，把一只菜铲烧红了正要烙人，家属在外面喊，几十个民众集合拢来，把炮烙队赶走了。又据谷水人说：谷水河对面夏家坝的彭照普被曾硕斌部炮烙，未死。其父被炮烙队用香火在口里烧，用烙铁在身上烙，卒至死去。（因此，湘乡上里民众纷纷要求本团留在上里清乡）。

9 月 3 日

下午，本团由谷水开至普庵堂宿营。此次奉令开回县城附近，原定分区清乡与借粮的计划又告搁浅。有些战斗员认为本团此次开到县城后就要改编，发饷又无希望了。

9 月 5 日

章文（一支队司令部政委）来信，说省委调我到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搞班主任），我非常高兴。陈明同志于傍晚从

县城回政治处，他说县城自卫总队及警察队枪支均已收缴，三青团的首脑中有些最反动的分子已被捕。对于第5团上级很重视，本团的一切困难问题，现正向上级请求解决中。

七、南下干部地下党干部会师

9月7日

上午，南下工作同志与湘乡县工委及5团干部举行会师大会（同时庆祝新县委及县政府成立，地点在简师礼堂），县长宋子兴、政委刘洪源两同志先后讲了话。刘说：毛主席的策略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今后湘乡的工作，应掌握这个原则。湘乡混乱的局面很快就要结束，现在要求同志们再忍耐几天。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支援前线。各同志下乡后，先开会师会议，其次是宣传借粮。我们应分别召开乡长会议、保长会议、群众会议。乡保长会议有3个任务：①指出乡保长是国民党的爪牙，他们今天应该悔过自新，坚守岗位，忠实执行人民政府的法令，完成借粮任务。我们开展工作时，不准随便打人，杀人和捕人必须事先经过批准。②乡保长要保障干部的生活与安全。③告诉乡保长如何工作，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不行，说错了不行。对于乡村的中、小学教师，要他们照旧办理，但要取消反动的教育。宣传借粮工作完成之后，再进行清乡与调查工作。对于土匪，要着重政治攻势，前面是用嘴巴子，后面是枪杆子，才能彻底清缴土匪。至于减租减息工作，必须在清乡反霸告一段落后，才能进行。今年不实行减租，但农民可以拖延。在条件未成熟前，不实行减租减息及分配土地等工作。接着，苏丹副政委讲了部队政治教育问题。他说：最重要的是先搞三查三整和诉苦教育，第二阶段是政策教育，第三阶段是

整顿党的组织及行政组织，成立军人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整训之前，要有党内动员，要将工作计划教育干部。凡是布置一个工作，必须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而且必须集中力量进行最主要的工作。接着，聂昭良团长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本日会师的印象好，觉得北来干部很客气，虚心，能吃苦耐劳，一切行动听指挥（参加会师大会的，还有县委副书记刘资生、5团政委陈明、县委宣传部长胡开骊、县公安局李强、县武委会主任康政等同志）。7日下午，曾路中与崔强副书记同赴益阳地委及军分区，请求解决5团各项困难问题。政治处于下午迁到大育桥。

八、三、五两团集中在宁乡整训

1949年9月9日

下午，在政治处举行全团党员大会，各单位到会者共50余人。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克服闹饷危机，进行全团整训工作。会中决定：巩固部队，完成整训计划，作为党员工作考绩之一。会中宣布：现在奉令停止吸收新党员，目前党的工作是整党，加强党员教育。

9月10日

下午，举行全团分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聂团长报告本团目前任务：①整训。②维持地方治安。③协助政府建立地方政权。他报告以后，会中仍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认为不发饷就不能进行整训。陈明同志发动党员干部发言，这种偏向乃被纠正。昨晚，县城谣传白崇禧部将进犯湘乡县城，县委书记刘洪源同志半晚写了一封信给陈明同志，要他派100人徒手到县城

去运枪。一、二大队各去50人，共运来410支枪。

9月11日

从县城运来400件棉衣，二、三个战士共一件，晚上当棉被盖（时已9月中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单裤，有些人的裤子早已破了，连屁股也露在外面）。

9月13日

本团接到支队司令部的命令，要本团开到宁乡整训。教歌的4个女同志闻讯，都不愿到宁乡去。大家都走了。起初她们满口答应愿意从事革命工作，现在只教了两天歌就不干了。

9月16日

全团由大育桥开往宁乡，是晚在如意亭宿营，离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只有12里。

9月18日

5团到达宁乡县城，警备司令部指定5团驻在西门外公路两侧。因为民房太少，全团住得很分散。

9月20日

上午，益阳军分区辛元林副司令在宁乡县鹅山中学举行会议，第3团、第5团的团级干部都参加了，还有军分区派来搞整训的干部20多个。辛副司令员报告开会意义，支队司令部政委章文（官健平）讲了话，他说：安化第3团的战斗员大都是贫雇农，今年元月以后未发过饷，每天只吃两顿饭，常是赤脚作战，反“围剿”时，敢于打敌人。至于湘乡第5团，纯粹是农民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今天，这两个团在这里整

训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整训好的。接着第3团张甫臣团长说：他在江西苏区红12军干过，回安化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地方人士保举他搞自卫团，慢慢找到了党的领导，一直没有动。有一次，邵阳专员拿一张报纸给他看，说安化自卫团通匪，想动他的手，因见情势不对，未动。后来陈明仁调他去，他未去。第3团士兵很苦，5、6、7、8、9月每人只发3角钱的草鞋费，现在士兵三分之一的人只有一套单衣，放哨时拿条毛巾捂住肚子，睡觉时常是6个人共一床被窝。全团现有940人，步枪530支，花机枪9挺，轻机枪18挺，炮4门，马20匹。接着，第5团聂昭良团长报告3月桥头河起义，建立“湘（乡）安（化）支队”，5月改编为湘中第一支队第5团，6月参加歼灭尹立言“西南民主联军”，7月反白崇禧“围剿”，8月迎接解和支援前线等情况。

9月22日

上午，3、5两团政工人员在宁乡警备司令部开会，益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耀堂讲话，他说：5团的党员多，有60多人，一、二两团及支队司令部总共只有26个党员，3团的党员也很少，湘中第一支队党的力量集中在第5团，军分区对5团很重视，要求也较严格。这次整训，十分之八是政治，十分之二是军训，主要是提高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领导整训的组织，每个团设整训委员会，大队设整训小组，中队建立整训学习委员会，各班成立学习小组。此外，还要建立一些群众组织：①军人俱乐部，任务是组织文化娱乐和办壁报。②经济委员会，任务是改善部队经济生活。③纪律检查组，任务是宣传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不宣传不走，不满（红）不走，不打扫不走。整训时期的政治教育，第一步是时事教育或前途教育。第二步是阶级教育，这是整个教育的中心，要进行两军（解放军与国民

党军)对比,两区(解放区与国统区)对比,两个阶级的对比,耐心的访苦、引苦、诉苦,把苦水变成力量。第三步是党的教育和解放军的教育,这三步的时间大体上是一个月。

9 月 24 日

下午,3、5两团在宁乡县公共体育场举行会师和整训动员大会,大会由支队司令部政委章文主持,益阳军分区副司令员辛元林、补训师师长贺礼保、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耀堂、第3支队代表李石猷(司令员)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游艺,宁乡县委干训班演唱了“打倒美帝”、“农家乐”、“两毛钱”(话剧)、新疆舞等。

9 月 30 日

下午,军分区辛元林副司令召开三、五两团干部会议,补训师贺师长在会上讲了话,他要求补训师的干部必须诚恳、虚心、耐心,不要发急,不要轻易给人家扣“帽子”,不要对游击战士的作风看不惯。同时也希望3、5两团的干部不要过于重视方式方法。

10月6日(中秋节)

今天上午,宁乡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五两团及3支队部分指战员参加了,大会主席团有朱耀堂(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瑞山(宁乡县委书记)、张继元(宁乡县长)、李石猷(3支队司令员)、张甫臣(3团团长)、熊绍安(3团政委)、聂昭良(5团团长)、陈明(5团政委)、张军(张生力、5团政治处主任)等。大会由唐瑞亭主持,张继元、朱耀堂、李石猷等讲了话。会后游行,3、5两团走在工人、农民、学生后面,万人空

巷，鞭炮齐鸣，极一时之盛。

附记：9月20日到10月6日，3、5两团只在宁乡集中整训了16天。10月7日开赴益阳，10月10日，接受益阳地委及益阳军分区的改编。1、2、5团整编为益阳军分区独立第一团，姜应钟、张登荣、聂昭良为副团长，陈明调到益阳军政干校学习，我调任军政干校秘书。

回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

湛鸿章*

我是1938年成立中共湘西工委后，来到湘西地区工作。当时的工委书记是李鳌，委员有我和傅景三。1940年，湘西各县党组织都遭到了破坏，傅景三也被捕。1941年2月，省工委书记高文华宣布捕销湘西工委。李鳌被分配至贵阳。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湘西的，被安排在邵阳筹建省工委机关。我们撤走时，留下了向茂华等一批党员。因他们当时都没有暴露，组织决定他们长期隐蔽。我遵照省工委指示也暂时同他们断绝联系。

1945年，我回到湘西，担任溆浦县工委书记，发现原来的地下党员大多数都不见了，有的已牺牲，有的被捕自首，有的已脱离组织，停止活动。不过，这里还有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党员，有好些党的同情者。例如陈策，是抗日初期从贺龙部队回来的老红军，曾任过辰溪抗日自卫团的副团长，1939年被捕脱党。又如米庆轩，在抗日初期任过辰溪县工委书记，多次被捕后脱党。他们两人都是辰溪人，周围还有一批抗日时期脱党的人及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学生。还有原溆浦县长向承祖、溆浦县自卫队湛志锦、湛志华兄弟，他们三人都是当时省工委书记高文华的统战对象。我也做过他们的工作，他们表现较好。向承祖还因与我们关系密切被免去了县长职务，湛氏两兄弟的县自卫队亦因此为国民党的武装所消灭，二人仅以身免。上述这些革命者及革命的同情者，后来都成了我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

*湛鸿章当时系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政委。

我重回溆浦后，许多老关系、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都主动找我要工作，要求我领导他们搞革命活动。例如吴传秋就是一个。他是我1939年培养的建党对象。我们分手后，他一直到处打听我的去向，要求参加党。这时我就先吸收他入党，并要他在知识青年中组织新民主主义学习小组，在农民中组织农会小组，从这些秘密小组的活动中，发现建党对象，由我亲自审查，个别吸收，顺利地开展了建党工作，为随后开展武装斗争准备了力量。

1949年初，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当局对湘西忽然特别感兴趣。原来他们早有预谋，要勾结这里的地主土匪武装，扩建军队，幻想阻挡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挺进。他们几番密谋策划，终于演出了“湘西事变”。1949年3月2日，国民党保安团曹振亚、汪援华突然从永顺率部攻打沅陵县城，并进行残酷的奸淫、烧杀和抢劫，弄得整个沅陵乌烟瘴气。3月5日，以国民党保安大队张玉琳为首，伙同石美豪、石玉湘部占领了辰溪兵工厂，夺取了该厂2万多枝步枪、近1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大炮以及不计其数的手榴弹。这就是曾经轰动湘西，也轰动了全省的所谓“湘西事变”。事变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匪和封建势力头子，紧接着纷纷露头，连过去玩过枪杆子的“失意”军人、野心家，那怕只有一支枪的，也冒出来跃跃欲试。很快就出现了以永顺为中心的国民党国防部暂编第1军和以辰溪为中心的暂编第2军。每个军下面都有10多个师的番号。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立刻派人掌握了这两个军的指挥权。他们几乎把湘西所有的惯匪、地主恶霸、大小国民党党棍网罗进去了。霎时间，各个山头，刀枪林立；关隘路口，岗哨逞威。他们始则妄想阻挡我军前进，但螳臂挡车，无济于事；继而窥见我当时留驻的解放军不多，便重新集结起来，占领了大片农村城镇，叫嚷要打倒共产党，赶走解放军。国民党还经常派飞机

空投武器、物资支持他们，把他们看作一支了不起的反革命游击武装，令他们好生等待，来日配合其反攻大陆。殊不知，他们这样做，只能激起湘西人民的更大愤怒和仇恨，湘西人民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他们彻底消灭。

就在“湘西事变”突起，群魔乱舞的同时，我们的地下党员，包括各个革命时期出于种种原因脱党的同志和党的同情者、统战对象，以及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也纷纷行动起来，到处收集枪枝弹药，组织队伍，进行自卫，迎接解放。他们当中有些人，由于最初对“湘西事变”的性质看不清，有的人还误认为是反对国民党的民变，因而许多进步人士都参加进去了，许多被迫脱离组织的老共产党员、老红军也参加进去了。他们在里面活动，都掌握了一批人和枪杆子。如陈策、米庆轩、肖洪量在事变一开始，就组织起一支部队，叫作“湖南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有300余人枪，准备上山打游击的。但是，随即被国民党张玉琳的暂2军改编为一个大队。他们在最初组军和后来隐蔽在暂2军的过程中，都曾与省工委军事组涂西畴联系过。他们原先打算争取暂2军起义，在争取起义的工作失败以后，便决计从该军分化出来。当他们将要脱离暂2军时，因事机不密，突然被该军包围于溆浦和辰溪交界的罗子山。为了突围，曾血战了一整天。战斗中，许多同志表现很勇敢。如米庆轩的弟弟米庆舜，多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不能行动了，仍然坚持要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要别人帮他装满了机枪子弹，揭开身边所有的手榴弹盖子，在给予敌人以重大伤亡后，自己也壮烈牺牲。部队根据省工委军事组事前的指示，在附近驻军“雪峰山自卫指挥部”的支援下，终于突围成功。随即转移到了溆浦龙潭。这时候，谯志锦的部队及蒲和生的部队均从张玉琳的暂2军分化了出来，因而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我们的解放军能够较顺利地逼过湘西进军大西南。

1949年4月，经省工委书记周礼及省工委军事组同意后，我来溆浦龙潭做争取“雪峰部队”等地方武装起义的工作。“雪峰部队”的全称是“雪峰山自卫指挥部”，是向承组、谌志锦、谌志华兄弟在龙潭组织的队伍，由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程潜给的番号。它由两大部份组成，即向承组部，原为龙潭区各乡保的武装和少数地主的武装；谌氏兄弟部，系从张玉琳的暂2军分化过来的。此外，驻在怀化的暂2军独立旅即蒲和生部，也同他们有密切的联系。“雪峰部队”共有3个支队，约4,000人，分驻在溆浦、新化、隆回、武冈、黔阳等县交界的山区，司令部设在溆浦龙潭。我在龙潭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与湘西各地的进步势力联系，同各派地方游杂武装的代表进行接触、谈判。我先派党员易念葵去找“雪峰部队”的负责人联系，他们表示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请党的同情者、我的老同学姜定跃协助我做“雪峰部队”的工作。他不仅对工作全力以赴，还抽出自家商店的一部份资金，作为活动经费。我们动员民众教育馆、印刷厂的几个工人，每晚半夜后帮助印刷文件和宣传、学习资料，然后再通过各种关系散发到“雪峰部队”的各个驻地去。此外，还组织并训练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与学生，派进“雪峰部队”去当政工人员，从内部做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雪峰部队”内部有少数反动分子。他们极端仇视我党和革命群众，一个坚决主张起义的大队长李绍汉，竟然被他们暗杀了。但是，这个部队的大多数人都主张起义，尤其掌握实权的谌志锦很坚决，最后还是全部起义过来了。他们还带动了怀化蒲和生部1000多人全部起义。

“湘西事变”后，在“雪峰部队”起义之前，我曾向省工委汇报说，有可能争取暂2军全部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湘西。在争取暂2军的工作遇到困难后，我们才不得不组织“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由我和陈策统一领导。陈策是在放人企

图摧毁我们在龙潭的根据地，我的处境很困难的时候，率部进驻龙潭的。他此举给予我极大的支持，镇住了周围蠢蠢欲动的敌军，也减轻了友邻的“雪峰部队”所受的压力，从而稳住了该部。大家还配合解放大军打胜了衡宝战役。尔后，“雪峰部队”也从弹药、给养方面支援了陈策、米庆轩部。

我与上述各部队的负责人共同商定，先由陈策、米庆轩部队公开打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旗号，并由“雪峰部队”掩护他们于8月中旬离开龙潭。我们在距龙潭不远的隆回县烂草田开了一个大会，正式宣布“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成立，陈策任司令员，我为政委，肖洪量当大队长。米庆轩因病留龙潭隐蔽休养。部队离开龙潭时，沿途陆续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姜定跃、罗健西等参加进来。我就派遣罗健西去长沙向省工委汇报。当时还印有“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布告》，随军到处张贴。

纵队离开烂草田后，当日开到隆回小砂江过夜，因纪律严明，不住民房，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当地的地下党员为我们送来了粮食、被盖。我们纵队的活动震动了附近的敌人，驻隆回的敌保安团的一个营，主动向地下党员表示愿意投诚或起义，并要求我前去谈判。我通过当地党的负责人欧阳宝堂弄清了该营的起义诚意后，便带了两个人到这个营部开了有4名连长参加的座谈会。我向他们讲清了当前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政策，欢迎他们赶快起义。我请他们移动驻地、给我们让开一条通向新化竹溪山的道路。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和要求，并立即换防让路。后来，他们看见我们的人枪并不多，又转向湘中游击队联系，我们就未再过问了。

纵队到达竹溪山，受到隆回地下工作人员学习班全体学员的热烈欢迎。我们在那里同他们一起搞了两天的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打开了一家大地主的仓库，将粮食和银元分发给了贫

苦农民。沿途的农民热烈欢迎我们，自动给我们送情报。这时新化地下工作人员罗孝荃带来了敌人准备攻击我军的情报，我们立即向新化奉家山转移。途中与奉家山一家大地主的武装遭遇，我们把他们仅有的一挺机枪和几枝步枪缴了。纵队到奉家山后，与地下党员王楚伟、武德章、杨杰卿、刘则生领导的安（化）、新（化）、邵（阳）、溆（浦）游击队约100人会师，合并。另外，还接收了两支小部队。队伍扩大了，又增补李晖为副司令员，陈显荣为副政委，罗健西、张子平、姜定跃为正副参谋长，向阳、武德章为政治部正副主任，肖洪量为第1大队长，王攸然为第2大队长。纵队就地进行了休整。政工人员在奉家山各地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他们把武装地主奉老八的粮食与财产，全部没收分给了农民。大约过了10多天，侦察员罗孝荃得知新化的一个保安团准备来袭。我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纵队向沿溪方面转移。临行前，我们在奉老八家的4个碉堡里点燃了灯光，以诱骗敌人。敌人跑来后，果然朝碉堡胡乱射击了一阵，见无人，扑了个空，走了。纵队在沿溪活动几天后，听说我大军已向溆浦进军，我们于9月20日，即溆浦县城解放的第二天，赶回溆浦县城，受到了溆浦人民的欢迎。

在县城，我们会见了解放军留守的一位团政委。他说，他正等待我们下山，共商支前和对付残敌骚扰的问题。他要求我们负责溆浦、辰溪、怀化、沅陵几个县城的安全工作。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重新部署了纵队的力量：把最近已经公开起义的“雪峰部队”改为纵队的第2支队，将新起义的怀化蒲和生部改编为第3支队。整个湘西纵队官兵已达到5000人左右。同时安排向承祖为副司令员，谌志锦为第2支队司令员，蒲和生为第3支队司令员。纵队司令部设在辰溪。陈策从溆浦下山后即率部进驻辰溪。我们当时执行着两项任务：一方面派人给向西

南挺进的大军作向导；另一方面，筹集粮草支前，同时对残敌展开全面劝降和收缴枪枝的工作。一直等到47军从西南回师，成立了湘西军区后，我们才将整个部队交给军区改编。改编后，湛志锦部编为沅陵军分区独立21团，蒲和生部编为芷江军分区独立22团，湛、蒲二人分任两团团长。陈策直管的第1支队编为军区直属大队，王攸然部编为溆浦县的临时公安武装。部份干部进军干校学习，政工人员大都安排到地方工作，陈策调沅陵军分区任副司令员，我调溆浦任县长。至此，湘西纵队已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官兵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湘东纵队回忆

邹继衍 谭源育*

“湘纵”前身及其背景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经历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将长江以北国民党军的主力消灭殆尽。这时国民党政府一面进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扩军备战，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大军渡江，以苟安江南。国民党67军，代号“雄师”部队，就是在此背景下，于1948年10月初在南京开始组建并成立军部，旋即移驻江西上饶，隶属于第4编练区，美式装备的新军。军长刘廉一，湖南湘潭人，先毕业于黄埔军校6期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11期，是何应钦的可靠亲信，也是蒋介石所器重的一员干将。该军所属3个师的正副师长和团长，均为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可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当时，邹继衍任国防部4厅上校参谋，由4厅推荐调任67军军部管后勤的第4科科长，谭源育任4科中校参谋。邹赶到上饶军部就任不久，奉命重返南京，负责洽领全军武器装备。由于邹在国防部4厅工作近两年，人事业务各方面关系较熟悉，加上刘廉一的资格，只花了很短时间便顺利地办妥了洽领武器装备的手续，并将一部份急需的武器弹药、车辆、通讯器材等及时运到上饶，这样，赢得了刘军长的好评和信任。同时刘也知道邹在抗战时期历任连营长、副团长，长于带兵作战。

*邹继衍当时系湘东纵队司令员；谭源育当时系湘东纵队副司令员。

因此，1949年1月即将邹调任为军直属第1团任团长，邹又签准调任谭源育为副团长。

67军组建的兵源，国防部规定由浙赣两省征集壮丁拨充。军部因鉴于征兵困难，又报请国防部批准并征得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同意，在湘招募15,000人补充。在株洲设立“雄狮部队驻湘招募总队”，派副师长黄仁、高参何某兼任正副总队长，委派了几个招募新兵团番号。邹调任团长后，只把从江西接收来的300余名壮丁编成一个营进行训练，为加速组建成团，即报请军长派他回醴陵招募新兵补充，刘因盼望兵员补充心切，批准了邹的请求，临行一再叮嘱，希望在两个月内募足1,000人以上，带回上饶装备成团，作为该军的基本部队。这样，邹、谭便于1月底带领部分官兵和自卫武器，由上饶回到醴陵，将团部住进醴陵城西门杨光玉的一栋房子内开始办公。同时派遣营长黄鹤汀、谭振声、周荣，分驻醴陵、长沙、浏阳各自的故乡，开始招募。当时对外公开打出的牌子为“雄狮部队驻湘招募总队第6团”。没有亮出军直属第1团的番号，这是按照军部规定在湘招募机构必须统一名称而采取的折中措施，因湖南当局不准任何其他番号的部队在湘招募新兵。实际上本团与株洲总队，只有领取拨发军粮的关系，其它一切均受军部指挥，由邹直接对军部负责。

割断旧关系 寻找新出路

我们从2月初开始招募，到3月末共募得新兵约1,100人，军部得报后，曾一再电促赶紧率部队回赣归建。此时，邹的心情矛盾重重，经常与谭交换意见。我们衡量局势，一致判断国民党政权肯定完蛋，而且会逃往台湾，无疑67军这支嫡系部队，也一定为国民党尽忠到底。我们不愿继续追随卖命殉葬。同时我们也知道，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蒋军官兵起义投

诚、可受优待、立功受奖”的号召。但是我们既不了解更多的共产党的政策，更苦于找不到中共地下党，深感徬徨苦闷；因此，只好一再回电军部，托词推迟开拔行期，希望能尽快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正在这时，通过旧属连长王笑如的关系，由王介绍我们与醴陵中共地下党员袁法鹏同志认识。以后经过几次深入交谈，在他摸清了我们的家世、经历和愿意投向人民的情况后，即反复向我们阐述了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大优厚政策，最后还说：“现在湖南省工委号召大力发展地下武装，进行斗争，配合大军迎接湖南解放，你们如果决心起义，我负责为你们与党建立关系，部队什么时候拉出去，我保证党立即派人前来领导。”我们吃了这颗定心丸，立即表示，决心放弃去台湾打算，坚决起义投向人民。我们作了以下几件准备工作：第一、电报军部声称立即准备开拔回赣归建，请求发给步枪300支、轻机枪10挺，作为回赣途中别部侵犯时好自卫武器，还可利用行军训练士兵熟悉武器的使用技术。同时由谭源育持邹亲笔信，赶去上饶领取这批武器。第二、4月上旬邹亲去株洲招募总队，领取了由醴陵县府拨发的粮谷200石，并商借了300元银洋，作为起义后部队主副食储备。第三、去电长沙、浏阳谭、周两营，迅速集结新兵，听候团部命令行动。还对醴陵部份可靠的连排骨干，分别做了起义的思想工作。可惜的是，谭副团长出发后，因当年春雨连绵，江河洪水泛滥，赣江樟树铁桥冲毁不通火车，迨谭星夜步行赶到樟树镇时，恰遇军部粮秣组长刘运泉，回湘处理军长和本人家事，据刘告知，他离开时军部已向瑞金转移，今后可能经赣州撤向广州。谭因无法赶上军部，只好空手而回。

三关起义 树立红旗

4月21日，人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白崇禧、张淦兵团纷

纷后撤，聚集醴、攸地区企图顽抗。我们几百人的新兵队伍，随时有被白部吃掉的危险。当即向袁法鹏同志请示。袁说：“现在情况确已到了紧要关头，你们赶快把队伍拉到攸县山区树起红旗，扩大影响，能带多少人算多少人，武器不足今后设法补充，我马上去长沙向省工委请求派人前来领导，留可靠人员在醴陵等待跟我联系”。我们遵照指示留谭源育、王笑如在醴陵等候迎接省工委来人，并将部队转移到醴陵城渌江下游的邓家渡。一面电令浏阳周部立即遣散招募的新兵，免得贻害地方。一面将领到的200担粮谷，卖掉部份，其余碾成白米携带食用。出发前夕，派排长黄灿明前往已在株洲集结的谭振声营，令其火速开醴陵与团部会合，因黄中途失误、谭部未能赶上会合。5月上旬（具体日子忘记），率领醴陵所部500余人沿醴陵山区栗山坝、汪家垅、贺家桥等地行军三日到达攸县三关。原本与谭约定等他迎接到省工委的来到部后再行宣布起义，但是我们看到在江浙一带被击溃流窜来湘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三五成群沿途抢掠骚扰，为了防止人民误会，当晚打出“湖南地下军湘东纵队”番号，张贴布告标语，集合部队摘下国民党帽徽和“雄狮”部队胸臂章，正式宣布起义投向人民。

我部起义后，外界反响颇大。首先，醴陵渌江《通俗报》即登载“邹继衍率雄狮部队一个团上山为匪”。株洲总队将我部情况电报军部，刘廉一随即派200师副师长张莫京来到醴陵停留半月，对邹家属进行威逼利诱，迫邹爱人请其表弟持他的亲笔信来游击区，促邹率部随他回军部保证安全既往不咎。我们没有听他的。只嘱来人声称找不到部队，张只好失望而去。67军只好说邹“叛变投敌”，下了一纸空文的通缉令。其次，当时株洲招募总队已募到新兵四、五千人，准备集结开赴广州，那些团、营长们看到我们这支军长亲信的直属部队都已脱离起义，他们也不愿再去追随卖命，于是纷纷遣散新兵，各谋

出路，最后被骗走的只有七、八百人。

我部起义后，在三关住了两日即移驻广寒寨山上。5月10日前后，部队负责军需的谢枝先商派副官陈运桓下山，先找到陈运桓的妻兄、地下党员文有然同志，再由文有然同志率陈运桓在黄丰桥附近的东岳山找到尹辉同志。由于尹、文与谢枝先在此之前曾有交往，陈运桓说明情况之后，双方都有一种信任之感。随由尹辉同志征得攸县地下党另两位领导人贺湘楚、彭秀实的同意，表示愿与“雄狮”部队接触，双方领导商定了下次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会谈内容。经过再一次往返，双方于5月中旬某日约定在广寒寨山腰一农家会面。部队方面由邹带谢枝先、陈运桓和10名武装士兵来到约定地点；攸县地下党方面由彭秀实、贺湘楚、尹辉等同志出面商议有关具体事项，并达成如下三点协议：1. 湘东纵队在省工委未派人来领导之前，接受攸县地下党指挥开展活动；2. 军事方面由邹统一指挥，政治情报、后勤补给，由攸县地下党负责，并派尹辉等5位同志住司令部，随军行动，办理日常工作；3. 攸县地下党原有武装编成一个隶属湘纵番号下的第4中队，贺达尊为中队长。会后部队移驻黄丰桥。部队在黄丰桥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留在醴陵的谭源育偕同省工委派来的曹伟如（化名刘一中）同志携带省工委书面指示和书籍印信等来到黄丰桥。书面指示三点：1. 省工委同意《湘东纵队》番号，任邹继衍、谭源育为正副司令员，派曹伟如代表党领导部队。2. 部队淘汰体弱者，留下强壮者，编成一支300人的精悍游击队，加强整训，待机候命。3. 继续与攸县地下党合作，开展斗争。随后对部队人事进行了调整，资遣了一批病弱和自愿回家的战士，任黄鹤汀为大队长，下辖4个中队和一个直属于司令部的武工队；任原少校团附杨大鹏为参谋长，谢枝先为供给主任，喻约翰为医务主任，黄梓梅为总务主任，派知识分子郭益吾、李某，担任宣

传文书工作。曹伟如同志只住了几天，说他在株洲还领导了一支铁路警察武装，要谭源育再次随他出去，动员那支武装并另外搞些武装带来攸东，增强部队实力，在此期间要邹派出部份便衣武装进驻醴陵南部清水江一带游动，以谭原去当地铁肩中学建立的联络点为中心进行联系接应照料。

前期的对敌斗争

我部从5月上旬到6月中旬这一阶段，主要在攸东地区接受攸县地下党的领导进行活动，除柏树下夺枪未成外，还开展了以下几次主要斗争活动：

第一次是杜口护粮。5月中旬某天，贺湘楚同志匆匆跑来对邹说，离此不远的杜口有个国民党粮仓，储备了大量粮谷，顷得情报，官田敌军派了两个保安中队并煽动几百名群众前来抢夺粮谷，为了不使这批粮谷资敌，请你赶快派部队去阻击守护，我们马上发动群众将粮转移保护留作后用。邹即命大队长黄鹤汀带两个中队，以尽快赶去执行任务，幸好我部先敌一步到达粮仓附近，占领山头阵地，不一会果见敌两个中队，一前一后裹胁着几百名挑箩筐的群众向粮仓逼近。黄即命令打了两梭子冲锋枪和一阵排枪，敌听到自动武器的枪声，不敢应战，仓惶撤退，群众亦纷纷四散。部队在那里守护了一天一夜，把这批粮谷转移藏妥，为部队和攸县党工作人员的主食供应提供了保证，还将部分粮谷无偿发给当地贫苦人民度荒。

第二次兰村、峦山之行，部队移驻黄丰桥没有几天，地下党获悉集结官田的王定中匪部有向峦山方向流窜趋势，贺湘楚、尹辉等同志提出，我部应乘机对王匪进行一次伏击。当即决定由邹亲带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和尹辉等同志一道于黄丰桥出发，当晚宿营兰村，准备次日拂晓在山门洪、勇桥一带堵击王定中。山门洪、勇桥一线，是官田通往峦山的必经之路，峡谷中有一

条溪流，两岸都是陡峭的山岭，紧傍山崖是一条单人小径，是个理想的伏击阵地。没有料到，当我部由兰村出发进抵山门洪时，王匪却已先我通过山门洪往峦山方向进发。王匪发现我部尾随其部之后，随即跑步进驻龙会滩，凭险驻守，在此情势下，我方也不敢冒进，遂于距龙会滩约5华里的周家屋宿营驻守，伺机进击，犹此相持数天之后，王定中通过当地人士出面周旋，提出愿与我方谈判，尹辉同志考虑后，商定由邹与杨大鹏出面接谈，邹、王约定双方不带武器，在峦山河边一中间地段进行。会谈中，王对率部来峦山骚扰表示歉意，要求撤回放他们逃生，我方让出一条道路让他们撤走，并以身家性命保证今后不派一兵一卒侵犯游击区。邹则严厉提出，条件只有一个，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个人财物准其带走，不许讨价还价。王最后说：“全部缴械，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要去和大家商量再作答复”。王回去后竟扬言，要缴械投降没那么容易，硬要强来我放一把火烧毁峦山来个玉石俱焚。并趁我戒备不严，另择一条小道经香山仙一线，撤离峦山。

第三次杉山冲战斗。6月中旬某天，我们得到情报，匪首邓戈率一个中队窜到杉山冲，企图抢粮并迫害革命人士家属。我们立即派部队分成两路，一路由杨大鹏、贺达等率领，向匪徒盘踞的房子前门唯一的山径攻击前进，另一路由邹带队截断后门围攻，来个两面夹击。当邹带队到达房子后面山地时，被敌哨兵发现鸣枪示警。邹即命部队散开形成包围圈，并发动进攻，匪徒纷向前面高山攀登逃跑。打了约20分钟，始终听不到杨部枪声接应，又因所带人枪不多，无力向前面高山仰攻追歼，便分成两组互相掩护撤出战场。事后只听说匪首邓戈腿部被击伤。这次由于配合不好失去战机，只对杨、贺无命先撤，给予严肃批评。

我部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由于人生地疏，情况复杂，加之新兵较多，武器不足，指挥员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因而未能获得战果。但是，我们毕竟把攸东地区的反动武装全部逐出山区，并不敢随意侵扰，这对于稳定当时局势、安定人心，为攸县地下党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还是尽了我们一份力量。同时，我们起义进入山区后，能够站稳脚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并使部队逐渐发展壮大，这主要是攸县地下党的领导、指挥。

后期的几次战斗收获

6月下旬，我们为了扩大游击范围并使部队有所发展，经与曹伟如同志商定并征得攸县党组织同意，除攸县地下党驻部人员及其所属第4中队外，其余队伍全部转移到萍西、醴南及靠近攸、醴公路一带，在曹伟如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我们吸取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重视情报搜集，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对敌加强攻势，获得一定战果。

第一仗，我们获悉萍西牌上、醴南明月乡的反动武装是卡住我部进行醴、攸活动的障碍，决定由谭源育、杨大鹏两位同志负责拔除这两颗钉子。他们对实力较强的牌上乡，采取长夜奔袭，于黎明时一举突入乡公所，那些乡丁尚在梦中，武器全被夺下，乡长欧某在室内惊醒想持枪反抗，被当场击毙，余未伤人，共夺得长短枪50余支、手榴弹数10枚。对武器较少的明月乡，杨大鹏只带便衣武装8名，趁是日当地逢墟期，化装赶集农民，进入墟场观察动静，等到黄昏前散场时，一下冲入乡公所，乡长彭身先正浴后躺在椅上纳凉，一枪击中其腿部，其余乡丁纷纷从后门逃走，缴获步枪10余支、手枪一支。这两次突袭成功，鼓舞了战士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第二次，据各方反映和侦察所得，离东桥七、八华里的山

窝里，有座地主庄园，主人陈某任过国民党师长，离职后回乡广置田产，称霸一方，还有装备精良的护院队，随后看到形势紧张，将护院队解散把枪埋藏地下。对此，我们先礼后兵，先派员写信促其交出武器，保证他全家生命财产安全。陈置之不理，并带家属躲到山上亲戚家中。我们即派部队包围庄园，并收集柴草堆放四周，警告他如不缴出武器，即烧毁庄园并捉拿本人惩处。陈迫于形势，只好派管家出面表示愿意交枪，要求不烧房子并保障他主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同意后，来人带同我部人员在后花园的两个地洞内起出手提机枪、花机枪4挺，完好步枪60多支，日式王八匣子手枪2支、战刀2把及一些手榴弹。我们履行诺言，给他们写了收缴枪支证明。

第三次，萍西草市警察队，武装完备，气势嚣张，我部抵达当地后，即撤出驻地东躲西藏，避免打击。我们派便衣暗中紧紧盯住其行动，某天傍晚，便衣回报，该队当晚在距草市10多华里的一个山窝房子内住宿，通往房子的山径上，有警察一班设下哨卡。决定由邹带队于后半夜进行奔袭，部队于拂晓到达离敌住房约一华里处停下，选出10名作战勇敢的战士，携带短枪悄悄摸进敌军哨所，未放一枪即将哨卡全部武装夺下，大队跑步赶到房子四周山头团团包围，用冲锋枪向房子内打了两梭子弹，使用话筒高喊“缴枪不杀”。警察队长唐某自知身陷重围，无法抵抗，本人出面表示缴械投降，当令其把全部枪支搬出门外堆放，计有：捷克式轻机枪1挺，步枪5支（包括哨所夺获的）驳壳枪、手枪各1支。我们照样发给收枪证明。

第四次，属于萍西的白竹山地区，有一股原为惯匪、后又演变为区乡所属的反动武装，平日为非作恶，为人民所痛恨。我们派黄鹤汀、杨大鹏两同志带队乘夜奔袭，围攻匪徒盘踞的村寨，同时宣传党的缴枪不杀、可得优待的宽大政策。其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匪部已成惊弓之鸟，又看到我们的火力强

大，不敢进行抵抗，提出缴枪保全身家的要求，结果他们交出长、短枪 150 余支，这是我部在战斗中缴获最多的一次。当地山区群众见我们除掉了这股地头蛇，欢欣鼓舞，部队下山时纷纷带着花生、红薯、鸡蛋等土产前来慰问。

这时，醴陵城已经解放，曹伟如同志要去长沙向省工委汇报并请示安置部队问题，邹派两个便衣武装护送他到醴陵城附近。在这一阶段曹伟如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开展活动，他不但为部队牢牢掌握斗争的方向，而且用大部分时间深入连队，与干部战士共甘苦，同吃同住，上政治课和个别谈心，讲解当前形势和革命的道理，以启发其阶级觉悟与爱国心，对稳定军心、提高士气起了决定性作用，获得了指战员们的衷心爱戴。

曹伟如同志离部队第二天，我们决定派谭源育同志率两个中队并集中大部自动武器，对敌军在清水江的一个据点进行了一次强攻。据点内国民党58军鲁道源部派一个有2挺重机枪的加强连驻守，经过整天激战，黄昏时才迫其仓惶撤出据点，在追击中把担任后卫掩护的一个班歼灭，击毙敌兵3名，缴获步枪12支，俘虏9人当场释放。此役我攸县籍战士谭乃仔，被敌弹击中壮烈牺牲，班长朱荣身负轻伤。当晚邹率部队开到清水江附近，当地铁肩中学的张校长和朱资元老师来部慰问。张、朱两位先生思想进步，对我部进出游击区的往来人员加以妥善掩护并提供食宿方便。

最后的一次伏击战斗，大约是7月28或29日，我们住在荆塘铺附近一带，因连月来奔袭作战，部队已很疲劳，准备在此稍事休整并会餐一次。当天中午我们正去午睡，派出去侦察的两个便衣先后跑来报告说，他们看到从界上坪方向开来武装齐备的大部队，向草市、东桥及清水江两处行进，不知是什么部队？邹即指出，解放军戴的军帽是红五星帽徽，国民党军戴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帽徽，令其速去弄清情况回报。但心中感

到不安，又派人通知各队立即拉到村后山上树林中隐蔽，如有敌情即以排班为单位速向东桥大山对面有几棵大樟树的山头靠拢，届时司令部将转移到该地指挥。不一会，我荆塘铺排哨三个战士押着两个俘虏兵来到司令部，经审讯得知，开来的大部队是桂系46军，该军奉白崇禧命令，作为右纵队经萍乡、浏阳向长沙举行全面反攻。我们命各队按原定指挥决定火速行动，司令部也很快转移到原约定的地点掩蔽好。这时，看到山下前面的大道上密密麻麻的步兵、炮兵，过了一批稍停又过一批，随后是辎重部队，足足过了将近三个钟头。此时我们占据的山头，与对面东桥大山是相隔宽度约600公尺的开阔平地，中有一条可以徒涉的小河，必须通过这一地段，登上对面大山，才有避免被歼灭的威力。邹判断敌大部队已经过完，后面只有落伍散兵和运输大队，可能还有一支不大的收容断后部队，即命杨大鹏同志带武工队进入山下大道上有十几家铺子的小街上埋伏，凡落伍散兵和运输队通令卸下武器物资，不准鸣枪，以免惊动前面敌军；命黄鹤汀同志带一个中队，进到离小街几百米处择险布置阵地，看到断后武装部队坚决阻击，一定顶住半个小时，掩护大部队通过开阔地段后，杨大鹏抓住机会撤上大山。他们出发后不久，大道上已无敌踪，估计正在执行计划。邹即令部队跑步通过开阔平地，登上对面大山。先到部队立即布置阵地向草市、东桥方向警戒，迨邹最后登上大山几十米的一个山头时见几个武工队员带着缴获的枪支、电台等爬上山来报告说，他们解决了敌人一个通讯连和一个运输连，俘虏了近200名敌兵关在屋子内，收缴的武器物资也不少。当即派了几十名徒手战士帮助武工队把所有缴获武器全部搬上山来，随令部队继续爬上半山腰分开掩蔽休息，不久黄也带部队安全回到山上。此役我们在距敌主力约3华里的眼皮底下，仅用一个小时左右，不但使部队脱离险境，还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两个后

勤连，缴获长短枪近70支，30门总机以下的电话机20余部及一批军用物资，打了最后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当敌人得知其后尾部队遭到截击被歼，感到震惊恼怒，竟彻夜对东桥大山盲目地鸣枪炮击，意在示威，实为壮胆。第二天不知何故，敌军全部又循原路匆匆撤退，我们派出精悍小分队紧紧跟踪，采取截尾子、摸哨等办法，又陆续搞回步枪40多支。

由于我们屡获胜仗，武器增加，附近农民和青年学生纷纷前来参军，先后成立了3个中队，编为第2大队，派杨大鹏兼任大队长。这时，部队已发展到约900人，长短枪近700支。我们也得到了消息，原属“湘纵”番号下的第4中队在攸县地下党和贺潮楚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已扩编为攸县人民警卫大队，在战斗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一支拥有300人枪左右的武装力量。随后我们转移到清水江东岸的几个村庄住下休整，并护守横跨江上的一座三孔大桥，为尔后由萍乡进军的解放军136师的炮兵辎重顺利通过提供了条件，受到该师领导的表扬。

战胜艰危 迎接解放

我们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游击区中，坚持武装斗争3个多月，处境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都怀有一颗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带领全体指战员，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比如我们初进游击区时，就有邹、谭的旧上司、同事刘××、易德钧、何济元等人先后派人持信来部队，许以高官，给以银元、武器，要求合作或听其指挥，他们对这些引诱毫不动摇，当众烧毁来信，严厉斥退来人，表现了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的态度。又如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整个战斗期间仅发过一次五角银元的津贴费，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生活艰苦可想而知，除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外，从司令员到战士同吃同住，同等待遇，没有特殊，谢

枝先同志，为了部队的一日三餐和一些必要开支，精打细算，呕尽心血。医药方面，喻约翰同志动员他开西药店的父亲，拿出一批药品无偿捐献部队，他还带人采集中药材，为指战员治疗伤病。负责人以身作则的精神，谢、喻等一心为革命的可贵表现，使指战员们深受感动，因而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拼搏，生活艰苦能咬紧牙关忍受，从无怨言。整个斗争期间，除有一个干部因家事请假未归队外，其他人没有脱离部队。我们还严格执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政策，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准干扰人民安宁和调戏妇女，未向任何人、地摊派过钱粮，博得了广大人民的好评与支援。我们部队能够坚持斗争到底，迎接胜利解放，是党的正确领导，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

奉命整编完成使命

自曹伟如同志离部以后，邹感到部队没有党的领导人心中无主，草市伏击战刚一结束，即派谭源育同志星夜赶去醴陵城，请曹回部队。谭见到曹后，随他先后会见了醴陵地下县工委孟树德同志和解放军118师政治部刘镇华主任，汇报了部队情况。因曹急去长沙，刘主任派了4名干部随谭回到清水江部队指导工作。5月上旬，我部奉命随118师向南进军，担任左翼侦察，掩护及发动民伕抬运担架等任务，解放军在皇图岭与敌军打了一仗，我部未参战。随后进军到离攸县城5华里的接官亭住宿两晚，刘镇华主任邀我们几个负责人到政治部，出示湖南军区肖劲光司令员转来的电令，内容大致如下：湘东纵队由邹司令员率领开赴岳阳接受长沙军分区整编……我们应刘主任要求，选出了二、三十名青年学生，参加该师充任文化教员和文工团员。旋即率部队开回醴陵，因醴陵渌江铁桥已炸毁不通火车，部队徒步开赴岳阳实有困难。只好留住醴城南郊

待命，由醴陵人民政府负责供给。当时醴陵刚刚解放，供应紧张，加以我部战士多数为本地人，都盼望早日得到安置或允许其回家生产。邹将情况向张超县长汇报，由张县长请示当时驻醴陵南部休整的解放军133师领导同意，命我们开赴泗汾，由该师将我部的被服装具补给一新，并按解放军待遇供应，并发了湖南和平解放奖金两块银元。又派了一批干部进入各队任指导员、政治干事、副队长来帮助进行整训。9月12日，师政治部肖泽西副主任由师部来到泗汾，邀请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和当地驻军团长、政委开会，出示军区发来的“湘东纵队就近编入人民解放军133师”的电令。肖主任指出：“湘纵”是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坚持对敌斗争几个月是有贡献的。但他们在频繁战斗中未经系统学习改造，而我部开拔在即，没有时间编成整营整连集中整训，只好把战士分散编到我军连队，以老带新，随军学习。各级干部愿参军的进师教导队学习3个月，后按原职分配工作，不愿参军的发给起义证明资遣回乡生产。军需、医务人员毋须受训，即按原职安排。几位主要负责人，省军区指示由师派车送到长沙军分区听候安置。并问我们有无其他意见和要求，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会后泗汾街头到处张贴“欢迎游击队升为主力”“欢迎湘东纵队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横幅标语，在泗汾郊外广场集合双方部队，举行整编仪式。首先由肖副主任宣读军区整编电令和事先拟好的整编方式和办法。接着由邹继衍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指出，“湘东纵队”得以编入人民解放军，是全体指战员的无上光荣，勉励大家努力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提高觉悟，增强本领，为解放全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旋即接收单位将分配的战士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迎到连队。至此，我们完成了起义、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

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始末

胡耀福 陈新明*

形 势 逼 人

1948年除夕前夜，浏阳文家市有三个游子从远方归来，他们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陈世计、佩戴国民党军上校领章的南京绥靖总队独立支队副支队长陈克（支队长为郭晖日）、国民党军上尉陈闻亮。

当时本文作者陈新明只有16岁，在陈克的大哥陈闻朴家做长工。陈克回来就住在他大哥家里。

当天晚上，在烤火房里陈家十几口人闲谈，他大哥说：“兵荒马乱的年月，今天总算大小到齐团聚过年，但目前时局动荡，我时运不济，这几年灾祸不断、生活艰难。今年，我的两个儿子患白喉病不到一个月都死去了，你嫂子一气成病，口吐鲜血，半年没起床了。我当保长，脚路算宽的，可是一担多谷一付的药，有钱还没得货买。”四弟闻倬接着说：“好汉难糊三口，现在五个伢子，七个人吃，嘴巴连起来象皮撮口一般宽，顾得吃就顾不得穿，好比落雨天担秆越担越重。”老五说：“我是靠扁担肩膀卖力气，从黄茅买点米到澄潭江去卖，搞得不好，本都失了。这个鬼世道，难啊！”老六说：“我是面朝泥巴背朝天，一年难混一年。”一连串的诉苦声使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心沉重起来。他说：“我误入迷途，虽立志报国为民，谁知国民党却祸国殃民。部队也是一片埋怨声，说什么有

*胡耀福当时系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大队长；陈新明当时系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通讯员。

家难安身。”正在这时，随同他回家的陈闻亮登门拜访。陈克问闻亮的哥哥可好？闻亮摇摇说：“年不好过呀！家兄行医开药店，由于货币贬值，面临倒店危险。”闻朴插话说：“现在是一片怨声，不少过去参加过红军没有北上的人，又开始在议论要学民国16年那样来一个暴动革命。”

陈克与闻亮私议，做好郭晖日的工作，把队伍带到湘赣边界来一个拖抢投诚起义。

正月初10，文家市杨树下的陈清源请春酒，陈克、陈世计、陈闻亮都是座上客。此外还请了陈闻肖、陈世咸、陈世爱、彭谷人、周成芝、蔺传怀、曾省三、陈闻葭、陈时铭、蔺传裕等人作陪。席间，陈清源恭敬地说：“今天各位知心朋友欢聚一起，想听听外面回来的讲讲时局究竟如何发展？好有个准备。”陈闻亮了解入席者各个人的底细，就坦率地说起来：

“依我看，国民党是没有搞手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已结束，傅作义这样子的大官都起义了，人心惶惶，军队里一些当官的各自在打主意找出路。”陈世计插话说：“在座的不少是老前辈，在民国16年跟共产党干过事的，依我看，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国民党已失民心，垮台是无疑的。”陈闻亮又接着说：听说湖南有个姜亚勋，过去是国民党军队中当官的，现在他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在湖南搞地下武装，很有名。”这时陈闻葭

（中共地下党员，在座的谁也不知）说：“你们也可以把部队调到湘赣来学姜亚勋嘛！”陈世计说：“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姜亚勋在湖南可称一俊杰，蔺乡长你认为怎样呢？”这时大家都注视着这个身居乡长的蔺传裕。陈世计这一将军，蔺传裕不得不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各位年长见闻广，说得有理，我蔺某受民之托担任乡长，面对现实却无能为力。在座的如谷人先生是共产党原先的要人，一旦国民党垮台，还得大家关照。蔺某不敢自充俊杰，但愿做一个识时务者。我尽管

做过一些错事，为国民党效过劳，但今后立功赎罪。如果有一支部队能安定家乡，免遭战火之灾，亦乡民之幸也。” 蔺传裕的话，入席者心照不宣。

秘密筹划

1949年正月下旬，文家市下沙溪陈高卿的老伴死了，他那个做花炮生意发了财的儿子陈闻渥（又名匡华）从香港回来悼念亡母，奠祭7天，轰动了周围百余里。陈克、陈闻朴、陈闻亮、陈世计、陈闻肖等人利用帮助办理丧事的机会于正月26日晚上就在他家楼上召开了第一次秘密会议。由陈世计、陈闻亮主持，参加者有陈闻斌、陈闻肖、陈闻朴、陈克、陈闻隆、陈绍衡、陈闻喜、陈闻赋、杨国屏、陈典芦、陈典春、陈建筑等人。会上由陈世计和陈闻亮分别讲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形势，共同研究了四件事情：

一、推举陈世计负责寻求党的组织关系，动员陈清源、彭谷人做好乡长蔺传裕的工作。陈闻亮指派陈建筑利用关系打入警察所以便掌握国民党当局的行动。

二、陈克与陈闻亮回部队，争取郭晖日把部队拉到湘赣边界开展武装斗争。

三、以合法身份组织农民夜校，动员农民参加学习，进行时事教育和组织发动。

四、春荒在即，组织好供应缺粮的人，以乡、保、甲名义组织春荒会，动员各大姓的社会积谷开仓济贫。陈姓积谷推举陈绍衡、陈闻喜二人去做好族长陈昌裴的工作，开仓济贫。

正月29日，陈克、陈闻亮返回部队做策反工作。当时淮海战役已结束，征得郭晖日同意将部队从南京开出，经苏、杭正欲往江西来，忽接上峰急令开宁波待命。情况突变，陈克要陈闻亮回文家市与陈世计联系，只能靠发动当地群众自建武装，

并说，“部队虽开不回去，但起义决心已定。”果然，这支部队于4月19日在宁波起义，接受第三野战军改编。陈克在当年冬持起义证书回乡被安排在必达小学任教。

宣传发动

陈世计于古历正月开始寻找地下党组织。一天，他去江西上栗市舅父家，正好遇见在萍乡的同学廖祖文。二人促膝谈心，廖当时也在寻找党组织。廖祖文在曾民族那里借到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深夜交给陈世计看。次日，廖对陈说：“开办民众夜校同群众作宣传的办法很好。”陈世计满以为廖就是党组织接头人而感到高兴，自然是听从了。第三天回到文家市即找进步教师陈益珊、蔺常人、周家纯、陈闻鹏等，商议以柏树下的泉江小学为试点，开办农民夜校。夜校办成功了，以后逐步扩大到文家市里仁、严家滩的杜滩、下溪的必达、楼前的上达等学校。不到一个月，参加农民夜校学习的达2500人。3月初，陈闻亮从杭州回来，召集担任夜校的老师在下沙溪大王庙、石灰冲、下元冲的老石灰窑的料洞里开会，以亲身经历的事实作了形势教育的宣传，并布置在夜校中进行串连。农民夜校很快普及到了兴德、时仁、储平三个乡，人数增至3000。

3月7日，在南铺园肖先定家，陈世计、陈闻亮等10余人密会，决定将夜校中的坚定分子组成“湘赣边区人民自救解放队”。陈世计化名胡克负责政治宣传组织工作，陈闻亮化名陈非任队长，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另外，陈非与陈润朴负责下沙溪黄坊殿、陈润朴负责大坪、彭谷人负责文家市、陈世计负责柏树下，刘裔铭负责文家市以上至五神岭，余代模负责五神岭以上的宣传发动工作。

寻找领导

3月上旬，陈世计再次去廖祖文家，由廖安排陈住在曾民族家中。陈世计向廖、曾二人汇报了组建“湘赣边区人民自救解放队”的情况。廖、曾二人说好，于是三人共同拟定了入队誓词，内容是：我志愿参加解放队，不辞艰苦、不怕牺牲，同艰苦、共患难，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到底。”曾民族表示江西萍乡与文家市交界的楚山、湖塘、花园由他负责，陈世计负责浏阳县境内，共树一块招牌。队印由陈世计掌管，决定在上栗市杨开智家秘密刻一颗“湘赣边区人民自救解放队”的公章，在湘赣边界建立一支武装。

陈世计回浏阳后不久，由廖祖文介绍去醴陵湘东中学找肖项平老师。肖项平诉说了自己的心情和组建解放队的情况。肖项平原是陈的中学老师，经过对陈考查，肖即将陈世计的要求直接汇报给住在李传文老师家的孟树德同志（中共湖南省工委成员、周礼同志委派在醴陵萍乡一带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次日，孟树德同志化名刘朗直接与陈世计见面。陈世计向他们汇报了文家市一带和同江西接界的一些地方已组织农民成立了“湘赣边区人民自救解放队”，要求地下党派人去领导。肖项平征得孟树德的同意，吸收陈世计入党，又向陈谈了目前形势、任务和建党对象应具备的条件，叫他回去继续办农民夜校，秘密组织工农群众，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搞平粜。在工农和贫苦知识分子中物色对象培养入党，建立党支部。有条件就建立地方武装，任务是：镇压顽固的反动派，掌握地方武装，防止反动分子拖枪上山搞破坏。文家市的“湘赣边区人民自救解放队”改名叫“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不打解放军的牌子，还写了一份入党誓词交陈世计带回去，委派陈世计为文家市的党支部书记。

陈世计回到文家市后，随即发展了陈世咸、蔺常禧、余代谟、陈时铭、陈闻肖、刘裔铭、陈非、陈清源、彭谷仁、周成芝、蔺常吾入党，然后决定分地域先行扩展解放队员，又在队员中选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的分批吸收入党，还规定不准发生横向联系。入党的同志每人由介绍人发一本油印编号的党章作为内部标记。

“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作为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又是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展开了工作。

建立队伍

4月底，肖项平受组织委派化名姓李的老师来到陈世计家，当晚在泉江小学召开了第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世计、陈非、陈时铭、陈闻隆、蔺常仁等，共同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动态：

一是反动当权者，如孙友颂、吴干芝、蔺传珊等，大革命失败后杀我红军及其家属最多，民愤极大，他们勾结乡队附刘世喜策划对抗解放。

二是一般反动头目，迫于形势开始靠拢革命群众，如兴德乡长蔺传裕、时仁乡长吴唐纹等。

三是一般胁从者，见快解放了，想寻找出路，大多愿回头转向革命。如兴德乡自卫队班长陈金南、时仁乡的赖田仓、储平乡的曾维敏等在任职期内抓壮丁、派捐税得罪不少人，现在愿意投靠人民，将功折罪。

四是文家市一带在大革命时期未能跟上红军走，在白色恐怖下自新自首过的人，如彭谷人、陈清源、刘世喜、蔺常吾等人，是能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

五是贫苦农民，家中人口多，迫于生活困难，又怕反动派

的镇压，还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和顾虑。

针对这些情况，确定参加“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的成员以四·三·二种态度的人占多数。肖项平认为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肖项平代表组织决定建立“中共文家市工委”，指派陈世计为工委书记、陈楚平为组织委员。余代模为宣传委员、刘裔铭为联络委员、陈非为武装兼统战委员。并决定陈世计加入会党（圈子）、余代模加入了民主同盟、陈益珊加入青年学生联谊会，以便更多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开展工作。

5月初，解放队员发展到800多人，由蔺常仁和陈世威经手，分片指定队员向当地开明的殷实户募捐资金，每户最多不超过2块银元。违者要受批评，队员陈典节向陈闻述募捐2元，结果陈典节收他4元，上交时挨了批评，并令他退还多收的2元。先后共募捐了20多元作为宣传费用，买了一部油印机、钢板、纸张。内部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土地法大纲》；对外印发了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告农友书》、《告民主人士书》、《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书》和《告友军书》，并书写了千余份“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实现耕者有其田”、“反对征粮、征税、征兵”等标语。

5月6日晚上，在肖功锡家中，陈世计、陈非召开了一次中队干部会议，陈非讲了形势的发展，并统一了如下行动纲领：

第一、正式宣布成立“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陈世计任政委、陈非任队长，下设几个大队：文家市大队辖兴都乡由陈非兼任大队长，时仁大队辖时仁乡由胡耀福任大队长、储平大队辖储平乡由周思文任大队长。

大队下设区队、中队、小队或分队，按地区人数确定组成。

文家市大队任命陶常禧、刘裔铭、陈闻隆、陈闻朴、李友谋、邱堪鉴为区队长。

时仁大队任命黎尚龙、吴唐纹、杨显凡、吴书端为区队长。

储平大队任命张声才、李孝晃、姚礼蕉为区队长。

第二、决定建立通讯联络点，县城以彭家喧为驻县情报员，以梅花巷炮竹作坊曾庆晃家为秘密情报点（以上情况只有两人知道，会上没有指出人名和地点）。澄潭江以医师陶澍钦开的食品铺为联络点，文家市以九洲山五口塘大王庙王星初家和邱堪鉴家为秘密联络点。县城有什么情况由彭家喧发出，逐站星夜传递。

第三、在建立白溪、云山一带根据地。由陈非亲自去考察地形，由余代模、刘裔铭做好发动山区群众的工作。批准卖杂货的黄均启入党，到山区具体负责。

第四、派陈闻斌负责做好他妹夫杨国屏的工作（杨在时仁粮仓任保管），安插儿子陈典桃当助理，掌握500担谷作为军需用。

第五、修好交通要道，准备迎接解放军过路，互换写好的标语，统一在一个晚上张贴。

5月10日，在方圆百余里的地方只用半个夜晚就在各交通要道上贴出了红、绿、白色的标语和《告农友书》《告民主人士书》、《告友军书》等。“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这个组织的名称第一次公开了。张崇烈、张象轩把标语放到食品包内，彭家喧在县里也散发了《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书》。

5月20日，肖项平在江西上栗市的一个学校里传达省工委5月的指示，肖项平强调在农村要放手发动群众，搞人搞枪，建立和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以便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湖南，并在解放大军继续前进消灭敌人主力时，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有

党组织的地方可搞武工队，也可搞革命的两面政权，派人去当乡长，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归我们控制，让我们的人去掌握乡公所的枪和控制敌人的动向。同时宣布建立萍、浏、醴工委，陈世计任工委书记，金刚何继奇支部划归工委领导，金刚支部派何屏为解放队大队长掌握武装，一并划入工委领导。

会后，文家市大队决定派蔺常吾到兴德乡公所当兵，派陈世计做好班长陈金兰的工作。时仁大队派黎尚龙以同乡的关系做好吴唐纹、张功裘的工作，因为吴、张二人曾在该区任过乡长，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布置地下党员易修兴与时仁乡公所自卫班长赖田仓结拜盟兄弟到自卫队去当兵。储平大队由党员陶澍钦、彭昭潜负责做好储平乡公所自卫队班长曾维敏的策反工作，金刚支部书记何继奇见何屏在东北法库被解放军俘获经教育资遣回来后，对人民解放军有一定认识，又会使用武器，报请肖项平同意吸收为党员让他担任解放队的队长。何屏以国民党军暂编62师少校的身份在当地公开成立“联防指挥办事处”。不几天，就收缴了长枪6支、短枪3支，并掌握了乡公所16支步枪。消息传到文家市，陈世计与陈非感到抓枪杆的很重要，当他们得知浏阳县警察局和田粮处起义，县长星夜弃职逃跑成立了自救会的消息后，6月2日晚上陈世计、陈非决意找乡长蔺传裕召开会议，拟实行和平夺枪建立政权。6月3日由蔺传裕召开乡、保及地方各阶层人士会议，解放队的负责作为社会人士身份参加。蔺传裕说：“县政府的唐县长走了，警察局和粮田处起义了，我们兴德乡也应效法县里的样子成立一个自救会来行使职权，本人愿意退出为桑梓效劳。今请诸位同仁商议，本乡枪支应交作维持地方治安之用。”与会者一致同意，并推举余代桓为兴德乡自救会主任，陈非为武装委员会主任（意在取代乡队附刘世喜的职权），蔺传怀为财政委员，邱堪鉴为庶务。刘世喜却拒绝地说：“没有县政府的明文指示，杀

头也不交出武器。”为了避免过早暴露，没有强迫刘世喜立即交出武器，但强调一条：“乡、保的武器只能维持地方秩序，应归属于乡公所自救会的领导，动用武器必须经批准。”原计划以自救会的名义夺取武器没有成功，但自救会向各保余粮户筹借了500担谷救济了贫困户。

为了贯彻省工委，关于发动群众、放手搞人搞枪的五月指示精神，解放队领导决定要陈清源以兴德乡民代表会主席的身份，召开全乡贤达人士成立一个“集贤会”。会上陈清源讲了当前形势，要求大家安定人心，不要轻信谣言，不许做贼行盗，要安守本份，否则应以族规处置。

5月底，陈益珊联合蔺爱珍在里仁学校成立了青年联谊会，陈世计、周家纯、陈世咸、蔺常禧都参加了。陈世计讲了话，号召大家认清形势，与会者近百人推选陈益珊为会长，下设组织、宣传、文艺三股，作为团结青年教师和回乡学生的群众组织，背地里则发动他们做好迎接解放的宣传。

金刚支部何继奇、刘良汉向刘建峰透露：“解放的日子不久了，要他团结一些可以团结的人做好迎解的准备。”刘建峰从5月15日开始筹备，6月24日在当地武圣庙成立了“精诚社”。参加的地下党员有刘良汉、胡征丙等近30人。他们对天盟誓：“自愿参加结诚社，效法五祖，秉着桃园之谊与诸同仁结成新生，彼此相亲、互助互让，如有负道忘情，天神共鉴。”这个“精诚社”为解放队的外围组织。

6月初，焦达梯代浏阳县长，派谭菊秋为南区联防所主任，统管南区乡、保武装。谭任陈建筑为副主任，陈非同意陈建筑出任，以便掌握全区武装和动态。

由于全面贯彻省工委5月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党组织和解放队主要负责人都安插到各种机构中去了。7月2日浏阳县政府被韩蒙轩所逼，要查办6月19日时仁抢枪抢粮事件，派出县自

卫队常备队贺敏、陶国森两个中队侦缉。陈建筑以南区联防指挥所副主任的职务先得到消息，随即密告陈世计、陈非。

贺敏、陶国森两部到大瑶洲，陈建筑配合前往。7月3日在时仁七级坳围杆树下将抢劫时仁乡枪支首犯张祖柏击毙。解放队的人枪未受损失。

夺取武器

何屏公开成立“联防指挥办事处”，几天时间就搞到了25支枪。陈世计因考虑当时敌强我弱还不同意马上建立武工队，但在6月3日成立兴德乡自救会时下定决心要把各乡、保的武器控制和收集起来分散保存。

时仁大队黄均启区队7中队长汤商招，在白溪收缴了逃兵的一支步枪。黎尚龙、张功裘商议决定把时仁乡队附彭凌的一支二号驳壳枪搞到手，由张功裘出面找时仁乡公所的文书记和户籍张文乾、张松文和自卫队班长赖田仓，以彭凌不是本地人群众要赶走他，并以他平时仗势欺人等这样一些事情进行挑动。一天，趁彭队附洗澡，张文乾将枪偷到手，随即送到黎尚周家，黎尚周立即送交了黎尚农。彭凌的手枪丢了，报告到县里，彭被撤职调回县里反省处分。派进去的易修兴和赖田仓等人将乡政府30多支枪逐支进行检查，把好的给可靠的人掌握，一遇情况将枪栓卸下密藏起来。彭队附受处分调离，乡长张功统又管不了武装。这一消息被文家市的张祖柏、李华凤、甘恩僧等人知道后，他们在6月19日进行劫枪，因事发仓促，易修兴等人赶紧将好枪藏好，留下的18支不好的枪被张祖柏等人抢去。晚上张功裘、吴唐纹等立即要易修兴等人把留下的18支好枪由张文理带领转移到唐家冲陈绍鱼家里，埋在天心台内。

7月1日，陈世计得到陈建筑的情报，县政府派两个中队查办时仁乡丢枪事件，当即由陈世计、陈非分两路从河日冲、陈

家冲赶到胡耀福和吴唐纹家。派出下沙溪陈文喜中队的40多个得力队员，由陈文喜领队分散在简家湾吴唐纹家附近，约好信号：布置好后，在围墙外往内丢一石头引起狗叫就有人开门一切按计划行事，从陈绍鱼家里天心台上取出枪支，当即用楼板钉成箱子装好，转移到下沙溪的钩钳岩陈典春家中后面的红薯窖里。7月2日，贺敏、陶国森的队伍进入冲。因怕他们搜山，到3日上午，将枪秘密分散到10多个可靠的队员保藏。

6月19日，时仁乡公所枪被劫后，黎尚农在山枣溪的三保黎光荣、肖劲流、四保的甘德义等5个原来当保长的家里收集了5支步枪、1支马枪和2箱子弹，在区队建立了一个武工队，队员有甘伯轩、张功伦、黎先人、蒋能耕、刘福章、黎宗升等人。通过甘伯轩等人又搞到了5支旧枪。

7月3日，陈建筑随同贺敏、陶国森队伍撤走后，陈世计、陈非等人决定要把兴德乡的枪夺过来。因为余代模得知刘世喜已投靠了江西张铁樵，欲将枪支交给张部。7月6日找乡长蔺传裕谈话，限他10天之内动员刘世喜把枪支全部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同时向蔺传裕交底：解放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张铁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希望好自为之。蔺答应将枪交给解放队，要求莫杀人。陈非向蔺传裕发出最后通牒，解放队也作了监视蔺传裕、刘世喜的布置，并派蔺常吾到蔺传裕家传达意见。午后，蔺传裕回到乡公所，陈非等以自卫会武装主任名义坐在乡公所，蔺传裕将枪支交出，计收缴步枪53支、手枪2支、子弹若干，由陈时铭带领的武工队取走。陈非将写好了的“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接管兴德乡全部武装的布告贴在文家市街上，宣布成立兴德乡工作委员会，由吴千阡为主任，蔺传裕为副主任。原有乡、保人员除刘世喜免职外，愿工作者一律留任，但必须听从解放队和工作委员会的安排，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刘世喜自知无力反抗，只好空手回去了。未响一枪，

未伤一人，枪转到了解放队员手中。

迎 接 解 放

7月16日，“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接管了兴德乡政权后，陈非、陈世计、蔺常吾、陈时铭等带领100多名队员开往白马冲，探索有无反扑情况。当晚传来情报，解放军五兵团杨勇部先遣队进入江西慈溪。文家市工委当即开会决定：一是派刘世善、韩文华、邱绿耀、甘厚文4人持介绍信去江西迎接解放军，请求派部队路过文家市以安定人心；二是加强兴德乡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力量，加派黄隆文为副主任、彭家禧为武装委员、陈闻赋管生产、彭传育管青年、刘世新管宣传、何维春管组织、刘叔贞管妇女，分工负责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

17日傍晚，刘世善、韩文华、邱绿耀、甘厚文在慈溪余家坊的陈家祠堂找到了解放军，部队领导对他们前来充当向导十分高兴，特意叫炊事班作饭表示慰问。4人通夜没合眼，计算着是从余家坊经花园走黄花冲，还是从铁山界经岩前走槐花墩出五神岭，这两条路那条路既近又安全，他们争论不休。第二天清晨，部队领导把他们找来说：“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看你们有4个人，我们就分两路走，你们也分成两路，会师在文家市吧。”韩文华、刘世善领队从余家坊出发经花园六保的碉堡时，忽然堡内放出一枪，打伤一匹马，刘世善大喊：“那一个狗养的敢打枪，有种的就出来送死。”韩文华接着喊：“有种的出来投降，免得一死，”部队作了还击的准备。碉堡内答话了：“不要打，我们投降。”刘世善冲进碉堡一着，领头的是刘世梨，共11个人，刘世善见到刘世梨气得朝他脸上就是一巴掌，口中骂道：“你这瞎了眼的败类”。这时部队的同志急忙制止：“解放军不虐待俘虏，不能打人”。韩文华赶紧插话说：“刚才是打他的老弟，俗话说‘老兄打老

弟无罪’”大家都笑了。

18日下午，文家市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挂上了小红旗，鞭炮声声，话语甜甜地迎接解放军。孩子们欢笑，老人们流下了热泪。时仁大队的大队长听说杨勇带的队伍回来了，一口气跑了20华里赶来。杨勇司令员的两个哥哥硬要请部队首长住到他们家中去。由于部队只是路经此地，解放队的领导人陈非、陈世计决定安排领导机关在里仁学校，部队就地宿营。文家市家家户户蒸好了红米饭，煮好了南瓜汤，香喷喷的饭菜送到部队，通宵达旦地欢腾。第二天部队要出发了，各个宿营地又热闹起来：部队同志吃了饭要给钱，哪一个又肯收呢？一个要给，一个不收，一批又一批告到工委会，陈世计代表工委会向部队首长说：“部队向前进，给养我们保证，一律不收部队的钱，请留个用餐的条子作为今后结算的凭据就行了。”部队领导同意了。

支 援 前 线

1949年7月18日，文家市人民解放了。“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的2,400多队员，在兴德乡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并筹粮支前。下沙溪陈文喜中队在5天时间内就筹集了军米10,000斤，山枣的黎尚农区队买了3头大肥猪送给部队，至28日止，兴德、时仁、储平3个乡就送交军米20万斤、蔬菜10万斤、柴火30万斤给部队，保证了过路部队的给养。当时马料稻草困难，解放队队员割嫩冬茅心代替马料供给部队。

浏阳县人民政府一成立，就通令嘉奖了这些为支援前线日夜奋战的同志。

保 卫 政 权

7月29日，陈世计作为萍、浏、醴边区工委书记和湘赣边

“湘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政委出席了浏阳县人民政府办事处召开的联席会议。陈世计将地下党发展的情况和解放队的活动向驻军首长吴继尧、县委书记徐秉谦、县长赵超山、副县长张国元等作了汇报。

8月1日，浏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上级宣布成立南区办事处，张国元兼主任，李顺义、王执昌为副主任。张国元指示：“湘赣边区人民解放军”的全部武装由陈非带领驻大瑶福音堂一带，改名为南区武工队，负责地方治安保卫工作，陈非任队长，王执昌任政治指导员、蔺常吾为排长、陈时铭为事务长、李友南为文书。没有持枪的解放队队员仍留当地担任治安和支前工作。周家纯任文家市大队大队长，陈世计调县委任团委书记。

8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159师476团留下部分干部奉命组建浏阳县大队，侯占山任大队长，徐秉谦兼政委、贾柱馥任政委。南区武工队改名为浏阳县大队3中队，人员由80多增至150人，拥有步枪100支、轻机枪2挺、手枪2支。

9月底，人员编制为146人，拥有枪支136支，改名为浏阳县大队直属二连，王玉文任连长，郝玉臣任政治指导员，王执昌仍兼政治指导员，陈非调教育科任副科长，胡跃福、周恩文、彭昭潜、周家纯、蔺常仁等中队长以上干部都先后调出工作。“湘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未脱产的同志都按地区按建制改名为防匪自卫队，隶属于各乡支前委员会，承担当地的防匪治安工作，督促支前任务。“湘赣边区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历史使命。

记江南地下军第四军第十师 和师长焦达悌

刘逸秋*

一、焦达悌其人

焦达悌1903年出生于浏阳县绥和乡（现伏龙乡）。其兄焦达峰于清末加入会党，投身革命。领导湖南辛亥起义并担任湖南第一任都督。

焦达悌20岁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25岁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少将侍卫官，他跟蒋介石两年，多次请求他调。1929年冬蒋委派他为浙、苏、皖三省缉私局局长。焦任职两年，改派为89师副旅长。1933年参加了以李济深为首的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下令将他关押了10个月。1940年回湖南先后在9战区司令长官部就任高参兼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军官总队的大队长、长沙绥署参议等职。

二、出任浏阳县县长的前前后后

1949年5月，焦达悌通过湖南省第1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刘华严（又名刘崇），在长沙结识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的“3130”长沙第7总部的军事负责人刘建中，当即表示要与蒋介石一刀两断，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听从军代表的指挥。刘建中即口头委派他为江南地下第4军第10师师长。同年5月，湖南

* 刘逸秋当时系3130长沙第7总部第3小组组长，负责领导江南地下军第4军第10师，同时，又是焦达悌为司令的第1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长。

省政府主席程潜将焦达梯委任为湖南省第1区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于6月1日应允就任。

1949年6月1日，浏阳县警察局长王绳祖和田粮处长黄卫中在浏阳宣布起义，县长唐佑樾逃跑。6月2日上午，程潜召见焦达梯说：“浏阳现在是一个无人管的地方，你是浏阳人，又是你辖区内，你打算怎么办？”焦达梯回答说：“服从颂公调遣。”程潜回答说：“好，岛松（焦达梯的别名），我加派你为浏阳县长。记住，和平是大势所趋，仗是没有打手了，回到家乡，好自为之吧！”又说：“明天我要子良（陈明仁的字）派20名警卫送你到浏阳当你的家乡父母官吧！”

1949年6月5日中午，焦达梯到达浏阳县城，街头巷尾的路卡布满持枪的士兵，城内店铺关闭，县政府内乱糟糟的，尽是军人。焦达梯刚落座，县自卫队总队长邱自明就呈上了报告。

焦达梯看过报告，拿笔批上“存卷”二字交与其子宠昌。随即就问：“现在谁主持县政。”邱自明又从公文夹内搬出一份呈文给焦达梯，上写：

“浏阳县参议会、浏阳县人民自救委员会令代电：

查本县唐县长，警察局王局长先后离职，关于目前治安办法，业经本会召集各机关法团会议议决：

一、推邱议长才镛，张主任委员秉文在焦委员未莅县以前暂行负责。

二、推邱总队附全权指挥自卫队及警察队。

三、推警察局夏科长负责维持警政。

四、自卫队及警察队薪饷，暂由商会负责筹垫，记录在册。”

焦达梯看完上述全文，问邱队长，四乡情况如何？邱自明起立报告：

“东乡官渡驻有陆军126军军部，军长张湘泽坐阵。还有自立旗号的周康候、胡关两支队伍，约500人枪。

西乡有从保安团跑出来的彭志尧一个营，约190余人枪。

北乡有从湘保安8团跑出来的周福吾搜索连，约150余人枪。

南乡则有打着湘鄂赣边区第1纵队张铁樵的队伍经常出入派捐派款。

这些队伍，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老百姓负担极重，怨声四起，请求政府进剿。

焦达梯听了，紧锁眉头站起来，慢步走来走去，仰天长叹一声：“浏阳，家乡啊！城内不安，回乡不宁，难怪颂公称之为‘烂摊子’。愧哉，对不起乡亲父老。”

当晚，焦达梯苦苦思索，决定将西方之队伍收归自己掌握之中，改变四乡为王的混乱局面，遵循颂公“仗是没有打手”的教诲。

6月6日，刘逸秋受“3130”长沙第7总部派遣与吴剑、卢雨三、柳羽到浏阳见焦达梯，焦虽只5月间在长沙与刘逸秋见过一面，但一见如故，待之为上宾，相互坦诚相见。当晚刘将任命焦达梯为江南地下军第10师师长的任命书交与了焦达梯，同时出示了刘逸秋为“3130”长沙第7总部第3小组的组长，焦达梯、吴剑、卢雨三、柳羽为组员。深夜，他们共同作了如下决定：

一、电请颂公委任刘逸秋为1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长，以便掌握情况。

二、改组自卫队，由焦达梯兼任总队长，将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撤换一批不可靠的人。

四、将浏阳县境内的游击武装改编为1区保安司令部直属

队伍，作为地下军第10师的武装力量。刘逸秋负责内外的联络，部队由焦达梯掌握。

于是，6月7日焦达梯改组了浏阳县自卫队，发布自卫总队负责人名单：总队长焦达梯，总队附欧亚南、王俊，少校参谋魏凯、上尉副官载免成、中尉副官许克明、少尉书记官刘莹、谭济宪、唐尚忠，督训员黄剑清、陈炳文、毛长清、田坤、黄建秀、刘善锡、刘绍瑶。

原自卫总队附邱自明调任县府军事科长。

6月8日，程潜同意湖南省第1区保安司令部发布保达人字第13号命令：

派刘逸秋为本部上校参谋长，生效日期民国38年6月6日。

免陈再阳本部少校参谋。

派郭守忠为中校参谋。

升于培基为本部二等军需佐。

这个命令发布后的第二天就引起了白崇禧的怀疑，为什么焦达梯出任浏阳县只两天就提拔一个上校参谋长呢？而对浏阳警察局的“叛逆”200余人尚无行动。白即从夏威夷兵团特工处调来任处长的外甥韩蒙轩率领一个加强团进驻浏阳县城进行监视。6月11日，韩蒙轩要焦部配合进剿逃到北区的“叛警”，以对焦进行考验。焦达梯果断地派出自卫常备中队长邵毅作向导以示配合。另派柳羽向彭汉云、王绳祖暗通消息，告知已派人进剿他们。6月17日，邵毅领的队伍进驻社港的周洛，在芦洞与王绳祖、黄卫中起义队伍遭遇，19日仅追回起义员警24人、收回步枪18支。6月4日，进攻湘东4支队彭汉云部，由于彭汉云与柳羽未曾见过面，虽已知有队伍来围剿，预先作了一些布置，但因仓促应战及其他原因，一大队正、副队长童禡和陈玖牺牲，43人被俘。同日，邵毅领队开往沙市在大桥屯与湘东独立支队刘人奎部相遇，经两小时激战，反而缴获了邵部一些枪支弹

药。

后来，焦达悌回忆说：“在当时，白崇禧坐镇长沙监视程潜，韩蒙轩坐镇浏阳监视我，如不将韩蒙轩带到乡下应付一阵，就会影响全局计划，这叫调虎离山。”

6月14日，浏阳县政府发布命令：

一、派陈树良为东区联防指挥所主任，卜友仁为副主任。

二、派谭菊初为南区联防所主任，陈建筑为副主任。

三、派潘启人为西区联防所主任。

四、派戴伦鉴为北区联防所主任，柳肇仁、徐飘蓬为副主任。

除分令外，并刊发印信一页，仰即遵照剋日组设具报为实。

兼县长 焦达悌

联防指挥所的任务是将各大多警察分队和自卫班及乡保武装统一归口指挥，并负责收编散兵游勇和维护地方秩序。这是焦达悌派出自己人控制四大乡并负责联络的措施。

6月17日，焦达悌亲往社港、泮春，通过乡亲关系将周福吾一个连的武装收编，任命周福吾为第1区保安司令部搜索大队大队长，周启元为副大队长，在册150人，步枪117支，轻机枪2挺、掷弹筒6个、手枪3支、提花机枪1支、手提冲锋枪1支、手榴弹80枚。焦达悌通电全县，嘉奖周福吾深明大义受编，自当绝对服从政府之命令，再不向驻地索取财物，一切由政府供给。

西区的彭志尧通过派人做工作，又听到周福吾受编由政府供给，也应允就编。焦达悌任彭志尧为第1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大队长，王光斗为副大队长、黎运之为大队附、彭传清为政委、何云波为一中队长、张淮溪为二中队长、宋桂清为三中队

长，杨海乔为三中队附，周俊为炮兵中队长，并令其7月3日开赴荆坪整编，共计150人，步枪77支，轻机枪3挺、机关炮1门、手枪5支。

6月30日，收编了东区的周康候、胡关两支队伍。焦达梯为了取得国民党126军军长张湘泽的信任，特将收编周、胡两部备文向他请示，得到如下两个代电：

7月4日代电是：“兹准焦兼司令业已收编周康候、胡关二部编为本区自卫队，并指定集中同绥、焦城两乡境内，听候整训。”

7月6日代电是：“胡关收编，由胡关率部由浏东联防所经过改编，并限本（7）月10日以前在永和集中收编。”

7月7日，焦达梯亲临周、胡二部驻地，再次训示部下深明大义就编。

6月19日，南区时仁乡打着“湘鄂赣边区第一纵队”旗号的张祖柏、甘恩楷、李华凤为首抢走了乡公所步枪18支，当时焦达梯出巡北区，虽韩蒙轩多次催办此案，焦拖至7月3日才要常备队中队贺敏和陶国森率部配合南区联防所副主任陈建筑去查办，恰在当日于该乡七级坳围杆树下与张祖柏相遇，张祖柏被击毙，活捉了甘恩楷、李华凤2人，从此，南区也平静下来。

7月11日，《正风报》第3版报道：焦专员出巡归来，畅谈出巡观感，人民安居乐业，散匪自动受编。论述了焦到职一月将各自为王的武装割据局面改变为在他统一指挥下的有组织系统，博得张湘泽的赞赏。

焦达梯对待原警察局起义一事，采取不吭不理的态度，尽管韩蒙轩多次要他围剿，他都以自身无实力的空头司令应付，对在起义后归回的41位员警，焦分别采取留用或遣散回家的办法予以处理。如3分队长周东阳起义回来自首写的报告，新任警察局长彭克蟠在7月10日批示“收留此人”，焦则批为“慰

勉”二字，不予追究。黄卫中被周康候部抓获，虽然上面有令就地处决，焦达梯则令周康候秘密将其送往县城，未予执行，并和刘逸秋二人两次探监劝慰黄卫中，并设法营救。后被韩蒙轩察觉，由韩派人押送长沙，由白崇禧逼迫程潜批示于7月8日在长沙处决。

焦达梯对待从彭汉云部俘获的43人，亲自审问。后来，据彭汉云部下被俘的刘福五向彭汉云汇报说：“审问时，5人一组。焦说：‘你们不要跟彭汉云搞了，要安分守己，如果以后再捉到了，就要杀你们的头！’”就这样把他们释放了。

焦达梯于7月9日以1区保安司令的身份，宴请了从平江经浏阳向醴陵撤退的58军军长鲁道源，应邀参加宴会的还有张湘泽、韩蒙轩等人。不久，各部和张部宣布撤退醴陵、株洲，韩蒙轩不敢孤军驻扎浏阳，7月11日，他带着人马回长沙去了。

张湘泽、鲁道源宣布撤退，韩蒙轩也走了，焦解除后顾之忧，立即与刘逸秋、欧亚南等人决定将已收编的武装组建为第10师的基本队伍，公开的番号为第1区保安司令部，对内则叫兴达部队，对干部则通知为地下军第10师，下设6个大队，一个警通队，各队领导人和活动情况是：

第1大队大队长王俊，辖原中樞、中孚、中庸三个乡之武装。

第2大队大队长彭克蟠，辖警察局所属之武装共130人，派李文叔协助。

第3大队大队长彭志尧，辖保安大队所属之武装，派刘岳南协助。

第4大队大队长潘启人，辖原西区自卫联防指挥所之武装，派刘岳南协助。

第5大队大队长周福吾，辖原搜索大队所属武装。

第6大队大队长胡关，辖原保安大队武装，派欧亚南、周

华溪、陈与清协助。

周康侯大队则由陈树良指挥。

警通队队长黄诚，辖自卫队手枪队和湘区保安队步枪20余人组成。

并向大队宣布三条命令：

一、解放军入境，不得抵抗；

二、保境安民，维护社会秩序；

三、国民党军过境之残余部队，应相机截击缴其武器，武装自己。

第3大队彭志尧回驻西区，10天内先后在雷家冲、鸡首洲、何家湾、水洪庙、大三坝等地，袭击58军、126军残部，共毙敌50余人，缴获步枪、手枪20余支、轻机枪1挺。

第4大队潘启人于7月19、20日在西乡肖家坪、蒜州、镇头三地击毙58军2人、俘6人、步枪10支。

第5大队周福吾在山田与58军作战4次，缴枪10余支。

第6大队胡关对126军和湖北保安团在施家冲、官渡、蒋埠江、云山等地进行袭击，缴获步枪20余支、轻机枪1挺。

到浏阳解放时止，江南地下军第10师可指挥的武装共1,500余人。

湖南军区在1949年所出的“湖南地方游击武装的性质与处理意见”一文中指出：“华中局社会部城工部的被解放军官，利用其旧关系，收编在乡失意军人，拉拢敌人地方武装（自卫队等），封官加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如3130江南地下军第4军唐拔部等，这些武装，不论怎样，既来与我们接头联系，总比跑散为匪或跟着白匪跑了，将来再去清剿要好些，所以只要来就欢迎。”

焦达悌组建的第10师，正是这样的队伍。在国民党正规部队溃退浏阳之时，截击敌人残部，安定地方人心，为浏阳和平

解放是作了贡献的。

三、迎接解放的日日夜夜

7月18日,解放军先遣部队先后进入文家市、达浒、社港等地。焦达悌派柳羽、卢雨三与第12兵团第45军第133师胡政委联系,胡政委指出:“让开正面,避免误会。”焦当即令专、县机关人员及直属部队于19日清早趁敌126军尚未撤完之际控制佛岭背、张家店至青草市一带。县城留刘逸秋参谋长和晏伯豪主任秘书二人负责迎接解放事宜。

7月19日清晨,焦达悌带领县政府秘书刘守人、财政科长罗传臣以及电台人员马万勋、贝远阳等人出城到达张家店后,即向东、西、北三区联防所下令,要他们集中部队,实施统一的三条命令。另向程潜电:“浏阳已沦陷,我率部在青草继续办公,相机开展游击。”向陈明仁电:“我部被围,死伤甚重。”向白崇禧电:“已突围,转移阵地,弹尽粮绝,望援。”上午刘逸秋、晏伯豪等留城的28名县府人员,在焦达悌率部出城后,立即召开各机关、团体人士会议,组建浏阳县人民临时治安支前委员会,推举马拱北为主任,熊纯钦、罗淮溪、喻宠喜为副主任,王懋尧为总务组长,邱初友为供应组长。阳鹄为警卫组长、黄秋定为联络组长。下午解放军入城,秩序良好,先遣部队第40军保卫部长应刘逸秋的安排设指挥所在县政府。刘逸秋、晏伯豪尽力对部队办理供给。刘逸秋向吴部长书面报告江南地下军第4军第10师的简要情况。先后到达浏阳县城的解放军有40军、45军、46军等部队。

7月22日,由吴继尧负责的浏阳县人民政府临时办事处开始办公,原县府留城28人在原职办事。晏伯豪在7月23月写信给了焦达悌。

焦达悌据此信要县政府62人于7月23日全部回到工作岗位

听候浏阳县人民政府临时办事处的差遣，按期将原县府一切财物、文件移交给人民政府。

7月26日，以徐秉谦、樊茂生为中共浏阳县委正、副书记，赵超山、张国元为正、副县长的南下工作团120余人，经春华山到达永安，又经蕉溪岭赶到浏阳县城。先行向导张立栋、王联珠和刘宜规教授3人，28日开始交换情况，29日由吴继尧主持召开有野战军、焦达悌部、接管浏阳南下工作团、地下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决定如下事项：

一、整编焦达悌所属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于浏阳南乡荆坪，

二、8月1日成立浏阳县临时人民政府，由赵超山、张国元任正、副县长。

三、按东南西北4乡设立人民政府办事处。

四、派133师政治部联络科刘兴起为焦达悌部的军事代表，后加派张立栋为副代表，到荆坪协助焦达悌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前的政治思想工作。

焦达悌赞成会议的决定，回荆坪收集各乡武装，除陈树良所属周康候部已由接受官渡的驻军赵天生队长收编外，其他部队于8月4日全部到达荆坪。经过10多天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解放军宗旨的教育，绝大多数人表示愿意从此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8月15日，长沙地委副书记罗其南从平江来到浏阳，请求45军陈伯钧军长派该军政治部李改主任协助工作，批准改编的具体办法。17日下午，焦达悌率部从荆坪到浏阳县城，驻磨石街一带。当晚，县人民政府慰劳焦达悌部，并聚餐庆贺。

8月18日上午9时，在原县政府门口操场由焦达悌集合部队作了改编的动员报告，下达改编命令，完成了改编任务。

8月20日，焦达悌将自己配带的2支美式左轮、67发子弹和

警卫员2支3号驳壳枪、89发子弹交给了浏阳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政府配给的一支马牌手枪和21发子弹也于27日交给了公安局，完成了部队的交接改编任务。

焦达梯完成了在浏阳的历史使命，告假回到了长沙，等待上级的分配。1949年12月，他奉调到中南军政大学高干班学习。

（陈新明 整理）

对屈子健《湖南优级师范概述》的订正

彭肇瀚

读《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登有屈子健所作《湖南优级师范概述》一文，其末段有：“抗战时期，欧鸣高将育群中学迁至他的原籍宁远县城。利用学校名义，大做其投机倒把生意，抗战八年，他大发国难财，买了5000亩田地，起了高楼大厦，在宁远当土皇帝。他克扣育群中学教员薪金，师生待遇很差。”

我于1938年3月到育群中学教书，于1945年1月被解聘离校，原因是与欧鸣高发生齟齬。抗战8年，我有7年在育群教书，而屈子健当时在衡阳办学，并未到过宁远。兹就我所知对屈文加以订正。

1.欧鸣高一家五、六口一直住在育群进校门左侧三室一厅的旧平房，生活俭朴。他的老家在距县城约50里的梅岗。欧父去世，我去梅岗住了两天，欧家有住房及余屋约10间，此是祖传。有一间楼房兼作书房及待客之用，有两、三个床位、一张书桌，几把椅子，都已半旧。不是“高楼大厦”。

2.欧先生在长沙工作近30年，在滨湖地区购买上百亩田地，据欧先生乡邻说：欧先生在宁远约有水田30亩，说是购买5000亩田地是不实的。

3.1942年春开始，各私立学校均改收俸米。每期学费米150斤，杂费米30斤，学费米全数按教职工工资比例，分摊到个人，有教师代表监督，校长无法私饱。杂费米由学校使用，也有董事会代表监督。欧鸣高校长兼教了一班国文及几节公民课，他也只能按工资摊分他应得的一份俸米，说他克扣教员薪

金，没有这事。

4.育群在长沙平浪宫的校舍在抗战中被夷为平地（即今八中），为准备复校，育群以逐年学校节余，购买了桐油和杉木，均于复校时运到长沙作修建之用，这何能谈得上投机倒把！？

对《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一文 的一点补充订正

刘文炳

读1986年12月民盟湖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这本小册子，其中16、17两页“向蒋、白反动派发动政治攻势”一节中，提到“以‘反桂系军阀大同盟’的名义，印发一批传单。……传单是委托一家小报的印刷厂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印成的。……”所述与事实略有出入，不够准确。这份传单是李鳌、杨伯峻二位同志和我在盟省委作出决定以后，约定在都正街清香留6号杨伯峻住宅秘密起草的，稿成后，杨伯峻介绍我去《国民日报》（国民党省政府机关报）印刷厂找一位地下党的同志（忘其名）在该厂印刷的。第二天，仍由我去取回，按照民盟组织的决定，在白崇禧到长沙的前一天的下午4到7时之间要在全市各机关、学校、街道散发完毕。我参加了臬后街一带的散发工作。

